

DANGDAIZHONGGUO

当代中国口述史

吴德口述

十年风雨纪事

——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S

SHINIAN FENGYU JISHI
WO ZAI BEIJING GONGZUO
DE YIXIE JINGLI

访谈、整理：朱元石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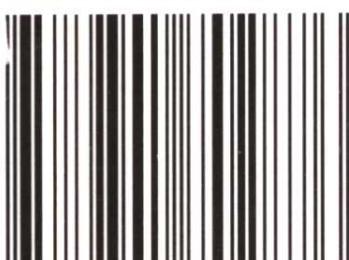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人：周五一
责任编辑：张永
装帧设计：周钦尧
梁筱敏

ISBN 7-80170-287-5/K·57

定价：26.00 元

ISBN 7-80170-287-5



9 787801 702876 >

1966年，吴德同志调北京工作。此后十年间，他担任了北京市及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领导职务。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共和国历史上不平常的年代，他目睹了政府失去权威、“一月夺权风暴”后的动乱。经历了庐山会议、林彪事件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雨，更亲历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处理过程，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本书是吴德同志对其亲历的口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朱元石等访谈整理.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ISBN 7-80170-287-5

I . 吴… II . 朱… III . 吴德 - 生平事迹
IV .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3038 号

责任编辑 张 永
责任校对 王兰英
装帧设计 华通工作室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发 行 部 电话(010)66572157
印 刷 廊坊北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 印张 138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出版说明

现代史学越来越不满足于文献资料，而求索于人们的记忆。于是，口述史于 20 世纪 40 年代在西方勃然兴起，20 世纪 80—90 年代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关注。口述史让历史的参与者直接对“历史”说话，不仅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而且使历史更加鲜活、生动。口述方法更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因为许多事件的当事人健在，他们能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生动地诉说自己参与的那段历史。

新中国诞生五十多年，它谱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最为壮丽辉煌的篇章，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是一项应大力加强的工作。毫无疑问，参与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的老同志的记忆对于国史研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他们年事已高，自己动手困难，访谈并整理他们的口述，成为十分紧迫而带有抢救性的工作。作为国史研究专门机构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建立伊始，就十分重视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并由《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陆续发表了一些口述史方面的成果。我们意在将这些成果汇集出版，并由此进一步萌发出版《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的想法，以此汇集和整理亲历者记述当代中国史的资料。在酝酿这套丛书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亲历者可以自己动手撰写，有些亲历者生前对其亲人讲述过自己所亲历的事件或与一些要人交往的情形，其亲人以回忆的形式述出。很显然，这些记述都是十分宝贵的当代中国史资料，因此，我们也将它们收入这

套丛书中。

《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的首要宗旨是存史，为当代中国史研究者提供可信的史料。而史料的生命在于真实性。因此，丛书所收以亲历者的叙述为主体，无论是口述、自述，还是回忆录，都必须是亲历者作为事件的当事人、决策者或参与者对事件的叙述。而且必须是以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叙述。当然，完全避免情感的因素不仅不可能，而且会使之失去鲜活性。但情感的倾诉应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如果是对口述的整理，整理者应对事件背景有必要的了解，要对关键的情节、关键的人物以及时间、地点作必要的查证。同时，要理顺叙事逻辑。文采不求飞扬，但必须成诵。

这项工作既已开始，就要扎实做下去。亲历的内容十分丰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及个人生活史、家族史都可涵盖；亲历者可以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也可以是普通老百姓，总之，工、农、兵、学、商都可以成为本丛书的作者。他们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叙述当代中国的历史，可以记录下一个比较真实的当代，对于丰富国史内容，弄清历史真相，总结历史经验，资政育人，都是大有裨益的。

我们希望本丛书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者的资料库，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增益智慧的智囊团，成为关心共和国成长和命运的中国公民的图书馆。

当代中国出版社编辑部

前言

1993年夏天，我们到了北戴河，经人介绍，与吴德同志联系上，对他进行访谈。他就住在国务院系统的临海边不过几十米远的一座小别墅里休夏。

对老同志进行访谈，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内容。这项工作我们就叫它为口述史，是一件带有抢救性，即抢救历史资料的工作。这是因为许多老同志大都不能写作，或因年迈病弱已不能亲自动笔，需要有人帮助把他们所经历的重要历史写下来，如果不是这样，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和历史见证就会湮灭。这不能不给人一种紧迫感。

我们第一次去吴德同志那里，他早已在门外等候，老人十分谦和，彬彬有礼。我们在门外坐下谈了一会儿，感觉外面有些凉，怕他身体受不了，请他还是到室内去谈。重新安排了桌椅，各自坐定，很快谈入正题。老人细声慢语，说话非常平稳，用词很讲究，有长者风度。他有一个几乎是习惯的动作，不时地用他那苍白的

手去抚摸自己的头顶。清癯的脸上虽两眼炯炯有神，但总让人觉得是一个病人。谈到个把小时，中间略为休息。这时就清晰地听到，海潮一阵阵很有规律的推动的声音，不过因为这声音是关在窗外的，竟同主人公的絮絮话语是那样地协调有致。

我们的话题是由近及远、从后向前，是由谈最近、最重要、记忆最为犹新的事开始。第一次谈的就是动人的心魄的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在 1993 年的这个夏天里，我们前后一共谈了 14 次，也就是 14 个半天，大致都是隔天谈一次。最后，我们还约定回北京如有空再谈下去，明年夏天如再到北戴河来则如法进行。

1992 年夏，吴德在北戴河小别墅



可惜得很，回北京后除对原来的一些谈话做了一些订正的工作外，由于他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差，未能继续其他话题。1994年的夏天，我们都如约到了北戴河，但是，老人才住下一个星期，便因感冒即回京进了北京医院。我们寄期望于1995年的夏天，但是这一年他就没有去成，北戴河的访谈从此不再。后来他几乎都是在北京医院里了，直到他在该年11月29日去世（享年82岁）。临终前，他非常想见我们，好像还有一些重要事要谈，因为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他的秘书没有传我们。这就使我们更抱着了遗憾。

吴德同志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66年调北京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在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1972年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69年、1973年分别在中共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现在根据1993年的访谈整理出来的这本吴德口述史，一共集有13篇；并不是依谈话顺序的先后，而是大致按所谈事情的历史时间先后编排的，都是他在十年“文革”风雨

中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我们整理出来后都经吴德同志看过，并在大多篇章上留下了他的修改文字。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希望这本口述史，能为国史研究者提供严谨和宝贵的一方记录。

朱元石

2003年10月



1993年，吴德与访谈者朱元石合影

目录

MU LU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目 录

前 言

一、动荡的北京市委 (2)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宋任穷说：工作需要，中央的调令，不能不去。彭真出了问题。/邓小平要我先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李雪峰与我谈话时，只对我说北京的问题严重，毛主席批评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毛主席说，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刘少奇在检讨时说：共产党员能上能下，我也可以下去。

北京工学院还没放我，我又被吉林来的造反派蒙上眼睛，架到汽车上拉走了。/周总理以为我被关在天津，派陈一夫同志坐汽车追到天津找过我。/江青说：你们市委怎么搞的，为什么不让人讲话。

二、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 ······ (20)

中央文革小组指责说：市委怕群众，已经变成地下市委了。/叶帅看到北京很乱，提出要我们把刘仁和其他市委领导同志送到外省监护。/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说我是坏人，包庇“黑帮”。杨成武对周总理说：在晋察冀时我就认识了，他不是坏人。

“破四旧”迎风而起，超越了常规。/北京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据火葬场统计是七十多人。/我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

毛主席的车一出来，争着和毛主席握手的人就把汽车包围了，进不得，退不得。/看见毛主席和刘少奇在上天安门的电梯口处坐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们说，应该检讨，我组织得不好。/红卫兵在北京，最多的一天达到300万。周总理要求各机关派人到市委接待站领人。中南海也腾出一些地方住红卫兵。

彭真在他的住处被人抓走了。周总理找戚本禹，要他把彭真找回来。/造反派当时都在抢这些人，哪一派抢到了就有了“资本”，各派有可能为此打起来。

目录

MU LU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三、“一月风暴”以后 (42)

我和高扬文、丁国钰等几位书记被造反派定为走资派。/有一天早上5点多，吉林来的造反派跳墙进来揪我，被一机床厂的工人看到了，双方差点打起来。/谢富治到关押我的地方对我说：毛主席认为北京市夺两次权影响不好，中央叫你们出来工作。

包围中南海是由北京建工学院开始的。/刘少奇迫不得已交了由王光美笔录的检讨。许多造反派狂呼“刘少奇滚出中南海”。/周总理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是错误的，要求外语学院的两派停止这些行为。/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外交部、外交方面的事情是由周总理管的。

林彪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王力，要把所谓军队走资派揪出来，也有他的目的。/我的旁边坐了卫戍区的副政委刘福，他偷偷地告诉我：傅崇碧出事了。

清华、北大的武斗制止不下来，毛主席决定同时组织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北大。/组织进驻工作的是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副司令李钟奇。李钟奇坐车进到学校后，“井冈山兵团”把他包围了，把他坐的汽车掀翻了，把他的文件包也抢走了。

四、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 (62)

周总理向我和傅崇碧明确交代：要把与“王、关、戚”有关的人员，清理出市领导机关。那些人不清理，你们市里稳定不了，你们也工作不了。/在清查中，发现他们有一句口号，叫做“要揪一个永远健康以下的、保人保得最多的、揪出来让你吓一跳的人”。/毛主席在信上用红铅笔批示：“五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有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

五、难缠的江青 (80)

周总理向毛主席提出解放万里后，毛主席说：就是搞人大会堂、十大建筑的那个人吧！这个人应该出来。/江青到香山碧云寺，万里陪同。进到孙中山纪念堂休息室，看到墙上挂着毛主席像，江青发火了：北京市委是共产党的市委还是国民党的市委，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挂毛主席像？她告诉万里，把孙中山的水晶棺和用过的东西以及展览物品统统弄走。

江青两次叫我陪她看电影《节振国》，说这个电影可以

目录

MU

LU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改编成京剧。/有一天，谢富治告诉我到钓鱼台开会。我到钓鱼台后，江青首先就对我批评开了：你为什么为个人树立碑立传？

毛主席指定我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周总理对我说：毛主席有批示，不能不去。江青对我大声说：毛主席的批示为什么不执行？你这个组长为什么不到任？/江青、张春桥责问我，为什么跟他们唱对台戏？张春桥说：有一个《红灯记》，你们就搞一个《渡江侦察记》，有一个《智取威虎山》，你们就搞一个《智取华山》。/江青在电话中对我说：有人破坏样板戏，你知道不知道？

六、从国务院文化组到四届人大 ······ (92)

文化组的人很多被江青整了，首先被整的是狄福才。刘庆棠他们提出“江青是文化界的旗手，一切要按江青的指示去办”。狄福才强调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事。/江青他们给我定了两条界限：第一条是不准和旧文化部的人、文艺界的人沾边，要和他们划清界限；第二条是艺术上的事不要多管，搞好八个样板团的后勤。

江青说：为什么拿反革命分子的作品来欢迎外宾？我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周总理只说了“这没有什么了

不起”一句话。/江青说：这个片子拍了中国的阴暗面，是污蔑伟大的中国人民。允许外国人拍这样的片子，而且带出去，不只是错误，简直是汉奸！

周总理对我说，要我去人大。我说：我不能胜任，很多民主人士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周总理对我说：你怎么糊涂啊！/毛主席在人事安排前，指定人大要安排朱老总、董老、宋庆龄出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还是总理”，小平同志任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排在小平之后。

七、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 ······ (112)

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万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吴忠告诉我发言的情况。他说陈伯达、汪东兴讲了话，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我急忙问：是谁反对毛主席？/我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聂元梓在到处串联，揪所谓反对毛主席的人，会议有些不正常。/周总理说，我已把你的信在政治局传阅了。

毛主席在火车上与我们谈了话，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点：一点是说共产党要搞唯物论，不能搞唯心论；另一点是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

目录

MU LU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船 上去了。/华北会议开得好紧张！江青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字，还说他把河北省会由保定搬到石家庄是个阴谋。

我检讨说：主席，我还在 6 号简报印发前签了名字。6 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犯了政治错误。毛主席挥着手说：没你的事，吴德有德。/纪登奎禁不住跟我说：这个问题大了！/我看见周总理很紧张，听见他对电话中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李伟信交代说他们有一个《“571 工程”纪要》。吴忠听不懂，拍着桌子骂李伟信：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

八、关于在批判“经验主义”等问题上同“四人帮”的斗争 (156)

邓小平同志对我说：你今天鼓了很大的勇气吧？周总理说：你们在会上吵起来了？我说：只是声音大了一些。/会开完后，王洪文过来同毛主席握手，并说要按主席指示办。毛主席作手势，要他不要翻过来覆过去，摇摆不定。

邓小平同志说：你这些意见不就是说我犯了路线错误？毛远新说：提意见嘛，要杀头吗？/毛主席说：刘冰的信

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就在北京，写信为什么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他。

九、“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解放干部问题上的一场斗争 (174)

叶剑英写了一首打油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江青变脸了，大声说：你们要给叛徒翻案啊！/我们理直气壮地说：这是归纳了毛主席批示的各种案例后写出来的。

十、“反击右倾翻案风”纪事 (188)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不得人心的。/江青破口大骂张天民是“谎报”。/小平同志通知政治局的同志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看《海霞》。/毛主席说邓小平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了。小平同志说：我要写信给毛主席把职务辞去。/毛远新当着倪志福的面说：上海、辽宁我们批邓敢于无法无天，北京市胆小如鼠。

目录

MU

LU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十一、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经过 ······ (200)

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有一个积累、演进的过程。/北京市的黑布、白纸都卖光了。/从3月30日算起至4月3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一百万。/4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张春桥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

十二、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 (222)

毛主席发现、批评并提出解决江青宗派集团的问题，有过多次指示。/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四人帮”已在采取措施，架空、控制华国锋同志，企图直接指挥全国各地，进而夺取中央最高权力。/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江青讽刺我说：你是京兆尹，大忙人啊！/华国锋问：北京卫戍区靠得

住靠不住？/我刚到家，华国锋又来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汪东兴来说：一切顺利。/邓小平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对我们说：这种方式好，干净利索。

十三、“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的经济建设 (258)

在那种条件下，抓生产不容易。/农民除了“早请示，晚汇报”外，还要种地、吃饭。/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北京市的经济建设会发展更快、更好。

后记

I 253
259

当代中国口述史

吴德口述：

十年风雨纪事 ——我在北京工作 的一些经历

访谈、整理：朱元石等

Wude Koushu:
Shinian Fengyu Jishi—
Wozai Beijing Gongzuo De Yixie Jingli

当代中国出版社

动荡的北京市委

Dongdang De Beijing Shiwei

—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

1966年5月中旬，李富春同志打电话给东北局，传达中共中央调我到北京市工作的决定。我当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打电话通知我，到沈阳汇报和交代吉林省委的工作以及交代我所分管的东北局文教方面的工作。

在吉林省工作多年，不免有些留恋，同时也知道“京官”难当。我见到宋任穷时，提出能否不去北京？

宋任穷说：工作需要，中央的调令，不能不去。

我又问：北京的情况怎样？他谈了些，又简单地说：彭真出了问题。

我追问：彭真出了什么事？

宋任穷说：你到北京后由中央同你谈。任穷同志不愿多谈。

我在沈阳待了几天，5月24日到了北京。那时，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央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4日~26日），毛泽东时在外地，刘少奇主持。就在23日那天，中央作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彭真还被撤销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他们的问题由所谓“对抗文化革命路线”上升到了“反党集团”。

我到北京后，先去见了邓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笑着说：欢迎你来，中央决定你到北京市委工作，李雪峰任第一书记，你任第二书记。

邓小平要我先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北京的情况由李雪峰与我谈。

政治局扩大会议已临近尾声。我听了最后两三天的会议，听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的讲话。他们都是着重讲毛泽东思想如何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问题，因为前一段的会议我没有参加，许多事情不接气，听不懂。这时彭真同志已经不参加会议了。

我到北京后，也就去见了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

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二是改组北京市委。我来北京前的二十几天，华北局派池必卿、黄志刚率工作组进驻市委，调查市委的“罪状”。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局工作组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把市公安局局长

1966年，动荡的北京市委大楼前

5



动荡的北京市委

邢相生逮捕后，公安部又派来一个局长叫李钊。后来，李钊也被捕了。

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1955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11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

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他参加了杭州会议、上海会议，会议上的情况他没有给我传达，在与我谈话时，只对我说北京的问题严重，毛主席批评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担负起北京市的工作的。

北京市委5月下旬改组，中共中央决定：李雪峰为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改组后的市委书记处书记是高扬文、郭影秋、万里、陈克寒、赵凡。

新市委的名单于1966年6月4日公布。3日，周总理告诉我说名单要在报纸上刊载。

北京新市委存在的时间只有七个半月。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1月18日，新市委被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夺权。市委被夺权后，我和高扬文、丁国钰等人被关在东交民巷14号，学生和造反的工人在近处监视我们，大院的外边由卫戍区的部队守卫着。以后，我

们又被弄到工厂去了，然后又被揪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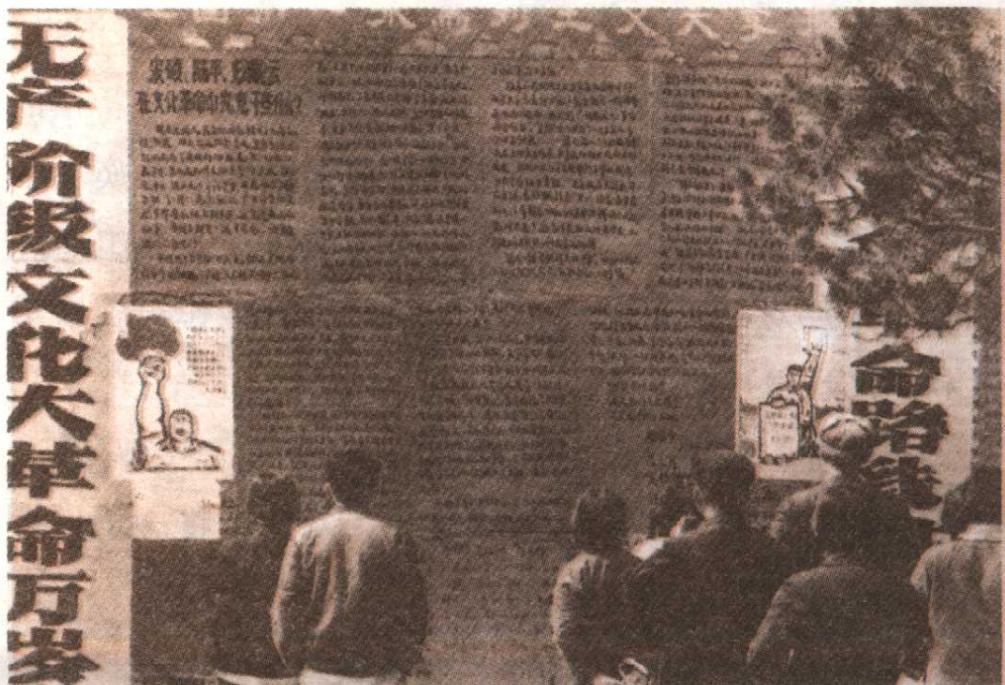
李雪峰主持市委工作不到两个多月，华北局里就有人开始造反揪他了。我记得好像是在一次检阅时，毛主席对李雪峰说：避一避，避到内蒙古或天津，一方面照顾当地的工作，另一方面还可以指导北京市的工作。

李雪峰后来到了天津，开始我们还可以通话，但后来，我们连电话都联系不上了。

北京市派工作组，被指责为犯了“资反路线”错误。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广播电台播发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我记得当时华北局正在开会，李雪峰让我参

聂元梓等七人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



加了会议。会议好像是解决内蒙古乌兰夫同志的问题，还有天津、河北的一些问题。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播发后，学生一下子就起来了，给老师提意见，对老师进行大批判，发展到冲击校党委，动手打人，学校由行政系统到党委系统全被打碎。北大大乱了，其他大、中学校也就跟着乱了。

我们当时认为，学校的党委一瘫痪，整个运动将无人领导、无法领导。我们每隔一两天就到怀仁堂去参加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的情况汇报会。大家都觉得必须马上改变这种状况。

■ 8 针对学校混乱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要新市委提出关于中学、大学的工作纲要，并指定团中央书记胡克实搞中学的纲要，北京市委搞大学的纲要。

工作纲要搞好后，我们向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汇报。刘少奇说中学的纲要可以了，大学的还需要修改。在汇报会上，李雪峰提出了如何解决目前学校领导瘫痪、学校无人领导的问题，邓小平提出市委可以派工作组。陈伯达后来反对派工作组，其实他是最早派工作组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的。

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学校、了解情况、领导运动。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刘少奇将决定报告了毛主席并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

北大工作组的组长是张承先，清华工作组的组长是叶林。后来，为了解运动情况，刘少奇还派了王光美参加清华的工作组。我和李雪峰商量后决定工作组的组员从“四清”工作队中抽调，中央各部委的各地院校由中央各部委派人组成工作组进驻。

工作组进驻后，局势稳定了一些。

6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拟定了八条指示，要求在运动中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

6月18日，北大的聂元梓写大字报反对八条指示，并揪斗了校领导陆平、彭珮云和著名历史学教授翦伯赞等人。工作组针对搞“打鬼台”和乱揪乱斗的现象予以制止，张承先为此写了一份简报，市委将简报上送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认为工作组的做法正确，将简报批发全国。刘少奇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这时，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蒯大富也起来了，他提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一看见这个口号，李雪峰和我商量认为，这个来头大有问题，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怎么能

打倒呢？我们认为是有坏人跳出来了，不能置之不理，要准备拘留蒯大富。

当时，各个学校都动起来了，两军对垒，形势很紧张，这一边是中央文革支持学生造反，另一边是工作组进驻学校要控制局势。

根据这些情况，李雪峰在华北干部会议上作了有关运动的情况和抓“游鱼”的报告。李雪峰在报告中提出“抓游鱼、反干扰”的口号，说一个游鱼能掀起三个浪啊！“抓游鱼、反干扰”的时间大概有五十多天。

7月18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李雪峰、吴德、胡克实关于北京情况的汇报。江青也来参加了，她是后到的，坐在一个角落里。李雪峰汇报说各学校行政组织都已瘫痪，不派工作组不能实现党的领导了。陈伯达一反常态，表示反对派工作组，邓小平当场站起来与陈伯达争论起来。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要派工作组。我也认为不派工作组无法领导运动，“四清”运动不也是派了工作组吗？人民日报社就是由中央派了工作组的。

7月23日，毛主席在钓鱼台听李雪峰和我的汇报，陶铸、康生等人参加了，刘少奇、邓小平没有参加。李雪峰先是汇报了华北干部会议的情况，我们看到毛主席很不耐烦。李雪峰转到汇报北京的情况。毛主席说：我

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像翦伯赞，出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批，怎么改？群众写对联讲“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指翦伯赞）你们不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依靠学校里广大师生。

毛主席指责我们说：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怕反革命，怕动刀动枪，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

毛主席决定马上撤销工作组，要我们执行。毛主席批评得很厉害，提到很高的高度，说工作组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了群众。

在回来的路上，我与李雪峰在车上商量了一下，我们前几天刚传达了派工作组的决定和刘少奇、邓小平的有关指示，现在又传达毛主席相反的指示，怎么向群众解释呢？怎样才能把工作组撤出来呢？以后的运动又怎么来领导呢？李雪峰说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他说上次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是你传达的，这次传达还由你来讲。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背后操纵，派到学校去的各个

工作组没能撤出来，遭到了揪斗。

在一次中央召集的汇报会议上，毛主席和林彪都参加了，李雪峰不在，好像到天津去了。我提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是下发了，但是工作组撤不出来，工作组的成员都是经过挑选的，都是好同志。他们的问题责任在我们，他们的问题回到本单位解决为好。

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点头表示了同意。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仍是揪住工作组不放，工作组一直到新市委在第二年“一月风暴”中被夺权后，才撤出来。那时，工作组也开始造我们的反，揪斗我们。我在被揪斗时对他们说：我们已经被夺权了，你们赶快回本单位吧。

1966年7月28日，新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这以后，我感到没有办法领导运动，在京西宾馆开的一次会议上，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周总理说中央各部委所属大专院校都交由北京市委统一领导，市委成立一个大学工作委员会，各部各口派人参加。

周总理指定我为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主任，陶鲁笳为副主任。委员有孔原（调查部）、丁国钰、李清泉（外交部），吴星峰（石油部）调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各部各口负责接待相应的学校的师生，派联络员到各学校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大学工作委员会派联络员的事情被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批评成立大学工作委员会是与派工作组性质一样的错误，要立即撤销。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提出要重新发动群众，要李雪峰和我以及清华工作组的组长叶林进行检讨。江青、康生亲自到北大、北师大煽风点火。毛主席还派周总理到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宣布给蒯大富平反。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大会由李雪峰主持，宣读了市委28日《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根据中央指示宣布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言。刘少奇说：“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毛主席在会议结束前出来了一下。

粉碎“四人帮”后，李雪峰告诉我，在这次大会之前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斗争很尖锐，毛主席讲话的基本内容就是后来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刘少奇在检讨时说：共产党员能上能下，

我也可以下去。毛主席说：你可以稍稍下去一点点，不要下去那么多。

人民大会堂大会后，新市委负责人开始多次在万人大会、十万人大会以及在各个大学的大会上检讨执行了“资反路线”的错误。我和李雪峰检讨了不下十次。

说几个当时的情节。有一次李雪峰在北大作检讨，我和刘建勋（刚从河南调来的北京市委书记）在场。检讨大会由聂元梓主持；大会开始后，聂元梓对我说外边有人要把李雪峰揪走。我说不行，我们一方面是检讨错误，一方面是支持你们，你们应该派纠察队保护嘛。

结果聂元梓根本未作任何保护，而是勾结从事，李雪峰检讨完了，没有上车就被一些人架跑了。

我很生气地对聂元梓说：李雪峰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你要负责设法找回来。我知道这伙人是受聂元梓指使的。

聂元梓一句话回答我说，她没有办法。

刘建勋见事，着了急，坐车风驰电掣般跟着揪走李雪峰的那伙人到了政法学院。结果他也被揪到一个会上挨了斗。

我回来后，将情况紧急报告周总理。过了一晚，周总理派周荣鑫去政法学院才把李雪峰和刘建勋要回来。

接着，北京工学院贴大字报，限时要我去检讨“资

反路线”错误。我检讨完后，学生们一下把我的稿子抢走了，还把我扣住批斗了好几天。

北京工学院还没放我回去，我又被一批从吉林来的造反派蒙上眼睛，架到汽车上拉走了。

吉林来的造反派在我完全陌生的地方审问了我一次，还把我拉到火车站，说要押送我回吉林接受批判。到车站后，因为火车不通，才没有走成。

他们关我的地方没有床，睡觉只能躺在地板上。我记得我的房子门内放着一个大铁哑铃，有一个人昼夜监视着我。到了夜晚，我提出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他们怕我自杀，抢走了我的安眠药。

这些揪我的人有些是地质部系统的，地质学院的，他们坐的汽车是地质部的。

我对这些吉林的造反派说：我在吉林工作了 11 年，我请求过周总理是否要回吉林交代清楚，周总理说中央不同意。现在你们没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我不能去吉林。

半夜，这些吉林的造反派要我给周总理打电话，要求周总理接见他们，但不讲我现在被关押的地址。

我马上给住在京西宾馆的刘建勋打电话，说明吉林的造反派要通过我找周总理，请刘建勋转告周总理。打完电话后，我对造反派说，我已把电话打给周总理的秘

书了。那些造反派将信将疑。

第二天，这些人又让我打电话。我提出，找总理的秘书，你们不告诉我地址和电话，就是总理知道了，又怎么能找到你们。吉林这些人只好同意告诉我被关押的地点和电话。这时我才知道，我被关在电影学院的四楼里。

我又把电话打给刘建勋，告诉了我的情况及他们的要求。当时，这些吉林的造反派还怀疑我是否真正把电话打给周总理的秘书了，他们问我是不是周总理的秘书在接电话，我说是。

刘建勋找到周总理，汇报了情况。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焦玉山打电话找吉林造反派的头头说，立即释放吴德。焦玉山还在电话中批评他们这样搞是错误的。

电话打完后，吉林的人告诉我说，刚才接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别人的话可以不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要听，立即放我出去。他们还问我中央文革办事组是不是有焦玉山这个人，怎么找这个人等问题。

我说中央文革小组有这个人，可以到钓鱼台去找。

我打电话给市委，他们派车来把我接走了。

以后我才知道，周总理很关心我的下落，以为我被关在天津了，曾派陈一夫同志坐汽车追到天津找过我。

再讲几件事情说明当时的混乱状况。天津矿冶学院的院长吴子牧调到北京市委大学部任部长，他在矿冶学院几乎被打死，吴子牧的妻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吊自杀了。吴子牧在被打时，幸好大学工作委员会的吴星峰赶到了，吴星峰扑在吴子牧的身上说：我是市委大学委员会派来的，不能打了，再打就打死我吧！这样才把吴子牧保护下来。

当时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稳定社会秩序，北京市委说话没有人听。张霖之在矿冶学院被打死了，我们都不知道。

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北大附中的彭小蒙造反，彭小蒙后来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回答可以不可以成立红卫兵的问题时，被台下起哄打断。当天，我们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检讨，江青、陈伯达等人都在，彭小蒙来到会场对江青等人说有人不让她讲话。江青当时就说，你们市委怎么搞的，为什么不让人讲话。我说我去看一看吧。中央文革小组派王力和我去的。

当时，市委里驻进了一百多个联络站，秩序极为混乱，市委根本不能办公，只好搬到北京饭店、椿树胡同，又转到京西宾馆去临时办公。中央文革小组知道后指责我们是地下市委，怕见群众，要我们回市委去办公。刘建勋说中央批评我们了，我们应该回去。我说不能回去，



1966年，陈伯达在北京师范大学煽动学生造反

回去就出不来了。刘建勋提出他回去试一试，结果，刘建勋被包围批斗了一日一夜，还被迫在给造反组织提供经费的报告上签了字才被放出来。此事中央文革批评市委犯了经济主义错误，收买造反派以保自己。

那时市委基本上是瘫痪的，先是学生然后是工人造反，是京西煤矿的李思聪带的头，他好像是“革造”这一派的，后来做了夺权委员会的负责人。工人造反成立了造反组织，他们在长安大戏院把高扬文找去，谈了一天还不让回来。我在人民大会堂将高扬文被扣的事报告了周总理，我说高扬文的身体不好，有心脏病，可否换一个人去。刘建勋说他可以去，总理同意了。结果，刘建勋一去不返，也被扣住了。周总理派周荣鑫去现场了解情况后才知道，造反派是要逼市委承认他们的造反组织。

我记得我在大会堂向周总理汇报高扬文的情况时，有报告说有人正在冲击国防部。周总理、叶帅、陈伯达都在场，还有几位老帅也在场。情势严重，不容拖延，周总理叫张春桥、戚本禹等去国防部制止冲击。张春桥回来时洋洋得意，对几位老帅说：群众都是很讲道理的啊！是革命的，一讲就撤走了。潜台词是说，为什么你们几位老帅说了就不行呢？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搞乱天下，然后从乱中显示治乱者非他们莫属，妄图实现他们篡党篡政的阴谋，如此而已！

当政府失去 权威的时候

Dang Zhengfu Shiqu
Quanwei De Shihou

二



上次已经谈过一些北京市委的情况。我的记忆不行，再讲一些那时候的情况，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

21

1966年的11月至1967年1月，新市委已经瘫痪，我们不能在市委正常办公了，就搬到京西宾馆办公。这样，又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他们说市委怕群众，已经变成地下市委了。

我讲一讲市委几位书记的情况，一个个惨得很：

李雪峰，主席要他避风头，暂时到天津去了。

郭影秋，被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揪回人大，关在地下室里，天天遭到批斗。郭影秋有病，我们好不容易和造反派谈判后才把他接出来。

陈克寒，自杀了两次。一次在万里的办公室里服了大量安眠药，被发现后抢救过来。另一次他被商业学院的造反派抓走，遭到揪斗后，他从二层楼上跳楼，没有

死，很多地方骨折。市委得到消息后，组织人把他很快送到医院抢救，这一次他又被抢救过来了。有人为此竟批评我右倾，我想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粉碎“四人帮”后，陈克寒同志病逝了。

万里，也被揪斗得很厉害，屡经凶险，后来中央采取措施将他监护起来，由卫戍区执行。

赵凡，被整得死去活来，后来是否被下放到二七车辆厂了，我记不清，起码被关了“牛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高扬文，在市革委会成立之后，被冶金部的造反派揪走的。当时，曾经请示了谢富治。谢富治说：把高扬文交给他们，与冶金部的造反派谈一下，告诉他们不准武斗、打人，把问题交代完后要把人放出来。以后，我还派了一位由部队到北京市帮助工作的同志去看望了高扬文。高扬文是比较晚一点被冲击的，前边的几位遭冲击早一些。

这样，新市委的领导陆续被整了下去。我还算幸运，继续艰难地工作着。以后，市委又补进了刘建勋、雍文涛。刘建勋是从河南调来的，他任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走时，我提出我实在干不了，李雪峰就把刘建勋调到市委，事实上让他负责市委的常务工作。雍文涛是从广州调来的，他是广州市委书记，“文革”前调到国务院任文

办的副主任，好像兼任了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然后又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学校、学生工作。还从外交部调丁国钰同志到大学工作委员会工作，外事口先是调李清泉负责，后来改为了丁国钰负责，大学工作委员会撤销后，丁国钰被留下来了。又从北京卫戍区调黄作珍任市委书记处书记。

刘建勋后来被调回河南，雍文涛被揪斗后提出回广州，这时没有办法了，又调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任书记。

北京市没有市委时，有党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的组长是谢富治，温玉成任第一副组长，我是核心小组的成员，温玉成调走后，我任核心小组的副组长，谢富治还任组长。

“杨、余、傅事件”后，调温玉成任卫戍司令。“九大”以后，温玉成调走，吴忠任司令。吴忠是驻锦州的四十军的军长，他调到卫戍区任卫戍司令后，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

当时，刘绍文、黄作珍、吴忠、杨俊生这四位军队同志都曾进过北京市委书记处。

那时，上边有规定，卫戍区不搞“四大”，因为卫戍区搞“四大”，警卫工作就会出问题。

以后，军队“支左”，“支左”的同志不由卫戍区管理。

1972年，我任市委第一书记，又调了倪志福同志任

第二书记。“文革”期间，市委的领导情况大概这样。

1966年8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我们组织市委的干部到民族饭店听传达。但情况很乱，造反派占据了会场，会议未能开成。

这以后的一天，我在李雪峰家里谈工作，少奇同志来了，他提出要到下边蹲点，取得感性知识和经验。少奇同志选择了建工部的北京建工学院，那个学院的学生比较少一些，学生也还没有分成派。

我不知道少奇同志去了多少次，我们北京市是由李雪峰同志陪他去的，中央文革小组指定戚本禹陪同。后来，建工学院也分成了两派，“八一”派的造反派围攻了中南海。

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学蹲点，我陪着小平同志开过一次全校大会。会议是辩论郭影秋有没有错误，同时去的有陶铸同志。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正在盛传的“二月兵变”进行辟谣，说没有这回事。

这段事情太多，我记不清，谈几件事。

新市委成立后，李雪峰让我找刘仁谈一次话，问一问刘仁还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我和马力一起去的，马力当时任市委的秘书长。我和刘仁原来很熟悉，我们曾在晋察冀一起工作过。见面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说的，他说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彭真犯什么错误我就

犯什么错误。谈话不多，我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当时，叶帅是中央首都工作组的负责人，他看到北京很乱，提出要我们将刘仁和其他市委领导同志送到外省监护。我对叶帅说：送到外省需要中央通知，北京市不好出面直接与各省联系。为了避免意外，我决定先将刘仁等同志送到昌平清华大学的分校，建一个伙食单位，实际上保护起来，防止被造反派揪斗和乱打。

有人直接给江青写信，将这两件事情报告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把我找去，江青说有人来信揭发我和刘仁密谈，她问我与刘仁都谈了些什么。我说没有谈什么。她就我把刘仁等人送到昌平一事作了一顿训斥，指责我包庇“黑帮”，保护“黑帮”。中央文革小组立令我们第二天将这些人弄回来，交给群众，不许有误。

第二天，刘仁等人被狼狈带回市委。刘仁回来后，造反派就吩咐他搞卫生、刷厕所，累得他团团转。过了几天，刘仁忽然不见，后来才知道被拘捕了。看到刘仁朝不保夕的情况，对郑天翔，我也十分担忧，怕出问题，便写了报告。小平等同志批示监护，由卫戍区经办了。

据杨成武同志后来告诉我，在一次会议上，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说我是坏人，说我包庇“黑帮”。周总理便问杨成武认识不认识吴德。杨成武说：在晋察冀时就认识了，他不是坏人。周总理说这个问题以后再研

究。江青等人的文章没有做成，我逃过了一关。

谁知粉碎“四人帮”后，市委有些同志据此来批判我，说我搞了个“反修堡”。这件事，前后都被人批判了。

那时，刘仁同志被整得很惨，家也被抄了。刘仁同志是很坚强的，他只是说彭真犯了什么错误他就犯了什么错误，别的没什么可说的！刘仁同志有心脏病，后来死在狱中，宁折不屈。

“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这件事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动的，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我问过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不知道。

“破四旧”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到处破坏，甚至破坏到了中南海里头。中南海北院紫光阁后边的武成殿房，康熙题写的一块“下马必亡”的碑石都被红卫兵抬走了，后来四处找寻才找回来。红卫兵还把中南海院子里的一些石狮子抄走了。堂堂的国务院也在劫难逃。

首都一带头，“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涂炭生灵，涂炭神州。



1966年，“破四旧”的学生砸烂中央美院的石膏像等艺术品

27

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运动的发展由不得愿望，岂止是动动而已，动刀动枪了。

北京市是在 1967 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

一直到 11 月 18 日，我们当时都搬到京西宾馆办公了，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

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这个通告的措辞是严厉的，但实际没有管用。江青在以后又大讲“文攻武卫”，她接见河南造反派还是安徽造反派时就宣传“文攻武卫”。这样，武斗从“文攻武卫”的口号中找到了护身符，两派都说自己是“左派”自卫，对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武斗问题非但不能制止，而且愈打愈激烈。

1967 年至 1968 年期间，全国武斗很厉害，不少地方具有相当规模，动用较大杀伤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严重的，但我估计，在武斗中死亡的人数大概不下千人。

这是“破四旧”，先是发布通告发不出去，等通告发出去了，又来了一个“文攻武卫”。当时，水龙头总赶不及点火的。

再说一说“大串联”的情况，我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说。我调到北京来后，1966 年 7 月下旬就犯了“资反路线”的错误，开始检讨。市委就不灵了，以后就瘫痪了，可是，我还要工作。毛主席接连八次检阅红卫兵，大概接见了 1300 万到北京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坐火

车不要钱，到处可以吃饭。当时都叫红卫兵，手臂上套一块红布就行，这给组织接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第一次是在天安门举行的。毛主席原想坐在汽车上绕天安门广场一圈。但毛主席的车一出来，争着和毛主席握手的人就把汽车包围了，进不得，退不得。谢富治、汪东兴都在毛主席的车上，他们都急了。我在后边的另一辆车上，一看要出事，赶紧下车向前挤，但根本挤不过去，我被挤得前心贴后背，喘不过气。

后来是组织了部队手拉手把群众分开，才把毛主席

1966年，毛泽东被欢呼雀跃的受阅红卫兵围在中间



硬接出来。我也挤不出来了，亏得一批中学生开出一条道，方走出重围。

我出来后，看见毛主席和刘少奇都在上天安门的电梯口处坐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们说，应该检讨，我组织得不好。

接受这次教训，以后的检阅改为红卫兵坐大卡车经天安门受毛主席检阅。结果也不行，很多人坐不上车。又改为像游行似的，从天安门前走过，但秩序也很乱。很多人一走到天安门就停住不走了，都想看毛主席，只顾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热泪盈眶。

每次都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西苑机场的检阅，那次可能有一百多万人，当时踩死了两三个人，大家都没命地往前拥，形成不由自主的强大人潮。

八次检阅，每次都是周总理找我们亲自布置，当时真是刻刻提着心，怕出事。

红卫兵在北京，包括新到和原来没有离开的，人数最多的一天达到 300 万。当时北京市区的居民也就是 300 多万，不到 400 万人，一时增加了这么多人，吃、住、行都很困难。南方的人要吃大米，北方的人要吃白面，尽量调剂。其实不止是食、住、行，衣也摊上，天凉了，南方来的人还得给他们发御寒军衣。北京市委红卫兵接待站设在先农坛，负责人是国防科委的一位同志，

他很好，还有一些军队“支左”的同志在做招待工作，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昏头昏脑的。这些吃、住等问题是不好解决的，接待站的同志解决不了问题，红卫兵就打骂他们，甚至抓他们去游行，做“喷气式”来批判。这些同志很苦，见到我时委屈得哭，提出不干了。那时，我也被揪斗，但还要劝这些同志，说工作是党交给的任务，不能不干，而且要干好。

有一天，来的人特别多，前门那一带都挤满了，人山人海。实在没办法了，我去找周总理，说北京市各机关容纳不了了，中央各机关我动员不了，如何是好？周总理说通知中央各机关和市委各机关开一个会。于是，马上在工人体育馆开了个万人动员大会。大家都到了，我一说话满场起哄，没人听。无法，我就打电话报告周总理。周总理来了，他要求各机关派人去市委接待站领人，各机关能住多少就领走多少人，管吃管住。中南海也腾出一些地方住红卫兵。

以后按这个办法，一来就通知各方面来领人安排住宿。那时，北京差不多家家户户都住了红卫兵。上上下下，一片沸腾。

后来陶铸提出，这样串联影响铁路等交通的正常运输，听说把火车的窗户都挤坏了，号召走路串联，不坐车乘船，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才有效，慢慢来的人



1966年11月，新疆工学院红卫兵长征队顶风冒雪行进在戈壁滩上，赴北京串联

就少了。

再讲一个事情，“西纠”后来变成“联动”，“联动”被中央文革抓了一百多人，包括董老的儿子董良翮都在内，“西纠”后来不行了。然后起来的是哪一派呢？起来的是中学红代会的头头李冬民。这个案子后来还通报了我一次。

李冬民组织了一个造反派组织“首都兵团”，江青说真正的左派是“首都兵团”，中央文革小组要市委支持它。

中央文革小组真是支持，在“首都兵团”的成立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左”得发紫的人都参加了。周总理也在场。北京市是我和丁国钰、雍文涛参加的。

国务院的秘书长周荣鑫也陪了周总理来。这个大会主要是批判“西纠”。我记得“西纠”是北京31所中等学校的红卫兵组成的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在大会批判过程中，江青故意提高嗓门，问到会的人知不知道谁是“西纠”的后台？参加会的红卫兵说不知道。江青铁青脸说：就是周荣鑫！要大家看一看他，让周荣鑫站到台子的前边。江青接着又声嘶力竭地说：还有雍文涛！这样，当场就把周荣鑫、雍文涛揪走了。

我看周总理的样子，他并不知道江青要点周荣鑫的名字，周总理也紧张了，但镇静地控制着。陶铸从中南局调到中央任常务书记后，从中南局调了一批人，雍文涛就是其中的一位，江青他们的矛头是对着周总理和陶铸的。

我和丁国钰在后边坐着，真有些如坐针毡，坐不住了。丁国钰低声说：他们都点完了，就该轮到我们了。

天知道，一直到散会，也没有点我们的名字。散会时，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人来说，江青让我去。江青问我雍文涛是什么人。我说：雍文涛是中央派到市委工作的，他没有问题，他分管中学工作，他去“西纠”做工作是市委派去的，责任在我。如果雍文涛有问题，罢了我的官算了。江青很生气，让我回去写检查。

我的检讨送去后，江青在上面批了，大意是说吴德



还比较谦虚，但不能不讲原则，雍文涛是有错误的。

周荣鑫、雍文涛被揪走后，好几天都未放回来，我们就派人想办法去找。周荣鑫找回来后，周总理让他在国务院烧锅炉，红卫兵再找他时，就说周荣鑫已经参加劳动去了，实际上把周荣鑫保护起来了。雍文涛被找回来后，在国务院的文办躲了几天。后来，雍文涛提出在北京危险，要回广东，他在广州市还有办法躲避。这样，就采取了一个办法，让广州来的造反派把他揪回去了。雍文涛后来参加了广州市的“三结合”。事前广州还派人来向我作调查，我写了一个证明，说他到“西纠”是受组织派遣的，没有问题。

成立市革委会后，中学红代会的头头李冬民参加市革委会，任常委。

那时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叫做“打闷棍”，一点没错；一个闷棍接着一个闷棍，弄得人晕头转向。

说一说彭真的事情。彭真在他住的台基厂7号，被不知什么人抓走了，是1966年下半年，具体月份记不准。周总理在大会堂找我、汪东兴、傅崇碧、周荣鑫谈话，让我们去把彭真找回来。周总理提出弄清楚彭真的下落，再弄清楚是什么人把他揪走的。我们派人去，茫无头绪，找也找不到。傅崇碧对周总理说，这件事要找戚本禹。周总理就找戚本禹，要他把彭真找回来。实际

上抓彭真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操纵下搞的，戚本禹一找就找着了。好像把彭真关在了戏剧学院。是谁直接搞的呢？后来知道是叶向真、刘诗昆他们。当时，造反派都要抓“资本”，彭真也是一个“资本”啊！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彭真的住地都有门卫，他们是怎么进去的？

知道彭真的下落后，周总理叫我们负责要回来。我提出我去可能要不回来，最好是由傅崇碧、卫戍区出面交涉，把彭真放在卫戍区监护，他们什么时候要批斗，卫戍区什么时候就送去。这样，才把彭真要回来，放在五棵松的卫戍区的一个师部了。

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斗争彭真，造反派就提出要开大会斗争。那次大会斗争了很多人，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林枫。

造反派当时都在抢这些人，哪一派抢到了就有了“资本”，各派有可能为此打起来。周总理让我去和造反派商量，由各个造反组织联合起来召开批斗大会。我去找戏剧学院的造反派，提出他们是否和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师大的什么组织联合起来召开大会，避免发生冲突。戏剧学院的造反派不同意联合批斗。

我又去找地质学院的朱成昭，他住在地质部或是地质学院的四楼上。我和丁国钰去后，但见朱成昭的楼层设置了他的警卫。我说找朱成昭谈事情。这些警卫让

我们等着，他们去报告获准才让我们上去。我向朱成昭谈了联合召开大会斗争彭真的方案。朱成昭同意联合开会，但他提出条件，这个大会要由他们来主持。我提出让他问一问北航的韩爱晶同意不同意。朱成昭当场打电话把韩爱晶和韩的一个女秘书小朱请来了。韩爱晶来后，我告诉他们说，周总理的意见是各派联合起来开大会，至于你们谁主持，你们自己商量，也可以轮流主持。

说通朱成昭、韩爱晶，又找戏剧学院的造反派。经他们反复商量，决定联合开大会，先由地质学院东方红主持，然后是戏剧学院的造反派主持。

这个会还没有开，这些造反派又为由谁主持批判会吵架了，我又去劝架。在劝架过程中，这些造反派忽又钻出一个念头，他们说斗彭真是为了转移对北京市委“资反路线”的视线，这是北京市委在捣鬼，是北京市委的阴谋。矛头对着我来了。我分辩说：这不是由我决定的，这是由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的，不信可以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我挂起电话，好像是陈伯达的秘书接的。我说：他们说我们在搞阴谋，转移视线，我们说服不了这些造反派！

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人到会。来的人好像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他们表示支持召开联合批斗大会，并说这不是市委的阴谋，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戚本

禹没有说几句话，他们就同意开会了。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武斗打死人的情况，城外开始是大兴、昌平发生了乱打乱斗，一夜之间打死了几十个人。先是大兴的哪个公社我记不住了。听说以后，我们立即派人去制止，结果，派去的人进不了村子，村子边都站了岗，不让进，就像禹作敏一样。我们说市里派人去不行，让卫戍区派人去。被派去的是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和市委的秘书长马力。村子里的人看到解放军来了，就让进去了。他们进去后，就做工作。见情况很惨，小孩都遭毒手，村子里的人就是用锄头、镐把等东西武斗。调查后知道，村子里的支部书记为了避免斗争他，就反过来提出斗地富，群众一起来，就打死人了。接着，昌平也出现打死人的事情，我们也是马上派人去制止了。

后来，形势稳定以后，我们把这两个村子的支部书记都抓起来了。

市里第一次武斗在地质学院，大概有“东方红”这一派参加，我忘记另一派是什么组织。一派保地质部的何长工，另一派反对。发生武斗后，因为是北京市内发生的首次武斗，大家都惊得什么似的，我们就火急火燎地报告周总理了。周总理找我、郑维山、丁国钰去，让我们三个人出面与两派谈判，传达周总理停止武斗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周总理还叫郑维山从北京军区派

一支徒手部队把双方分割开。周总理派地质部的一位副部长邹家尤和我们一起去，他做“东方红”对立面那一派的工作，我们做“东方红”这一派的工作。

我们到地质学院后，就找两派的头头来谈，我们一再派人去叫，两派的头头都不来，只让他们各派的参谋长来了。我们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让两派罢兵。谈不拢。我说，这是周总理的指示。但他们根本不听。

夜晚时，有人送给我一张条子，条子的内容大意说，派关锋、戚本禹同志为联络员来解决问题，条子的署名是陈伯达。又过了一会儿，又有人送来一张条子，叫我们与戚本禹谈谈。我对送条子的人说：不知道戚本禹在哪里。这个人便领着我找到了戚本禹。我向戚本禹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戚本禹听完后说：这个办法不行，你们要支持“东方红”，他们是左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戚本禹还说：你们是站在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一边，还是站在另一边？口气相当无理。

戚本禹又说是否可以这样，“东方红”今晚有个大会，你代表市委主持“东方红”今晚的大会，把那个姓邹的地质部副部长交给他们批斗一下就回去，他们只批斗半个小时。

我说是周总理让这位副部长和我们一起来的，怎么好来批斗呢？

戚本禹说批斗的时间不会长，不然解决不了。

我叫丁国钰先回去了。郑维山看到这个势头也借口走了。我留下参加“东方红”的大会。他们说你先说几句，然后批斗一下地质部副部长，最后由关锋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当时，朱成昭还不同意由我主持会议。我看见戚本禹与朱成昭嘀嘀咕咕地商量了一阵，最后，戚本禹对我说，你来主持。

开会后，他们派了两个人先批判了邹副部长，然后把他送回去了。以后，关锋念了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好的稿子，大意说：“东方红”是革命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东方红”这一派。关锋念后，宣布大会结束。

我回来后，很不是滋味，强打精神向周总理汇报说武斗已经停下来了。周总理听后说那好，就没有再说话。

事实上，北京的武斗大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操纵的。清华、北大、地质学院、七机部、文化宫、西单商场、棉纺厂、水泥厂的武斗都很厉害。

当时，我说话没有人听，但一有武斗，谢富治就让我和黄作珍去制止。

西单商场武斗，我们正在现场。武斗起来了，有人用弹弓夹着钢球打到黄作珍的腰上，黄作珍的腰好几年都没有好。一个老工人推了我一把，把我推到角落里，保护了我。这次武斗是由“财贸尖兵”头头洪振海现场

指挥的，后来把他抓起来了。实际指挥武斗的人就在市革委会，叫周景方，是学部的人，这些人和戚本禹有关系。百货大楼的武斗也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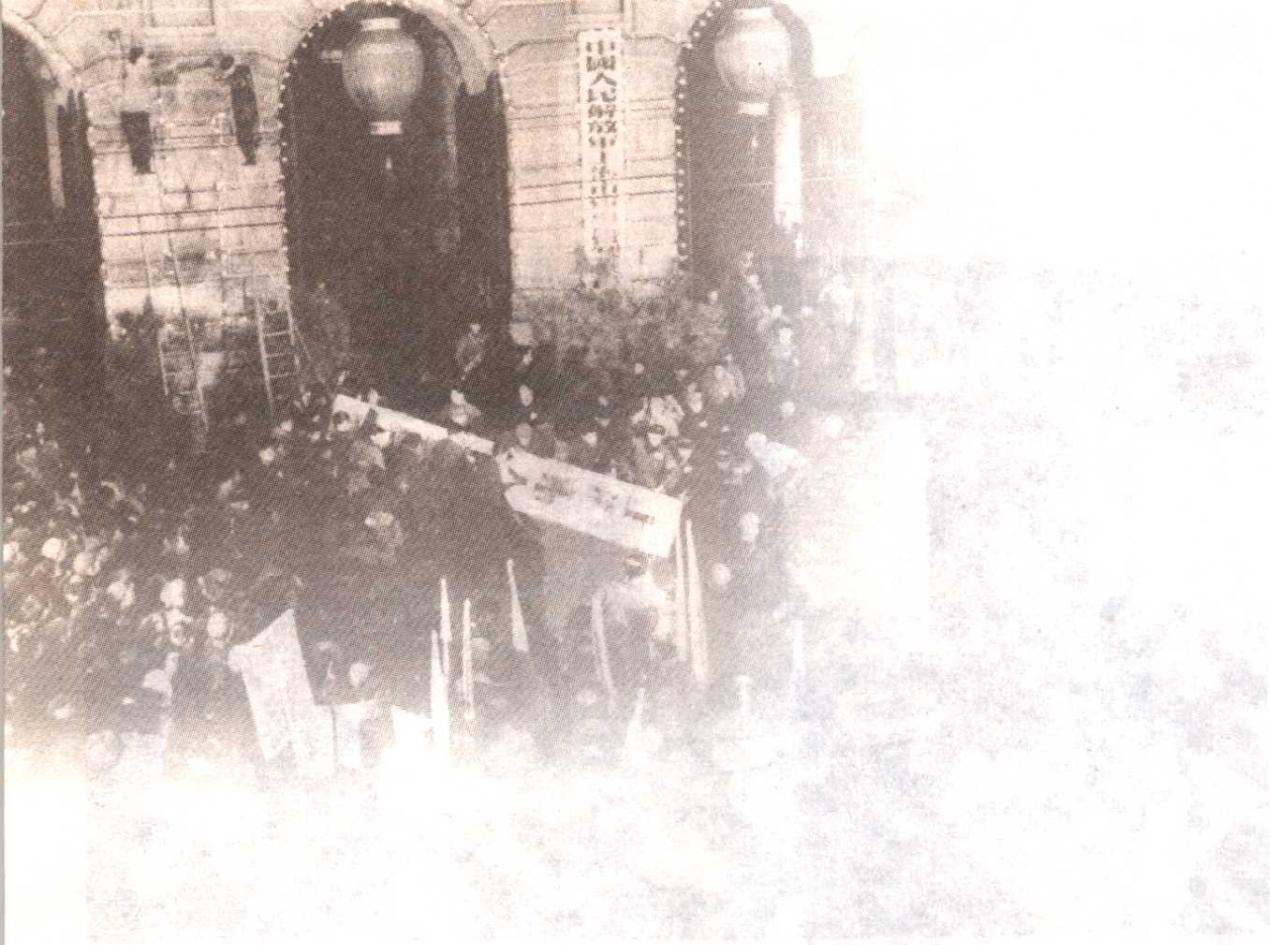
民族文化宫发生武斗，谢富治让我带着“五大领袖”去制止。一到民族文化宫，“五大领袖”都溜走了，武斗实际上是他们操纵的。结果，武斗没有被制止，我反而被困在那里了。我看到武斗的人员在集合。这时，戚本禹的秘书出现在我身边，他说他正好经过民族文化宫，就来了。这位秘书是位军人，很年轻。我对他说我处理不了武斗，我本人也出不去了。这位秘书说，他帮我出去。他找了两派的人，说他是戚本禹的秘书，是中央文革小组派他来的。他找两派一谈就解决了。

我不由暗叹，我一个北京市委第二书记，说话还不如人家的一个秘书顶用。

“一月风暴”以后

“Yiyue Fengbao” Yihou

三



“文化大革命”愈来愈带上它的疯狂性，它要“更加深入”地发展。1967年伊始，党的主要喉舌《人民日报》发出了“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的号召，要求对党内的所谓“走资派”展开总攻击。在上海便发生了“一月风暴”，用张春桥的话来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北京的新市委也被中央文革小组所支持的造反派于1月18日夺了权。

前面说过，在这之前，华北局内部造了李雪峰的反，他在北京市派工作组的问题也被揪住不放。毛主席叫李雪峰暂时到天津避一下，在天津指导天津、北京的工作。李雪峰让我暂时主持北京市的日常工作。我提出干不了，李雪峰就让从河南调到华北局工作的刘建勋帮助我，刘建勋实际是常务书记。



1967年1月3日，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开会
庆祝夺权成功

44

造反派夺权后，成立了夺权委员会。对此，中央并没有正式表态。但我给周总理打电话已不接，或者周总理对这时候的事态一时也无能为力？

我和高扬文、丁国钰等几位书记被造反派定为走资派，和市委常委们一起被关押、批斗了四个多月。造反派开始把我们关在虎坊桥北京市工人俱乐部里，一天只给吃一顿饭，后来把我们分散到各个工厂。

其间，中央文革小组把我要出来，要我与造反派商量共同夺权，组织北京公社，召集各造反头头开会。造反派的头头们说我已被夺权，没有资格谈此事，把我轰下台来。我到人民大会堂找到周总理，周总理带我到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和他一起接见学生、工人造反派的头

头。这些人间：吴德是个什么人，有没有问题？周总理就说：他来北京不久，执行了“资反路线”，执行“资反路线”错误也有轻有重嘛！但江青说：吴德这个人不认识，有错误可以批判。

这样，我又回到了被关押的地方。这期间，我们经常被揪斗，高扬文挨斗最多。他原在冶金部工作，主要是冶金部的人斗他。斗争我的人主要是吉林来的人。看管我的人是北京市第一机床厂的工人，他们对我不错。有一天早晨5点多钟，吉林来的造反派跳墙进来揪我，被一机床厂的工人看到了，双方差点打起来。一机床厂的工人们说：我们也是造反派，没有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信不能揪走，他欠北京的债我们还没有算清。要动手你们不行，我们一个电话就可以调来一两万人。这样，才把吉林来的造反派挡走了。

这样的情况多次发生，看管我的工人让我自己找个地方躲起来。我想来想去，想到我还兼任北京卫戍区的政委，就找到了定阜大街卫戍区机关。刘绍文政委让我住下来了。卫戍区机关的驻地是清王朝的庆王府，刘绍文安排我住在王府绣楼里。傅崇碧同志知道后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指示不准我在军队避风，我只好又回到被关押的地方。

新市委被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夺权后，1月

份，中央决定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谢富治任组长，郑维山、傅崇碧、刘建勋等人都是“革筹”小组成员。我们那时还被关着，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刘建勋那时虽然被关着，但他是“革筹”小组的成员，他有进出的自由，我们就从他那里听到一些情况。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是谢富治，副主任委员有我、郑维山、傅崇碧和聂元梓。成立之前，刘建勋告诉我先曾开过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谢富治到关押我的地方对我说：毛主席认为北京市夺两次权影响不好，中央叫你们出来工作。我说我们出去也不好工作了。谢富治说：你、刘建勋、高扬文几个人出来先亮亮相。

那时的所谓亮相，就是要我们再检讨。于是，我们三个人在千人的会、万人的会上检讨了个把月，牵来牵去检讨了十几次。最后一次是在东郊体育馆召开的市机关造反派代表万人大会上，我们三个人又进行了轮番检讨。大概是谢富治和造反派已经说好了，允许我们出来工作，聂元梓就在大会上代表造反派讲话，说我们的检讨基本上可以了，但还不够，以后要继续检查。聂元梓给我们拖了个尾巴。

我们的“亮相”告一段落。事实上，这是毛主席说要让我们出来工作，他们不得不让我们出来工作。但是

他们总要抓个辫子在手里，留个尾巴不放。

那时，我的心情十分矛盾，不太想出来工作。我考虑过干不干。干吧，我是被造反派视为有所改悔的走资派被结合进来的，说话没人听，挂名而已；不干吧，又是毛主席说的、中央决定的，个人应服从组织。衡量再三，我最后还是当了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参加了党的核心小组。

北京市党的工作由核心小组负责，核心小组的成员也是革委会的这些人，组长是谢富治。

北京市革委会刚成立，刘建勋开始还参加了几次会议，以后就不参加了，不久就调回河南去了。

早些，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把原市委各部、各办的人全部下放到工厂、农村劳动。我出来后第一次到市委机关，一个人也没有，我还想市委怎么都空了呢？

新进来的人大都是王、关、戚支持的学部的那一派，约有二十多人。哲学所的造反派头头周景方担任了市革委会的秘书长，杨远担任了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等于市委的办公厅，一切机要都由杨远控制。当时，各部、口都取消了，新成立的各组都被学部来的人把持。《北京日报》在新市委时就已经停刊了，造反派反对我们从河北调来的翟向东、山西调来的吴象、天津调来的林青，林青后来自杀了。造反派一闹，就出不了报纸了，我打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场

电话向陈伯达请示如何处理。陈伯达说：北京市这么多报纸，《北京日报》可以停刊。这样《北京日报》就停刊了。革委会成立后，《北京日报》恢复出版，学部派来的屠武生控制了《北京日报》。实际上，真正控制的是吴传启，吴传启背后操纵屠武生，所有的社论、消息都要经过吴传启看过。

市革委会又从中央各部、各学校调进来一百多人，这些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头头。“五大领袖”除聂元梓任革委会副主任外，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都成为了革委会的常委，中学红代会的李冬民、第二机床厂的鲁文阁、光华木材厂的刘锡昌等也都是常委。其他的造反派都分到各组去了，北京市的权力实际上是中央文革小组一手控制，戚本禹直接抓的。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老市委的人和新市委的人统统下放了，进来的一批人成立了“红色政权”。1967年4月20日召开了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有十万人参加。

但是，红是“一片红”了，可并不是铁板一块。造反派头头都有自己的野心。由于权力分配的问题，学生造反派分裂为“天派”、“地派”，相互争斗。“天派”以聂元梓为首，反对谢富治；“地派”保谢富治。蒯大富、韩爱晶动摇在两边。一时间乌烟瘴气。

虽然我已经出来了，但实际上靠边站，说话没有人听，连住还是住在被关押的地方，我到大会堂开会，后面还有几个造反派来押送、监视，根本无法工作。

这以后的情况比1966年至1967年我们被夺权时更热闹了。

比较大的事情，包围中南海、火烧英国代办处、大型武斗，接连地发生了。

1967年7月发生的包围中南海，我看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插手的，戚本禹与操纵市革委会的周景方直接发生联系的。包围中南海是由北京建工学院开始的。1966年8月，少奇同志曾在作为他的一个点的建工学院讲过“文化大革命”问题，建工学院的学生以此为由头大造刘少奇的反。当时，建工学院的学生已分裂成“老八一”

和“新八一”两派，两派都要揪斗刘少奇，都要刘少奇交出所谓“认罪书”。刘少奇迫不得已交了由王光美笔录的检讨后，被操纵的学生造反头头非但没有就此罢休，反而煽起更大的火，串联各校到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斗刘少奇的誓师大会。由此开始，许多造反组织便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包围中南海，狂呼“刘少奇滚出中南海”。由于毛主席不在北京，中南海里造反派也起来配合，不仅批斗了刘少奇，强使低头弯腰，还抄了刘少奇的家。包围过程中，周总理一直在中南海，也有人劝他离开中南海，周总理说毛主席不在，我不能离开。

一直闹了很长的时间。我去看过两次，一次是乘着汽车转了一圈，第二次是去找了建工学院的人，我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在8月里的事。闹得最厉害的是外语学院、外交部的人，加上一些学校。火点着后，我对周景方说：这个要去看一看，想法怎么样制止。周景方不去。我又说：你不去不行，你是市革委会的秘书长，我和你一起去。

火烧英国代办处时，在代办处的外边由卫戍区的部队把英国外交人员保护起来了，部队的战士围成了很多层的保护圈。我看到英国的代办好像很害怕地在地上蹲着。



我们去后找那些组织的头头。找不到，人们都说不知道。实际上周景方可能知道，他就是不配合。我没办法，就回来了。

第二天夜里，周总理召集外语学院两派开了一夜的会，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参加了，谢富治也参加了，我和丁国钰去了，坐在后边听。周总理、陈伯达、谢富治坐在上边，周总理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是错误的，要求外语学院的两派停止这些行为。外语学院闹得很厉害，两派在会场上还打架，不同意周总理的意见。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外交部、外交方面的事情是由周总理管的。便没有说别的，既没有表示支持周总理，也没有批评造反派。

接着是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的武斗，清华、北大的武斗，民族文化宫等一系列的武斗。内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一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人布置的。我曾问过谢富治怎么处理？他说这个要请示中央文革小组。谢富治那时根本没有要去制止的积极态度，也不愿多跟我谈，任凭连着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外交部闹得很厉害，姚登山夺了外交部的权，他曾是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的代办。外交部的会我们不参加，听说周总理给他们开了一夜的会，姚登山操纵这个人讲完那个人讲，就是不散会。我听当时周总理的秘书周家

鼎告诉我，周总理的心脏病发作了。周家鼎找姚登山说：如果周总理要发生问题，你负责任。最后，把姚登山监视起来了，姚登山没有办法才宣布散会。姚登山与中央文革小组有一定的关系，过了几天，他就成了外交部的大红人物。不过他也昙花一现。

最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说一下。那时我已经出来了，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代表团带着北航“红旗”和其他学生造反派到四川去解决四川问题，以后到武汉。谢和王支持了与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的对立派，把“百万雄师”称为保守组织，激化了矛盾。拥护陈再道的“百万雄师”这一派，包围了王力，抓了他、打了他，把王力揪走了。中央代表团的人被打伤、被架走了，这可不得了。周总理亲自到武汉，找了陈再道谈，把王力弄了出来。

中央决定北京组织一万人到西郊的西苑机场欢迎谢富治、王力。这时，我才知道谢富治和王力的去向。因为是临时通知，到机场的人不足一万，都是陆陆续续去的。我到时，王力这些人已经下了飞机，好像是用轮椅推着王力的。

然后通知北京市组织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会，说要由林彪讲话。我记得天安门城楼上没有很多人，王力的腿上还打着绷带，说他是人民英雄。林彪在讲话中提

到军队一小撮走资派问题。

从此，提出了“抓军内一小撮，在部队中揪走资派”的口号。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被撤，刘丰升任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陈再道被弄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不时挨斗。

谢富治在市革委会讲话，说了过程，吹捧王力。看谢富治样子，在尽量靠拢。

林彪讲话提出揪部队中的走资派问题后，就把它具体化了。新华社和党的主要报刊提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全国掀起揪斗军内干部、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以后又否定，毛主席提出“还我长城”。这样，又说不是林彪讲的。陈伯达也不承认是中央文革小组提的。当然这是赖不掉的。林彪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王力，要把所谓军队走资派揪出来，也有他的目的。

1968年3月又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杨、余、傅事件”。那天晚上，傅崇碧同志在市委我的办公室和我闲谈。傅崇碧和我都曾在晋察冀工作过。他是六十三军的。他看着手表说：快到时间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他说通知去大会堂开会。说完，他就走了。第二天，市革委会开会，没见谢富治、傅崇碧、郑维山等来。我想谢富治在公安部忙，不来，傅崇碧、郑维山应该来。我打电话给卫戍区找傅崇碧，卫戍区说不在。我又打电话

给谢富治，说会是不是由你主持？傅崇碧没有找到，他到哪里去了？谢富治说：你不要问，过几天会开会的。我纳闷。

我是卫戍区的人都不知道，不过我对这种事也习惯了，不要问的事就不再打听。过了两三天，到大会堂开会。我的旁边坐了卫戍区的副政委刘福，他偷偷地告诉我：傅崇碧出事了。我问出了什么事？他不好多说，也许他也不完全清楚。“文化大革命”中没头没脑的事太多了。一些人都战战兢兢，朝不保夕，谁知道会飞来什么横祸。

这时，就看到会场的台上忙碌起来，一会儿搬上来几把椅子，一会儿又撤下去几把椅子，搬上来和撤下去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又过了一会儿，我看叶帅、李富春等都从旁门进来，坐在了第一排。我想：这些人怎么都坐在第一排，没上台去坐呢？这时，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就大摇大摆地进来了，周总理也在，他们都坐在台上了。黄永胜一进来就吼起嗓子呼喊“打倒杨、余、傅”的口号。

我们坐在中间，看到这情景，觉得问题大了。接着林彪讲话。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说“杨、余、傅”是华北的山头，要粉碎这个山头。他讲了不短的时间，恶声

恶气。林彪正在讲话时，毛主席出来了，大家就鼓掌，毛主席向大家招了招手，没有讲话就又回去了。这场面就更使人紧张了几分。

但我们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中央文革小组要卫戍区抄傅崇碧的家，找他所谓冲击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地点所带着的手枪。

以后开了十万人的大会，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都讲了话。陈伯达讲了这是第五个回合的斗争。我们是组织大会的人，都不让我们进主席台，我们躲在体育场的一个打电话的小房子里。

后来知道杨成武是经常跟着毛主席出去的，为林彪所忌恨。杨成武找我谈事情的经过时说，他家为此死了三口人，一个是女儿自杀了，一个是他夫人赵志珍的哥哥还是弟弟，被押到河南，在那里死了……

傅崇碧是华北的。余立金与吴法宪不对头。余立金，我不认识，放出来后才看见他的样子。

抄傅崇碧的家，这时是温玉成任卫戍区司令。我听吴忠告诉我，没有在傅家抄出来什么东西。

江青在十万人大会上说傅崇碧的罪状是冲击钓鱼台。傅崇碧放出来后跟我谈了这个事情的过程：许广平跟江青还是别的什么人说，鲁迅的手稿被人拿走了。中央文革要傅崇碧找，他查到了经手的这个人，这个人是四川

部队的，说鲁迅手稿就是中央文革小组让拿走的，就存在钓鱼台的楼里。这个事情弄清楚后，傅崇碧便带着他的秘书到中央文革小组去汇报。一开始还不让进去。傅崇碧打电话给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才让进去。江青、姚文元参加了，陈伯达参加没有不知道。傅崇碧就汇报了查找的情况。开始，大家还在听，当傅崇碧说是中央文革小组从许广平处取走了鲁迅的手稿后，江青一家伙就发火了。傅崇碧的秘书有病，江青一闹他就晕了。傅崇碧的秘书好像姓邵，他拿着傅崇碧的皮包，这个秘书紧张、害怕，手忙脚乱，把皮包扔到了地上。于是，江青就说是用皮包向她砸去，姚文元后来还证明，说他当时看到用皮包砸江青，皮包里有两支手枪。

“杨、余、傅”问题，大概是林彪向毛主席讲的。林彪逃亡之后，毛主席批示：“杨、余、傅”一案有错，我听了一面之词。毛主席的这个批示在政治局传阅，我们都看过。

“杨、余、傅”很惨：杨家死了三口；傅崇碧调到沈阳军区后，一到沈阳就被弄到辽源的煤矿囚禁起来了。傅崇碧说宣布他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前，把他警卫员的枪和皮包都下了，进去就宣布他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而且连夜立即走。

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面前，许多的人遭受了

不幸！

“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口号，是“砸烂公检法”。我出来前，市公安局让政法学院的造反派进驻，这些造反派就驻进去了，代行了公安局的职权。他们进去后，打了不少的人、抓了不少的人，而被抓和被打的人都是他们这些造反派的对立面。社会秩序一下就乱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公安局实行了军管，开始负责的两个人，一个叫牟立善，另一个人的名字我忘了，后来他们调到二炮和山西去了。接他们的人是刘传新、王更印。后来一翻过来，王更印被判了十年徒刑，太重了，冤枉的。刘传新是一个军的副政委，王更印是一个师的政委。

我出来时已经军管了，快实行“三支两军”，军队要“支左”了。北京市最多时有三万人“支左”，海、陆、空都有。“支左”的人的关系是双重领导：一方面归卫戍区，由卫戍区组织一个办公室来管；同时海、陆、空三大总部也设有“支左”办公室，又归北京市革委会谢富治来管，谢富治是通过卫戍区来管的，但卫戍区管不了。市革委会的决定，这些军队的人员先要回去向他们所在的各部请示，如果请示同意了，他们才照办市革委会的决定。那时，造反派夺权了，各方面都瘫痪了，很混乱，只有军队还有威信。

军队“支左”，他们不了解情况，就对生产、地方工

作瞎指挥，犯了不少错误，对军队有不好的影响，但是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军队“支左”，局面就更难收拾了。揪军队走资派，砸烂公检法，包围中南海并安营扎寨，火烧英国代办处，武斗蔓延，都是这个时候。后来发展成了清华、北大的武斗，打死不少人。在清华，一边是“井冈山兵团”，一边是“四一四兵团”，怎么也解决不了，谢富治去也不灵。

军队“支左”也是波折很多，一开始是不知道群众组织的情况，都支持了。突然间，中央文革小组批评“支左”支错了，让“支左”人员掉屁股。

这个掉屁股的过程，军队犯了很多错误。后来又批评把屁股又掉错了。军队那时很难办，没有一个大军区

1967年，解放军进驻北京航空学院“支左”



不检讨的。

然后才撤出“支左”，我记得纪登奎他们起草了这个文件。

清华、北大的武斗制止不下来，毛主席决定同时组织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北大。后来的军宣队是由8341部队的人组成，迟群、谢静宜就是以军宣队的面目出现的；工宣队是由北京新华印刷厂发起，动员了三百多名工人组成的，拿着毛主席语录的小红本，开进清华宣传。

决定以后，谢富治让我赶快找蒯大富，让他表态服从这一决定。我派人找蒯大富，等了很长时间才把他找到，他不在清华，跑到北航去了。他来后，向他宣布了这个决定，要他拥护、执行这个决定。蒯大富答应得很好，说一定执行。

当时，想不让蒯大富很快回去，拖住他，利用谈话的时间使工宣队、军宣队顺利进去。我们在谈话时，工宣队就进去了。蒯大富提出他要回去了，就让他回去了。

哪知道蒯大富回去后，让“井冈山兵团”拒绝这个决定，并且用他们自己制造的土武器和手榴弹打死了四五个进行劝导的工宣队的成员，同时还打伤了几个。

组织进驻工作的是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副司令员李钟奇，他们就在距清华不远的一个公园里指挥。李钟

奇坐车进到学校后，“井冈山兵团”把他包围了，把他坐的汽车掀翻了，把他的文件包也抢走了。李钟奇回来后连说糟糕。我说，想办法把文件包要回来。

工宣队进驻，遭到了“井冈山兵团”的武力对峙。这样不行，毛主席就召见“五大领袖”。参加会议的人有江青、谢富治、温玉成。我做具体找这些人的工作，会议开了不长的时候，就允许我参加了。

蒯大富也是后到的，找了他很长时间。蒯大富一进去就放声大哭。毛主席主要是说服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时也安慰了几句。蒯大富这一哭真还起了作用。江青好像也抹泪了。谭厚兰有这个谈话的详细记录，谈话的全部内容我记不准了。

毛主席当着他们的面，派谢富治和我到清华去。

我和蒯大富、韩爱晶三个人，便坐同一辆车去清华。那时，很紧张，在清华的外边也聚集了众多的校外的两派群众，火药味儿都很浓，一派支持“四一四”，一派支持“井冈山”，特别是体育学院的，腰圆膀粗。支持“四一四”这一派的人要抓蒯大富。我一面说这怎么办？一面就让蒯大富和韩爱晶坐在后排。我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把头特别伸出窗外，汽车一边走，我一边向两边的人打招呼，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我们就进去了。到了“井冈山兵团”以后，说明来意，开始很多人不同意，

哭哭啼啼的。我说他们真没出息，哭什么！这是毛主席的决定，要放下武器。

这样，慢慢地把武器放下了。

以后，谢富治来了，召开了大会，“井冈山”开了会，“四一四”也开了会。工宣队和军宣队终于进去了。后来，北大也派了工宣队和 8341 部队进驻，再没有阻挡。清华和北大的武斗才停止下来。

北京市抓 “五一六”的情况

四

Beijingshi Zhua

“Wuyiliu” De Qingkuang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事情起的时候急，收的时候疾，跟不上挨批，跟上了又错了，又挨批。

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也这样。北京市的革委会筹备时，把原来的老市委、新市委的人统统下放了。进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王、关、戚”那一派的，主要是学部的人；还有学生，“五大领袖”；还有工人，如刘锡昌、鲁文阁等。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基本控制在中央文革小组手里，戚本禹在抓。有一种说法，不知是不是真实：开始成立革委会时，戚本禹要当革委会的主任，直接抓了很多事，革委会的成员很多都是戚本禹的人。听说毛主席不同意。谢富治任“革筹”小组组长以及任革委会主任后，一方面积极向中央文革小组靠拢，另一方面又与他们有矛盾。周景方是市革委的秘书长，曾几次给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写信告谢富治的状，说谢富

治阻碍发动群众。

革委会中很多戚本禹的人，想把谢富治架空，所以才出现了保谢的一派和反谢的一派。保谢的这一派叫“地派”，还是戚本禹抓的一派；反谢的一派叫“天派”，是聂元梓抓的。我们当时知道，这两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在背后直接操纵的。

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被抓起来了，当时说先关王力、关锋，留下戚本禹加以分割。以后，戚本禹的活动更频繁。1968年1月，把戚本禹也关起来了。

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先发迹，也是最早倒霉的暴发户。他们得意的日子不长，却罪恶累累，他们的垮台是罪有应得。例如，煤炭部长张霖之的死就同江青、戚本禹有关系。1966年12月，戚本禹学江青的舌，在矿业学院的大会上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鼓动学生“要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击”。结果，张霖之被造反派残酷批斗和刑讯，不到一个月就被折磨死了。

也是在江青的唆使下，戚本禹策动中南海里造反派贴朱老总的大字报，诬蔑朱老总是“黑司令”、“大军阀”。在1966年11月的一个夜里，在中南海、全国妇联、北京的大街上贴出了“打倒朱德”、“打倒康克清”的大标语。戚本禹还到人民大学去煽动，透露人民大学

的副校长孙泱曾给朱老总当过秘书，要造反派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一夜之间，在人民大学校园内外，贴出了许多“打倒朱德”的大标语。在1967年2月初，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开始组成“揪朱联络站”。

1967年3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来头很大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大肆污蔑，恶毒攻击刘少奇是什么“假反帝、真投降”，“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中国的“赫鲁晓夫”。戚本禹因此声名大噪、红极一时。

与此同时，戚本禹还唆使韩爱晶等人贴“打倒陈毅”的标语，在首都组成“批陈联络站”。1967年4月，戚本禹在陪同陈伯达接见“批陈联络站”等组织时，鼓动说“外事口的盖子还是要揭开”。一时间在外事口、外交部等单位又掀起了揪斗陈毅的风。

1967年5月中旬，江青把他们从上海弄来的一份诬陷周总理的材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给林彪、康生和周总理，还居心叵测地写了一封信，说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周总理为此不得已写信向毛主席报告，附上有关历史材料说明真相。这个启事是1932年国民党在

上海伪造的，周恩来当时已到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康生知道这件事，陈云、康生他们当时在上海还及时揭穿过敌人的阴谋。在毛主席的阻挡下，江青等人的罪恶阴谋才没有得逞。此事，听说戚本禹也是搞了一手的。

1967年7月中旬，彭德怀同志被残酷批斗，也是在戚本禹的怂恿下，韩爱晶等人对彭老总大打出手，把硬铮铮的彭老总的肋骨都打断了。戚本禹的罪行，在这里只能举一些例子。

“王、关、戚”倒台以后，周总理专门找了谢富治去谈，后来把我和傅崇碧也一起找去参加谈话。周总理向我和傅崇碧明确交代，要把与“王、关、戚”有关的人员，清理出市领导机关。

我们回去，经过研究，首先把杨远抓起来了，让周景方等学部的人统统回了原单位。周景方回到学部后，另一派认为戚本禹已经倒台，也就一下子呼啦起来，声势很大，揪斗了周景方等人。周总理让我们贴出类似布告的东西，要求不要揪斗。后来，周总理让以监护的名义把周景方逮捕了，是傅崇碧去执行的。

由戚本禹派到市委的学部和其他单位的人全部回到了原单位，对市革委会以及党委成员，如“五大领袖”和其他学生中的造反派头头、工人造反派，学生毕业的就分配了，工人造反派的人员回到原来所在的工厂，这

个活动清理出去了一百四五十个人。市革委会里这样就几乎没有了人了，工作又近乎瘫痪，不能开展。市革委会抓紧陆续从部队“三支两军”人员中调来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同志，从中央各部委调了一些没有什么派性的同志，又加上原市委下放的一些干部，这样就等于重建了市里的领导机构，等于又一次改组。

调来的新同志是五湖四海，大部分不是造反派。原来革委会领导机关存在两派的问题一时没有市场，慢慢地在消除。

这些步骤都是周总理和我们商量、给予指示和我们想了办法的，很多人不晓得这个情况。

这是谢富治期间出现的一波。原来都是造反派，后来“王、关、戚”倒了以后，清除了一下。清除后，重新组织了市革委会的领导机关。周总理当时明确地说：那些人不清理，你们市里稳定不了，你们也工作不了。

这以后，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1968年的时候，具体的月份我记不清了，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派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告市里谢富治的状。她说谢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团”是反周总理的，是反周保谢的，海军宣传队进驻外国语学院后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团”一边。

章含之教毛主席读过英语。毛主席当时对她的信作了批示。批示大意是批评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说要市委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要周总理出面去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毛主席还说：“五一六”从极左跳到极右。

以后又有一次，汪东兴同志找我去阅看毛主席对市里有关北师大的一个报告上的批示。毛主席的批示又批评北京市，说就是不抓“五一六”。在北京市报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的地方，毛主席的旁批写道：这就好了。

这样一来，谢富治很紧张。周总理找谢富治谈过话，内容我不清楚。谢富治回来告诉我们，周总理指示要李作鹏、谢富治和我研究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到外国语学院“支左”的是海军）。周总理提了三条：一是“支左”海军军宣队作检讨；二是市革委会作检讨；三是海军的“支左”人员撤出大部分，留下一小部分，派8341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领导斗批改，这样可以使海军、北京市革委会解脱出来。

市里派谁去检讨呢？谢富治去不合适，因为有人保他，也有人反他。就确定由我、丁国钰、刘绍文同志一起到外国语学院大会上检讨，我们检讨时，上纲到我们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以后，我们就不管外国语学院的事了。

这以后，江青、谢富治开了市革委各部门的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分子。

到底有没有“五一六”反革命组织？一时难说。在北京是有过反周总理的“五一六”造反兵团。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奇为首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6月2日，张建奇就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提出23个问题责问周总理，大字报贴在了很多地方。紧接着，大概在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的头头刘令楷与张建奇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筹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当时，社会上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风潮正趋于高峰，外国语学院的“六一六兵团”就对陈毅发起进攻，矛头指向周总理。1967年七八月间，以北京钢铁学院的“五一六”一派反总理为起端，许多污蔑攻击周总理的反动传单，贴到了北京市的一些闹市区，什么“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等等。反动传单上署了“首都六一六红卫兵团”的名。打击这些反动行为，打击这些造反群众组织里的坏人是必要的。但到底有没有一个经过填表的严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这却是清查过程中发生的疑案，恐怕是逼供信的产物。什么是“五一六分子”？好像是

以反周总理为标志，实际上包括涉及“揪军内一小撮”等问题都在内，也就是所谓“三指向”者，把矛头指向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向了人民解放军的，指向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摊着一项，就都是以“五一六分子”论了。“五一六”定性的扩大，使“五一六”问题大无边际，成为了全国性的问题。“五一六”问题愈是严重扩大，所谓“五一六”的反革命组织问题就愈是被搞得玄而又玄。最后，不仅在北京抓“五一六”分子，而且在全国抓“五一六”分子。这里固然打击了一些造反上来的坏人，但也使许许多多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和打击，特别是当对立的两派在互揪对方的所谓“五一六”问题时，造成的扩大化就更可怕了。

抓“五一六”问题也时伏时起，1970年3月27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要求进行清查和重点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指定我任抓“五一六”的办公小组的组长，公安部的李震任副组长。

这时，各机关开始抓“五一六”分子，提出查他们的登记表、组织情况等等，我们怎么查也查不出来东

西，只有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总理的比如“六一六”等组织都是“五一六”分子，戚本禹是反对周总理的，搞周总理的什么“伍豪启事”，该是大号的了吧。

我们开了若干次小会，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登记表和组织情况等线索。但谢富治在报告中仍然说“五一六”是有组织的、有后台的等等。

北京市也组织了一个抓“五一六”的办公室，由市委宣传部部长张铁夫负责这个工作。就在这时，北京的一些工厂被坏头头夺了权，那时，各级都在夺权，很多工厂因此停产。有一部分工人造反派的头头很坏。

北京市面临工矿企业的大面积停产危险，怎么制止？这时，周总理在外交系统作了一次反极左的讲话，我们就借这个形势，提出反极左，把一些破坏生产的坏头头、打砸抢很厉害的分子作为“五一六”问题来抓。

市里开始成立的叫“批清”办公室，临时调了一二十个人，主要是“三支两军”的同志多一些，负责人是市委宣传部部长张铁夫和李立功。批极左思潮，市里发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是针对蒯大富搞的极左谬论的，突出抓了“造谣一千次就变成真理”、“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踢开党委闹革命”等等这样的谬论。这次批极左思潮搞了一段时间。借此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提起

来了一批老工人负责生产，发动群众，稳定了生产。

1970年春，市里就布置清查“五一六”。一开始，下边就有个问题，有的单位就交代了：有组织，叫做“五一六兵团”，还有什么政委、兵团司令。说得头头是道。有的人还交代填了什么表。这样，就有一阵子追查组织甚至有的单位就追查表。这就搞得触动的人比较多一点。

这样搞了几个月，大概搞到最多的时候是群众揭发出来涉及五万多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人，下边报上来的重点人是七百多人。办留宿学习班，全市最多时有三千人。

有一段时间，下边报上来的揭发数字天天往上涨。发现不对头了，哪有这么多的人，如果是反革命组织怎么能弄到那么多的人呢？张铁夫很怀疑，就向市委汇报。市委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决定抓住一头，甩开一头。所谓抓住一头，就是抓住几个反革命案件，指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几个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查事件、查人物。所谓甩开一头，就是不要追什么组织、什么表，一般的，没有罪行的，就不要去折腾人家了。

这以后就集中力量，查事件、查罪行，逐渐搞了核实、定案。

当时，我们组织查了几个事件，是涉及到全国性的东西。一个是围困中南海，几十万人安营扎寨；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个是午门大会，就是香港问题。这三个都是对着周总理的。

在清查中发现他们有一句口号，叫做“要揪一个永远健康以下的、保人保得最多的、揪出来让你吓一跳的人”，矛头所向清清楚楚。

以后，我们在清查中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我们清查的这几个事件，都涉及到他们反总理。围困中南海，他们就是想把总理轰出来，戚本禹就逼周总理搬出中南海。然后，他们冲进去，抓刘少奇，再嫁祸周总理，他们是这么个阴谋。火烧英国代办处也是这样，总理负责外事嘛。午门大会也是这样。

查了这三件事，基本上查清。比如围困中南海，那时不是有“天派”、“地派”吗，实际上查来查去，“天派”、“地派”是一家，都是陈伯达、戚本禹他们在指挥的，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虽然“天派”、“地派”也有矛盾，但根子是一个。

在北京市我们主要查清了几个重大武斗事件，一个是西单商场武斗，破坏性很厉害的，死了人。那是“财贸尖兵”干的，头子是洪振海，后来抓起来了。友谊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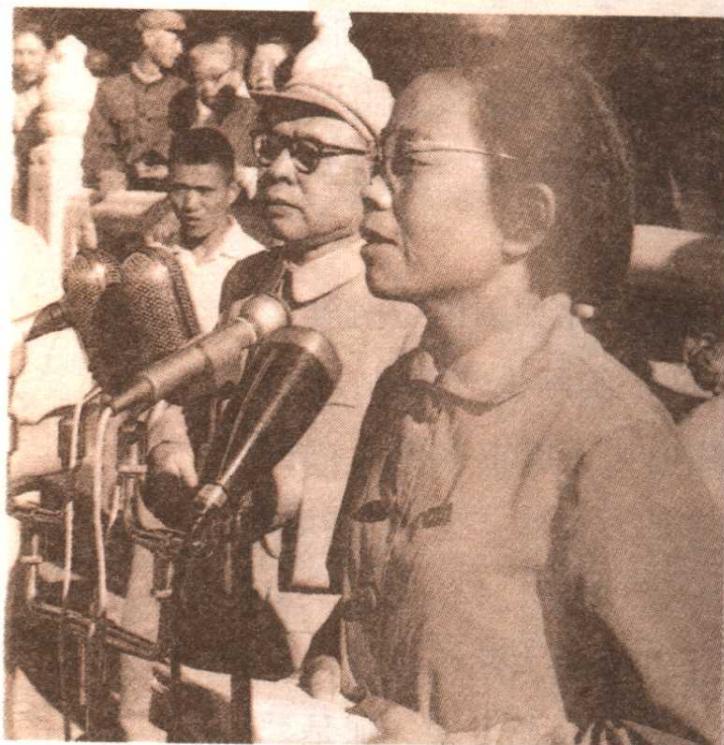
十年风雨纪事



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头谭厚兰



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蒯大富



北京大学造反派头头聂元梓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头头韩爱晶
向陈伯达汇报造反情况

店的王景瑞也是头头。百货大楼的武斗、永定门粮库的武斗、琉璃河水泥厂的武斗，都造成很大破坏，也是伤了人、死了人的。

另外一些事件，比如西郊的张兆庆，还有一个王洛宾，是造反派的头头，他们准备在西郊搞一个大公社，搞一块根据地，是戚本禹指挥的。二七厂的徐凯，他是准备把铁路系统抓在手里的。还有一个矿冶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名字记不起来了。

随着这几个事件查罪行，查到罪行联系到这些头头，解决事件的发动者和幕后操纵者。还有周景方从学部带来的一批夺权的人，他们来后把持了市里的几个主要口，比如建筑。这些人都是支持造反的。还有参加工代会的那几个造反派头头。

就是通过这次清查，把“五大领袖”拿下来的。把“五大领袖”搞下来，批判、查清了他们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下放去劳动改造。张铁夫他们写了材料、写了报告。我传达了毛主席对这几个人区别对待的意思：谭厚兰是不行了；韩爱晶是蒯大富的军师；聂元梓的问题牵涉到林彪的问题，没有查清，放一放；王大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以安排工作、给出路。

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又把这些人抓起来，批判了一下，批判的材料就是当年的那些，没有新的。

我们后来还想给点出路。谭厚兰劳动改造表现比较好，认罪态度比较好，写过几次认罪书。谭小的时候是童养媳，很苦的。后来做了小干部，送到北师大学习的。我们考虑到这些，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想让她回老家当个小学教员，她四十多岁了，没有结婚，还可以找个对象。但以后没有弄成，她病死了。

包括“五大领袖”，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是敌我矛盾就是敌我矛盾，你是打砸抢分子就是打砸抢分子，你有人命案就按有人命案处理。我们最后核实定案的结果，这个数字不是十分准确，大概是这样：定了 10 个；待批的有 22 人，当时有些人市里批不了，要报上去批；另外还有 14 个挂着的人，当时，重点人物总共有 46 人。

此外，还有敌我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 43 人；犯有严重错误的 608 人，其中有 200 多人是要给适当处分的。这是 1973 年时的一个统计材料。

这就是结果，清查“五一六”开始不是说扩大化了吗？以后市委就掌握逐步落实政策、逐步定案。当时是根据人证、物证、旁证，核实定案的，没有这三条不行，不能光凭个人口供，最后还要给出路。

再补充一下，我们当时还查了两个案子。一个是讨孔，就是谭厚兰组织小分队到曲阜破坏孔庙；再一个



1966年，北师大红卫兵捣毁山东曲阜孔庙悬挂的“万世师表”牌匾

77

谭厚兰反大庆，她组织了一个班子到大庆去揪王铁人，记得好像把大庆的火车站都砸了。

对清查“五一六”，不能一概而论，只讲扩大化的这一面，我们后来查的这些都是反革命案件，讨孔破坏很大，现在公安部还有他们破坏的纪录片，他们是打、砸、抢、烧。

我们清查“五一六”中间，还搞了“一打三反”。这中间有人写匿名信给毛主席，告状说我打击了造反派，要复辟。毛主席把信转给了我，毛主席在信上用红铅笔批示：“五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有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

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

我们商量说：抓“五一六”扩大化了，我们只好认这个账。现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实政策，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给他们去掉。北京市有关“五一六”的情况，张铁夫很清楚，毛主席的批示落实，以及摘帽子等工作都是他来负责的。

为此，李震提出要向上写个报告，他写了一个。我提出“五一六”抓也抓不到，怎么写呀？而且毛主席已批评了，就不要再写什么报告了。李震还想向下发个指示，说明政策界限等。我也不同意。我说毛主席指定我们成立联合办公小组，周总理找我谈话时，我就提出过应该有个政策，周总理当时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延安肃反时的九条方针说，就按这个原则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办。现在还想搞个政策界限，这没有必要，而且很难，没有查出“五一六”有什么证据，你怎么能够提得出区别政策来呢？后来报告没有报，指示也没有发。

这是抓“五一六”的情况。毛主席讲是极少数，“王、关、戚”已经抓起来了。但一开始可不是那样，章含之的信毛主席批了，北师大的报告毛主席也批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出面和谢富治召集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北京市抓了一下，就是批极左 40 天。毛主席一批就没有“五一六”了，所有市里抓的“五一六”，主

要是工厂的，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都摘了，这样就没有“五一六”分子了。一场声响很大的抓“五一六”的运动就此结束，但留下的后遗症却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在一段时间里，人们要轮流地吃它的苦果。

难缠的江青

Nanchan De Jiangqing

五



江青很使人讨厌，就像乡间小道上的刺草，弄不好刺你一身小刺球，够摘一阵子的。所以人们都躲她，惟恐避之不及。

81

我说二三事。

(一)

1966年万里被监护，家也被抄了。

1968年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上，周总理主持，通知谢富治和我去汇报北京市的情况。汇报时，我提出我是新来北京的，这几年都被揪斗了，对情况不了解，需要一位了解情况的原市委的领导同志出来一道工作，这位同志应该是能够团结原市委的干部的。

周总理考虑后说：万里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对市

里的情况也熟悉，我明天请示毛主席。

第二天是召开什么会我不知道，周总理、谢富治去参加了，周总理向毛主席提出解放万里后，毛主席说：就是搞人大会堂、十大建筑的那个人吧！这个人应该出来工作。

毛主席已经同意万里出来了，但还要做很多群众工作，先让万里到首钢参加劳动。以后他就参加了北京市的党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市委书记处书记。当时，还有一些人让万里检讨，后来说服了大家才不让他再检讨了。

万里出来后，有一次江青要到景山去看墨牡丹，据说墨牡丹是稀世珍品。我考虑万里对北京情况熟悉，便让他陪同。到景山后，江青看到了崇祯上吊的歪脖子树。这棵树已经枯死。江青说崇祯是个昏君，给他搞什么纪念，把它砍了。这本是一种历史见证，江青竟把它说成是什么纪念，要把它砍去，真是不可理喻。

万里回来后对我说了这个情况，问怎么办？

我知道逆不了江青，说：“那棵树既然已经枯死了，她说让砍就砍了吧，以后再栽还是怎么办再说。”

这是江青故意刁难万里。

还有一次江青到香山碧云寺，也是万里陪同。江青看到孙中山的纪念堂还在，孙中山的水晶棺和孙中山的生平事迹展览还在，红卫兵造反时没有去这个地方，这

个地方未受冲击。江青进到休息室，看到休息室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就发火了。她说：北京市委是共产党的市委还是国民党的市委，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挂毛主席的像？

江青让把毛主席像摘下来她带走，她告诉万里，把孙中山的水晶棺和用过的东西以及展览物品统统弄走。万里问拿到哪里去？江青说送到南京中山陵去。她冲着万里发了一顿脾气。

万里回来后向我讲了经过。

我心里不禁想，江青好“革命”啊，但她懂什么呀！我说这关系到统战问题，动不动这些东西要请示。

接着，江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把我叫去大骂了一顿，那时我不是政治局委员。江青质问我说：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是共产党的市委还是国民党的市委？为什么在碧云寺还展览孙中山的东西？她态度蛮横之极，要我第二天就把这些东西迁走。这就是后来江青对张玉凤说我是国民党的由来。

在政治局会议上，我是列席的，我能同江青说什么呢？我只好转向周总理求救。我向周总理提出：这是关系到统一战线的大问题，怎么处理为好？

江青还在那里哇哇地闹，周总理对我提出的问题一时没有吭声。

难哪，我们怎么办呢？我回来后，与万里反复商量，

决定先把东西拿走，找个地方存起来。为避免不良影响，遮人耳目，也为保护碧云寺，碧云寺以内部修理为名，暂停开放。报告周总理，周总理同意了。就算把一场风波对付了过去。

以后，毛主席从西柏坡进北京时在香山住过的双清别墅倒塌了，周总理指示我进行双清别墅的修复工作。那时，没有当时的图纸，我找了叶子龙等人的回忆，设计一个修复方案，报经周总理同意后就修建了一排平房。

周总理、杨德中、于桑三个人去验收时，于桑不知就里，提出碧云寺为什么不开放？应该开放。

杨德中知道碧云寺修理的缘由，就抓着于桑的衣服扯，暗示他别问了。周总理当时也是不吭声。

这是万里出来工作后的一些情况。后来，我想不应该让万里去陪江青，江青对出来工作的万里很反感。虽然是毛主席批准出来工作的，但江青还是刁难他，也刁难市委。

后来，万里从市里调到了铁道部，是李先念同志和我谈把他调去的。

(二)

1966年5月我调到北京后，江青曾两次叫我看一

部电影《节振国》。电影是写 1938 年唐山开滦煤矿五矿工人总同盟罢工的纠察队队长节振国的。节振国是赵各庄煤矿的工人，这个人是传奇式的人物。江青第一次让我陪她看电影，她没说什么。第二次是在钓鱼台 17 号楼又一次看了，江青说这个电影可以改编一下，改编成京剧，工人片现在比较少。江青还说她准备派北京剧团去将电影改编成京剧。我不懂京剧，没说什么就回来了。

要说节振国，我应该介绍点情况：

1938 年时，河北省委在天津的租界里，省委书记是马辉之，现在大概 93 岁了。我是组织部长，姚依林是宣传部长，林铁是军事部长。冀东是我的家乡，是日本人在统治。冀东农民暴动后，中央决定宋时轮、邓华支队挺进冀东。冀东当时有两个地委，李运昌、胡锡奎是这两个地委的书记，那时有党员五百多人，为了宋、邓支队挺进，冀东党组织发动了大暴动。我们当时估计可能有二千人参加就不错了，但暴动后，参加暴动的人有十几万。罢工是利用英、日的矛盾，开滦煤矿是英国人开的，日本人想把生产出来的煤炭霸占了，进而霸占整个煤矿，这样英、日之间也在明争暗斗。过去冀东军阀连年混战，遗留下来的枪支很多，大概有 30 万支。暴动时，有些地主带着枪都参加了。

节振国就是领导罢工时的纠察队的大队长。他会武

术，爱打抱不平。开滦罢工胜利后，日本人和英国人达成协议，开始镇压，节振国回家时有十多个日本人和矿警在等他，敲门时，他发现是日本人开的门，就猛然拔出挎在日本人身上的东洋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伤了两个日本人，打倒一些矿警后，他本人飞身一纵，跳墙跑了。一些负伤的矿警对节振国佩服得五体投地，在被送到医院时还高喊“节振国是好样的”。

逃出来的节振国藏在山里。暴动时，他拉起了二三千人的队伍与矿工和农村起义的队伍里应外合，先把警察局占领了。他拿着手榴弹，威风凛凛地站在高墙上，指挥着把警察的十几条枪都缴了。然后，他在冀东带着工人大队，在丰、滦一带围绕着五矿活动。

节振国的故事很多，老百姓都叫他节青天，日本人叫他白脸狼。有的工人向他控告特务横行，他带着九个人与四个特务在林西敌占区的戏院里看《玉堂春》，他们把特务制服、枪缴下后，他又站在戏台上向观众宣传抗日。最后，他带着人向天鸣枪，趁着混乱把嗦嗦发抖的特务押走了。唐西商会的会长阻止群众向八路军交粮、交钱，他就设法进到商会会长打麻将的地方，在麻将桌上将这个会长也押走了。节振国很懂政策，教育几天后又把商会会长放了回来。节振国就是这样的人物。

1940年我到延安参加“七大”时，向中央书记处汇

报工作，讲了节振国的情况。毛主席开始是躺在一把躺椅上的，听到节振国的情况时，毛主席坐了起来。他说：这个人你们要好好保护，不然很可能就牺牲了。毛主席说对了，他在日后的作战中英勇牺牲了，为抗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大概江青派人到唐山开滦煤矿作了调查，回来后由北京京剧团根据调查材料和电影故事，将《节振国》改编成了京剧。

突然有一天，谢富治告诉我到钓鱼台开会，开会的人有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和我。

我到钓鱼台后，江青首先就对我批评开了。她说：你为什么给个人树碑立传？

我听得没头没脑，不知道是指什么事情。

姚文元帮腔说：写的节振国剧本中有一个领导罢工的知识分子，这个人物是不是你？

我说：剧本的事我不知道哇，我也没看过。当时唐山的工委书记是周文斌，他是通县潞河中学朝鲜族的同志，罢工是他直接领导的。我们地下河北省委在天津。

我还说：在罢工期间，省委让我去了四次。罢工的领导人是周文斌和胡志发，这两个人后来牺牲得很壮烈。周文斌是冀东区党委的组织部长，创建根据地中被敌人包围时牺牲了，胡志发是被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后枪

杀的。

江青问：这个知识分子是谁？

我说：应该是周文斌。

我还讲了一下罢工的经过。江青说：你把它写出来。

我说：没有材料，不好写。

江青说：你知道多少就写多少。

我回来以后，写了一个材料。大概江青拿着这个材料去问过毛主席有没有这个事。

毛主席说：冀东大暴动是一件很震动的大事。毛主席的意思是说，江青连这样大的事情都不知道！

(三)

1971年夏，毛主席指定我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刘贤权任副组长，文化组有石少华、吴印咸、于会泳、浩亮、刘庆棠，黄厚民、狄福才是“支左”的，也是文化组的成员。王曼恬后一些。我知道这差使不好当，弄不好哪一天江青就把我翻了。

谢富治在北京医院动手术，周总理去了，我也去了。在等待手术结果时，我向周总理指出：北京市的谢富治病了，市里的事多，已够我忙的，我不懂文艺，也没有文化，我也管不了事，可否不去国务院文化组任职？

周总理说：任文化组的组长，毛主席有批示，不能不去，但你可以暂时先不去，让刘贤权负责着。这样，经周总理同意，我就没有去文化组。

过了一两个月，有一天在京西宾馆看样板戏，戏演完后，周总理让我留下，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文化组的人都在场。在休息室里，江青对我大声说：毛主席的批示为什么不执行？你这个组长为什么不到任？

我解释说：这个工作我干不了，我没有文化，也不懂艺术。

张春桥一副架势，说：你不懂，不懂就学嘛！

周总理也没有办法，就宣布了毛主席的批示。这样，没辙，我就主持文化组了。

当时，电影也不让演，就演几个样板戏，大家只管几个样板戏。开始工作后不久，我提出群众有意见，是不是挑一些可以演的电影、戏剧出来演一演。当时，江青他们没有说什么。

我让刘贤权、石少华抽调一些电影看一看，有没有能够放映的。他们两个人连天埋头看电影，选了《渡江侦察记》、《智取华山》两部片子，并写了报告送给周总理和江青。

报告送上去几天后，江青、张春桥找我。

江青、张春桥责问我，为什么跟他们唱对台戏？

我愕然。

她问我知道不知道这些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

我向江青摇头。说我未调查过。

张春桥说：有一个《红灯记》，你们就搞一个《渡江侦察记》；有一个《智取威虎山》，你们就搞一个《智取华山》。

我心里说，江青真能扯得上！

她让我把电影的导演和演员一个一个都了解清楚，并让我回来开会、检讨。

回来以后，我找刘贤权、石少华说了情况，刘贤权、石少华觉得很突然，不知所措。因为正常人的脑袋怎么也想不到的。我说你们不要检讨了，我来检讨。我写了一个书面检讨，说我没有仔细检查，提出的两部电影有错误。

那时真难办，特别是浩亮、刘庆棠他们打了我很多“小报告”，我经常挨批评。我步步小心，在文化组受的罪大了。

有一次，八个样板戏之一的山东的《红嫂》剧组到北京，住在市委的招待所里，我让石少华去接待一下，问一问有什么困难。石少华去后，剧组的负责人知道石少华是文化组的，很尊重他，问石少华这个剧还有什么

修改的地方。石少华说：需要什么修改，你们提出来，我再去请示。

这本来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不知怎么反映到江青那里去了。要改动样板戏，那还了得？江青打电话到市委在电话中对我说：有人破坏样板戏，你知道不知道？

怪事太多就不怪了，我平静地说：我不知道。

江青大发脾气，话筒震耳朵。她问我：石少华为什么不请示就那么说？

我说：我没有听石少华讲过这个问题，我再问一问情况，了解了解。

这又是一场，江青又说让我检讨破坏样板戏。我说：不是，只是招待时说话不慎重。这样，石少华就检讨了。

这样的事情很多啊！检讨没完。

从国务院 文化组到四届人大

Cong Guowuyuan
Wenhuazu Dao Sijierenda

六



1971年夏，中央指定我做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我感到很难办。万里同志为我出主意说，要有一个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的人进文化组才好。我说到哪里找这样的人呢？万里说可以把王曼恬调到文化组来。

93

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姑，和毛主席是亲戚。她是在天津造反起家的，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

有一次她到北京来，我找她谈了这个问题，提出文化组要请她来兼职，她在天津的工作可以不动，每星期来一两次参加文化组的工作则可。她说她本人同意，但要请示毛主席。我说那是不是就由你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看一看毛主席有什么意见。

后来，王曼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在文化组兼

职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同意。这样，王曼恬每星期来一两次。她在文化组的这一段时间，应该说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了文化组的一些问题。

文化组的人很多被江青整了，首先被整的是狄福才。

狄福才是 8341 部队在北影厂“支左”的，他是个老粗，不懂文化、艺术、电影。可能是在北影厂或科影厂开的一次会议上（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刘庆棠他们提出“江青是文化界的旗手，一切要按江青的指示去办”的意思。狄福才也发了言，他强调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事。这下闯了祸，得罪了江青。

不久，江青、王洪文发动北影、科影的造反派贴揪狄福才的大字报。当时，我不知道狄福才在会议上讲话的情况，在和王曼恬商量了怎么批判狄福才等问题时，我说狄福才是 8341 部队派来“支左”的，是毛主席派来的人，批判狄福才，影响不好。我提出先开小会，大家在会上对狄福才可以提意见。

说是小会其实也不小了，大概开了两次，有一百多人参加，提出的意见无非是“支左不力”、“不懂装懂”、“整人”等等。然后，开了一次大会，有几千人参加，这时，局势就控制不住了。

一次文化组开会，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提出要让狄福才检讨为什么不尊重江青的问题，他们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我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不能把毛主席和江青对立起来，我认为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王曼恬附和我的意见，她提出意见说不能这样搞，也不能再搞下去了，她说要维护 8341 部队“支左”的威信。王曼恬一说话，于会泳他们就缩回去了。

不久，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王洪文主持会议，我乘便对王洪文和江青说：对狄福才，已经开了大会和小会，批判了。狄福才是个老粗，他连高小都没毕业，电影这些他不懂。他是 8341 部队派出来的，继续用铺天盖地式的大字报批判，影响不好。是否适可而止？

我知道是王洪文派他的秘书肖木和廖祖康去点的火，很显然是王洪文他们商量后搞的活动。所以灭火的事还得由他们去做，才能做得下来。

王洪文说：可以适时地停下来。

我和王曼恬商量了大会如何召开的问题，决定群众发言以后，就宣布大会不再召开了，有意见可以用书面或口头形式提出。

王曼恬就按照这个方案去主持了大会。于会泳等人也不知道王曼恬的做法是否有毛主席的支持，也就不再纠缠，参加大会的人看到这些，也同意不再开大会了。

大会后，我找狄福才谈话，让他给江青写个检讨，检讨有些什么错误。狄福才有气，不愿意写。我说：你把检讨写好后，我去向王洪文、江青建议把你撤回8341部队去，免去你在文化组的职务。狄福才觉得这样做可以脱身回去，才同意写检讨，以应付一下。

在这个问题上，王曼恬就起了这样的作用。

以后，文化组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被整，先是石少华，然后是黄厚民。石少华因为《红嫂》一剧出了问题，江青说他不可靠，让他写检查。检查以后，我提出石少华是搞摄影的，是否回本单位工作。江青没有异议。我找石少华谈过一次话，他后来回新华社了。

当时，戏曲方面办了一个学校，把那时不被喜欢的京剧演员都集中在这个学校里，我记得有李世济、李万春等著名演员，组织一部分学生在这个学校里学唱京剧。这个学校由吴印咸负责，好像只办了一年就停办了，吴印咸也就势退出文化组，他比石少华多待了一段时间。

江青这个人要当旗手，权欲熏心，喜怒无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样的事情很多。

原来管样板戏的人是温玉成，他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是江青让他管的。有关样板戏的往来信件以及其他问题，先要经过他看，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好像发了很

大的火，说是偷看了给她的信件。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不清楚了，然后温玉成就调离卫戍区和军委办事组了。

温玉成走后，让谢富治负责管样板团。谢富治生病以后，毛主席有个批示让我来管。当时还有一个原因，国务院处于瘫痪状态，样板团的财政、后勤工作都依靠北京市保证，谢富治病后，北京市还要出人来管。先念同志为此跟我谈过话，我提出不好办，先念同志说现在不能提意见，于会泳、浩亮等人在文艺界还不行，文化组组长要有一位老同志出来在前面当门面。先念同志还提醒我，如果一出现问题，他们会把你推出来的。

我提出不懂文艺，应该调一些老文化部的干部回来工作。这一提议遭到了江青的反对，于会泳等人也反对。周总理也在场，江青他们给我定了两条界限：第一条是不准和旧文化部的人、文艺界的人沾边，要和他们划清界限；第二条是艺术上的事情不要多管，搞好八个样板团的后勤。我说：是啊，艺术上的事情我也不懂。

当时，我还想过把下放到农村的歌舞团、京剧团调一些回来，稍微放松一些，但又未获同意。

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很困难，反正当时北京市有

钱，要钱我就给钱。文化组的副组长是刘贤权，发军衣有权，从军委办事组领一些军衣、军大衣发给样板团。当时样板团的人都穿军装。

谈一下欢迎蓬皮杜总统时出的一件事。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9月12日举行欢迎蓬皮杜总统的文艺晚会，由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红色娘子军》。周总理陪同蓬皮杜总统观看演出，江青也出席了。晚会中间休息时，在去休息室的路上，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提出《红色娘子军》演完后，是否唱一支歌，以表示热烈的欢迎气氛。周总理同意。外交部的同志选了《我们走在大路上》那首歌。

外宾退场后，江青让我留下来。她说《我们走在大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照



路上》的歌是谁让唱的，问我听了这首歌后发现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不明白江青是什么意思，但心里想，坏了，江青又要在鸡蛋里挑什么骨头了。我说我不懂歌曲。

江青说：这个歌是反革命分子李劫夫谱的曲，为什么要拿反革命分子的作品来欢迎外宾？

我被问得愣住了，我说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了解一下。

江青还说李劫夫和黄永胜的关系很密切。

江青说完就走了。我马上找来刘庆棠，问了这首歌的情况，还问了李劫夫是什么人等问题。刘庆棠说他不在场，唱这首歌是周总理决定的。

我说：李劫夫是个坏人，我没听说过，如果有问题，首先由我们负责，不管你在场不在场，你先检讨，你检讨后，我再检讨。我还说：周总理当时没注意这个问题，外交部礼宾司一提就同意了，我就在旁边，不能说是周总理决定的。听我这么说，刘庆棠当时就很不满意。

几天后，江青召集我们去开会，到会的有我、刘庆棠、浩亮等人，江青又问起了唱歌的问题。刘庆棠真会做戏，当场大哭起来，说他不在场，是外交部提出来由周总理点头的，现在出了问题倒要让他负责，他感到

委屈。

我说：顶多是外交部礼宾司提得不对的问题，我在场，首先由我负责，因为我没有发现这首歌有问题。

江青不罢休，绕来绕去说“究竟谁要负责”等话。

散会后，我对刘庆棠说：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由我们负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好像委屈你了！

我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周总理只说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句话。这时，我知道江青的矛头是对着周总理的。

果然，在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上，江青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周总理淡淡地解释了一下，没多说。江青继续说个没完，好像非要追究到底不可。我提出我当时在场，我来负责，我应该负责，我没有在节目演出之前去检查一次。江青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闹了很久，周总理在解释后就没有再理她。

在电影《中国》的问题上江青也表演了一番。电影是由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拍摄的，江青大概看过了，她找我去谈话。她说：这个片子拍了中国的阴暗面，是污蔑伟大的中国人民的。

我说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江青要我看一看，并说：查一查是什么人批准让他来拍摄的，什么人陪他去拍摄的。

文化组借来片子看了一遍，认为片子是拍摄了一些中国的阴暗面。我提出这个片子不能演。出乎意外，江青反对，她说这个片子就是要大演，让大家都看一看。后来知道江青的罪恶目的就是千方百计要在周总理身上做文章。

江青让我查的问题，我告诉中央组织部的郭玉峰去查，这个事情是我交办的（后来这成为郭玉峰的一个罪状。郭玉峰现在对这个事情还感到很委屈，在“文化大革命”后，他被开除了党籍）。郭玉峰了解以后，知道是广播事业局的一位同志陪着拍摄的，名字我记不住了，后来好像批斗了这个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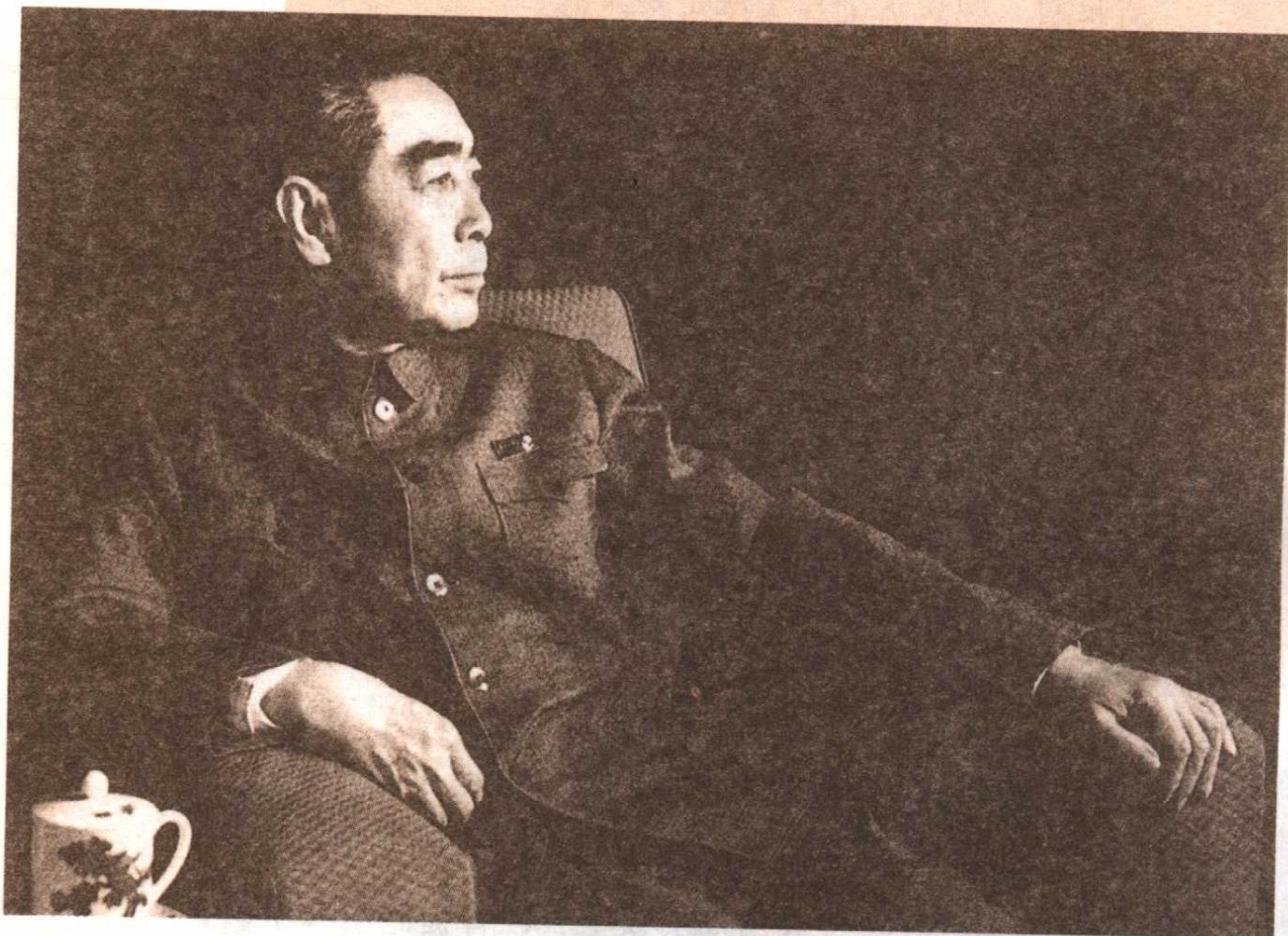
江青又派人查了外交部，这个调查我不了解。外交部查到了新闻司的一位司长，从安东尼奥尼的出入境问题牵涉到周总理。江青好像捞到了什么似的，更闹了起来，她当着我们的面大骂说：允许外国人拍这样的片子，而且带出去，不只是错误的，简直是汉奸！

以后，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到了《中国》的问题，提得很尖锐，不点名地批评周总理。周总理又只是淡淡地说，经过情况要去查一下，他不太清楚。周总理以后也不再理会这件事，随江青去闹罢了。

江青攻击周总理，我很为难。开始时，我还感觉这个片子是有毛病，不能演，后来发觉，这个片子牵涉到

吴德口述

十年风雨往事



1973 年的周恩来

外交部、广播事业局，江青的矛头是对着周总理的。我越发认清江青的恶毒。

文化组的许多人都被江青整下去了，就剩下我、刘贤权、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王曼恬。以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王曼恬提出很多理由，也慢慢地不来参加会议了。我对文化组的事真感到伤脑筋。

四届人大召开前，1974年10月份，周总理就分别找一些人谈人事安排，当时是三四个人为一批，周总理分批谈话。周总理在与张春桥、江青谈话时，他们提出要建立文化部，让我去任部长。我知道后对周总理说我不行。我提出我负责北京市的工作已很繁重。我不懂文化工作，前一段负责文化组时，很多工作也没有做好。

我记得张春桥、江青坚持让我任文化部部长，他们说：就得你来搞。为此，倪志福曾和张春桥发生了争吵。倪志福说：北京市的工作吴德同志还管不过来，他不能兼任兼管那么多别的事情。张春桥说倪志福是本位主义。总理提出我做市委书记不兼革委会主任，主任要倪志福来搞。倪志福不干。张春桥提出别的书记是否也不兼主任了？这就牵扯到上海兼主任的问题。总理没有再提。

我找先念同志，提出无论如何我不干。我和先念同志经常接触，他对文化组的情况也很了解，我对他说，

你也向周总理说一说，我实在干不了。

后来，张春桥又提出让我任副总理兼文化部长，这个提议大概是“四人帮”商量后确定的。

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再一次找先念同志提出实在干不了的困难。先念同志大概向周总理反映了我的情况。事实上周总理对我在文化组的尴尬处境也是很清楚的。

以后，在一次征求人事安排的谈话中，周总理对我说，让我到人大去。周总理说：王洪文自己提出他不去人大，他不干；让华国锋去，华国锋也不干；总要有一位政治局的同志去，因为朱老总和董老岁数大了，研究前例，彭真就是副委员长兼市委第一书记。

我向周总理说：我不能胜任，很多民主人士我从来没有接触过。

周总理对我说：你怎么糊涂啊！

我听到周总理说出这样的话，就不再说什么了。

后来，先念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周总理批评你糊涂了吧？我说：是，批评了，但我的确不能胜任人大的职务。先念同志说：只有这一个办法，你才能脱离开文化组，不到文化部去，你调到人大工作，人大的人员是不能兼任政府部门的工作的。毛主席批准时，你什么也不要讲了。我这下才明白了周总理的意图。

这样，我就脱离了“四人帮”把持的文化组。我不

任文化部部长，就讨论由谁任文化部部长。我提出文化部部长要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担任，于会泳、刘庆棠等人在文化界不一定能领导得起来。我具体提名上海的一个著名教授刘大杰。江青他们不同意，他们提出于会泳任部长，刘庆棠、浩亮任副部长。周总理考虑了他们的意见。当时，“四人帮”比较注意铁道部、教育部、文化部的部长安排。铁道部让万里任部长，是先念同志坚持的，教育部是周总理提出周荣鑫任部长，铁道部的部长万里后来被他们批判了，教育部的周荣鑫被他们迫害死了。

周总理提出人大副委员长要有一名工人，要有一名妇女，王洪文他们提出好像是东北的工人劳动模范王崇伦，周总理后来换为李素文，李素文既是妇女，又是工人的劳动模范。

周总理还提出让西北出一位副委员长，后来，西北出了一个工人造反派姚连蔚任副委员长，这个提名，“四人帮”没有反对。

周总理还提出谢静宜任副委员长，他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同意。谢静宜是毛主席指定任北京市委书记的。

周总理当时为了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找了很多人商量，他与“四人帮”怎么商量，我不知道，他很

为难，反复商量，我们的态度是只要是周总理提出来的，我们就同意。

毛主席在人事安排前，指定人大要安排朱老总、董老、宋庆龄出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还是总理”，小平同志任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排在小平之后。

周总理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的名单就报送毛主席了。毛主席在外地，他在批阅这个名单时把谢静宜任副委员长划掉了。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对谢静宜说：谢静宜你已当了大官，搞不好就卷铺盖走。

关于人大、国务院的人事安排，我知道只有谢静宜被毛主席划掉了。

我调到人大工作，任常务副委员长。我要筹备人大会议，工作很紧张，有一个很多人的组在张罗这个工作，吴庆彤参加了。他是国务院的办公室主任，这位同志很能干，朝鲜战争时打掉了一条腿，他从中央组织部、国务院调了一些人。原来在人大工作的干部当时分为两派，斗争得很激烈，正在把他们组织起来，办学习班。

周总理安排人大的秘书长和副秘书长时，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当时是四届人大开会时的秘书长，我提出

大会闭会后，我的事情太多，再任秘书长不行。江青他们当时都说，就是你任秘书长。我坚持说我的事情太多，照顾不过来，并说人大有很多外事活动，我不懂外交，是不是找一位能够处理外事活动的同志任秘书长。江青他们就问是谁。我当时冒了一句说，听说毛主席考虑让姬鹏飞任秘书长。其实我没有听说过毛主席有这个意见。“四人帮”当时很惊讶地表示，他们没有听说毛主席有这个意见。小平同志说：这个好办，问一问毛主席就是了。

我也不知道小平是怎么向毛主席说的，后来毛主席同意姬鹏飞任秘书长了。

姬鹏飞是原来的外交部部长，那时说他在一次外交宴会上说了错话，已由乔冠华把他换下来了。

周总理提出人大的副秘书长是罗青长、武新宇、李金德、沙千里。

四届人大前，邓小平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负责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我组织开会。我记得关于代表的人数问题、大会主席团的安排都是周总理亲自抓的。我不了解情况，在向周总理汇报时，周总理是一个人一个人地提出应该如何安排的。小平同志当时对我说：赶快抓紧搞。

我抓了各省代表的组成问题，各种报告的翻译问



108

1976年，吴德与宋庆龄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

题。翻译问题很复杂，有民族语言的翻译，还有国别语言的翻译问题。当时提出一个什么词不符合内蒙古语言的习惯，原来的翻译就有不同的意见的问题，我说原来怎么翻译的现在就怎么翻译。后来，是小平同志组织翻译班子，搞了这项工作。

人大开会前，周总理让我去向朱老总、宋庆龄同志汇报一次，我说向朱老总汇报可以，但我从来没接触过宋庆龄，不知道怎么向她汇报。周总理告诉我，先向她解释人大召开的时间仓促一点，没有来得及向宋副主席请示汇报，然后再讲人大会议的安排和人事安排。周总理看我确实为难，就提出让我去找廖承志，说廖承志与

宋庆龄很熟，让廖承志陪我一起去把问题讲清楚。

我和廖承志一起向宋庆龄汇报了召开人大筹备的情况。宋庆龄很客气。廖承志一会儿讲广东话，一会儿讲英语。最后，我提出请宋副主席指示。她说：没什么意见，很好。

关于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人员，周总理对我说：人大的两派相持不下，你找武新宇了解一下情况，连搞收发的同志在内，从这些人里最多挑出 10 个派性少一点的人。

后来，经过武新宇等人了解后，从人大常委会原来的一二百个工作人员中挑了 10 位同志。姬鹏飞说工作人员太少了，专门找我反映这个问题。我告诉他周总理一再给我打了招呼，说原来人大常委会的人两派斗得很厉害，暂时无法用。周总理还交代说，如遇有大活动，人员不够时，可以找国务院的吴庆彤，由他负责开常委会时的衣、食、住、行等问题。

当时，人大常委会除了我们这些人，日常的工作就只有十几个工作人员。

1975 年 1 月四届人大召开时，毛主席在考虑还要不要一同开政协会议的问题。以往政协和人大是同时召开的，但四届人大时，政协大会没有召开。

从我在国务院文化组工作到四届人大召开的这一段

经历，我深切地感觉到，自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在江青的羽翼下又集结着一个炙手可热的圈子，他们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施阴谋，放冷箭，许多人因此中箭落马，许多政府部门，特别是文化部门成了重灾区。他们窥测方向，不放过任何机会，制造一次次风波，向他们认为对他们篡党篡政构成最大障碍的周总理进行不断的罪恶攻击，不管他已经身患绝症。正直的人们已经忍无可忍，或远离他们，或横眉冷对，或起而抗争。

有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外交问题，“四人帮”对外交问题百般挑剔。纪登奎很反感，发言说外交的原则已经确定了，活动由周总理负责处理。纪登奎这样说，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不满，纪登奎和江青冲突了。散会后，江青和纪登奎一起走，江青余怒未息，批评纪登奎跟着周恩来跑。

这次会议后，深知江青积怨甚多的毛主席为了让江青和纪登奎团结，在江青去天津小靳庄讲儒法斗争时，特意让纪登奎陪着江青一起去。

鉴于林彪等人的叛党叛国，毛主席的确曾经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寄予希望。1973年8月召开了党的十大之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处找我们谈话，提出要扶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

人，他指着房子外边菜地里的一些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然而后来毛主席终于发现，希望落空，王洪文等人是扶不起来的一帮。

庐山会议 和林彪事件

Lushan Huiyi
He Linbiaoshijian

七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毛主席“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113

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就我所经历的情况，记忆可及者，谈一下。

1970年以前，我是处在被当做叛徒嫌疑暗中审查的。虽说是背靠背的审查，但我也能感觉到，总是有些事情不大对劲，别别扭扭。例如市里的有些会议没让我参加，中央的一些重要决定也不告诉我。虽然在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在那个年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党的生活极不正常，我一方面思想有所准备，另一方面则泰然处之，相信党、相信人民总是会分清是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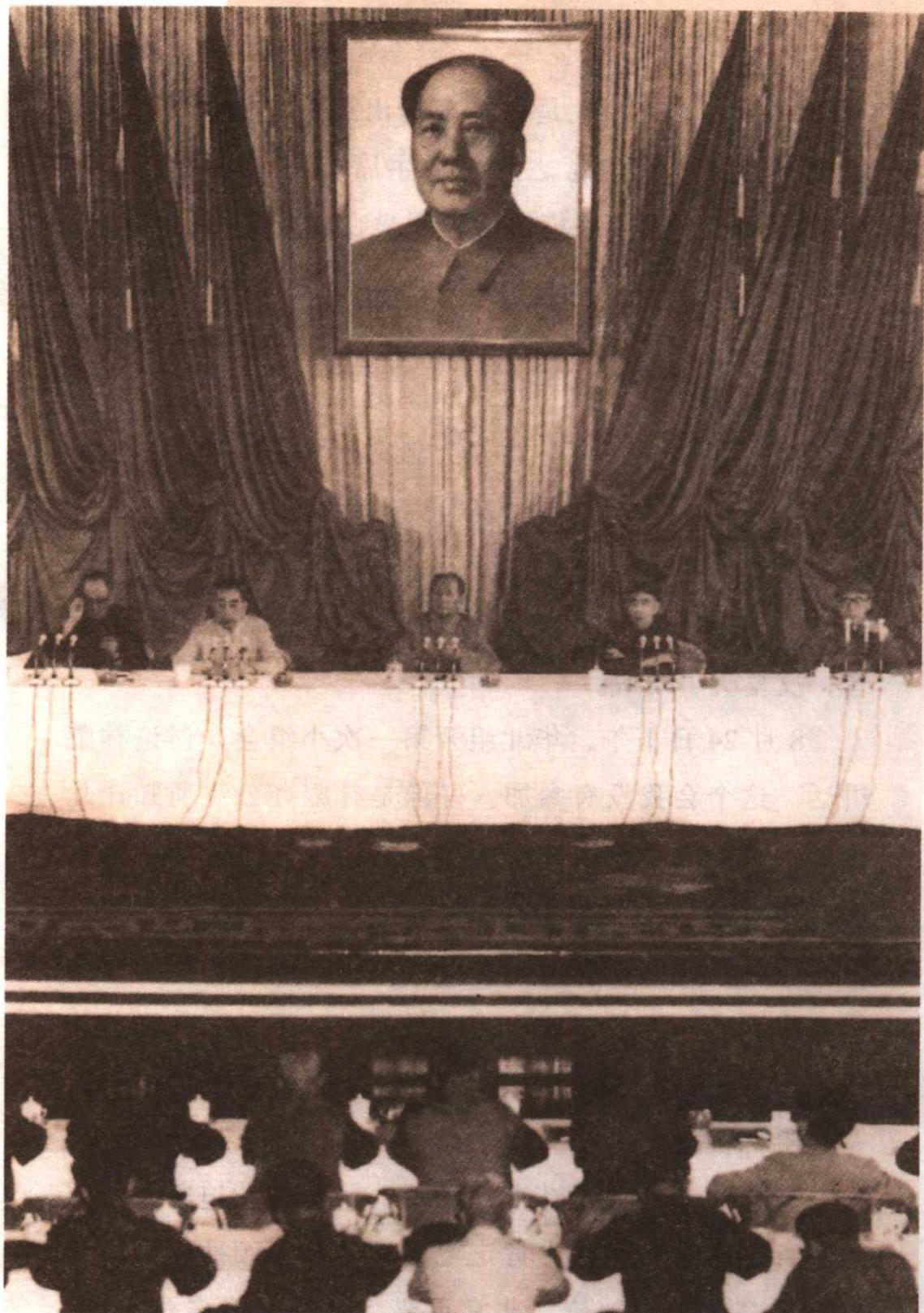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前夕，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带着北京市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去庐山开会。这种正常的通知，反倒使我有如获意外的感受，舒了口气，心中真有些激动。我记得同我一起去的，有吴忠、杨俊生、黄作珍、倪志福、刘锡昌、张世忠、聂元梓等。

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万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

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混合编的。华北组的组长是李雪峰，我是副组长，其余的副组长还有天津的解学恭，山西的陈永贵，内蒙古的吴涛，军队的郑维山。编在华北组的还有陈伯达、汪东兴等。

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是两个内容，讨论修改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毛主席会前又提出了讨论形势的问题，大会结束时还通过了关于战备问题的报告。

为了修改宪法，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主席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委员会下设有一个小组，成员可能是康生、陈伯达、吴法宪、张春桥等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人员。宪法中有一条重要的修改就是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这个建议，最早是毛主席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来的。毛主席以后为此又打过招呼，提出过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次：一次是汪东兴传达的，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具体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主席台上就坐的是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五位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

时间记不清了；一次是在林彪提出还是要设国家主席，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之后，毛主席有一个批示，认为“此议不妥”。汪东兴传达的时间是在林彪坚持提出设国家主席之前。

8月23日下午3点，毛主席宣布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林彪讲话。

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副统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8月24日上午，政治局通知我们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反复听了两遍。

8月24日下午，华北组开第一次小组会，讨论林彪讲话。这个会我没有参加。好像是林彪办公室通知让几个省、市分别整理出一份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的材料，北京市也在被通知之列。因为催得很急，要求限时送到，我对情况又不了解，市委秘书长黄作珍提出由几个人凑一凑，整理出一个材料来。于是，我和黄作珍，还有我们带到庐山去工作的市委办公厅主任陈一夫，一起凑材料。

8月24日下午的华北组讨论会，陈伯达迫不及待首先发言，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非常重要，是经过很多斗争的。

他讲了一通“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并闪烁其词地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并且说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这个讲话很有煽动性。

汪东兴跟着讲了话，主要的意思是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

当时，陈伯达讲话，大家还有疑惑，汪东兴一讲就不同了，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别人更多地是相信他的讲话。

散会后，吴忠告诉我发言的情况，他说陈伯达、汪东兴讲了话，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

我急忙问：是谁反对毛主席？

吴忠说：他们没有点名，不知道是谁。

这时，大家已经议论纷纷了。

晚上，我和李雪峰在会场碰到了汪东兴，我问汪东兴：有人反对毛主席，是什么人？

汪东兴说：有人。枪杆子、笔杆子。

我问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也不清楚。

我更不明白这是指什么人了。

晚上 11 点多钟时，我和李雪峰、解学恭吃夜餐，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在华北组的简报组，他参加了整理简报的工作，他把整理好的简报稿子拿来送审。简报的内

容就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内容。解学恭拿着稿子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我没有参加会，发言的具体情况也不了解，我对李雪峰说：印发简报你们签字就行了，我就不签字了。

李雪峰说：简报是本着有文必录的原则整理的，签字付印是照例工作，你就签个字吧。

这样，我也就在要付印的简报稿子上签了个“吴”字。

我们签完字后，简报就送中央办公厅了，很快印好就发了。这个简报就是华北组的第2号简报，全会的第6号简报。

8月25日上午，华北组继续开会。经过一夜的沸沸扬扬，人们的发言都集中到了所谓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上，部队同志的发言更激动更气愤。连陈毅同志也说：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

当时，北京组的聂元梓又显示出了“造反派”的能量，极其活跃，到处串联。她找了河北的同志，找了军队后勤部门的同志，一直串联到了吴忠。她对吴忠说有人反对毛主席，要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吴忠问她是谁反对毛主席，聂元梓也不说具体人。吴忠对聂元梓其人是有警惕的，他说他不清楚情况，也不清楚是什么

人反对毛主席，表示不愿意与聂元梓谈这样的问题。吴忠随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说聂元梓在串联。

这时，一些工人中选出来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也找我说，别人都表态了，他们也要发言表态。

我对这些同志说：这个态你们怎么表呢？假如问题涉及中央的负责人，按照党的原则，应该先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庐山啊。

这时，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在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了言，到处点火，气氛相当紧张。我还发现王洪文和上海组的人在到处探听消息。

8月25日，我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是我和陈一夫同志商量后由他起草的。信的内容是反映聂元梓在到处串联，揪所谓反对毛主席的人，会议有些不正常。我把这些情况报告周总理后，还请示周总理以后的会议怎样开下去。

8月25日下午，华北组继续开会。李雪峰接到通知，到毛主席处开会去了，华北组的会议改由我主持。河北省四名劳动模范出身的候补中委先后发言，对新宪法不设国家主席问题提出质疑，认为宪法起草小组和委员会有问题，点了康生的名字。他们的发言，口径完全一致。

他们讲完后不久，李雪峰就回来了。李雪峰告诉我，

会议立刻停止。我问他为什么要停止，李雪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详情以后再谈。李雪峰当场宣布会议停止。

在散会回来的路上，我又问李雪峰出了什么事情，会议为什么停止了。

李雪峰说毛主席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批评了天才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是毛主席提出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的。

我对李雪峰说：毛主席早就讲过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打过招呼。你们河北为什么还有四位同志发言反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他们点名批判宪法起草委员会，是怎么回事？

李雪峰说：这是中央全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什么意见，可以自由发言。

8月25日晚上，我正在看电影，周总理派人找到我，要我去谈话。

周总理说：我已把你的信在政治局传阅了。

周总理指示我回去以后，组织代表中的工人同志开个会，批评聂元梓，解决她串联的问题。

我向周总理汇报了河北省几位同志发言批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情况。

周总理说：可能是关于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的问题，在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发表的

社论上，毛主席删去了这个内容。我已经要北京查一下档案。对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在会场上对他们进行反驳？

我说：我不了解情况，不好发言。

周总理说：不是很好讲的吗？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任是毛主席嘛！副主任是林彪嘛！你们反对宪法起草委员会，不是反对毛主席吗？你为什么不讲？

周总理批评了我。

我向周总理提出小组会如何开下去的问题，周总理说，照原计划继续开。

我从周总理处回来，就开了批评聂元梓的会。会上批评了聂元梓的非组织活动。

我们把批评聂元梓会议的情况，手写了一份简报，报送给周总理。周总理指示政治局传阅了。我记得林彪还在简报上画了圈。后来出现了林彪问题，我才意识到我们写的这个简报有多大风险。

这时听到他们说反对毛主席的是张春桥，也是对着江青、康生等人的。

停止小组会后，政治局作了一个决定，要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检讨，还决定收回6号简报。

开检讨会时，周总理、康生主持，各大组组长参加

了。我不是组长，但周总理通知让我听他们检讨。陈伯达是第一个检讨的，吴法宪、李作鹏等也检讨了。陈伯达等人的检讨很不像样子。

汪东兴找李雪峰和我谈过一次，他说是毛主席让他找华北组的几个组长谈一谈的，他犯了错误，毛主席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这个意见还是他传达的，但在这次会上，他又提出了与毛主席相反的意见。汪东兴还在华北组检讨过一次。

汪东兴讲话的内容与陈伯达讲话的思想有所不同，他是听了陈的讲话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一时愤激的发言，是被人利用了。后来调查，也没有发现他参与林彪集团的活动。

毛主席对汪东兴一直是保护的。汪东兴回北京后在机关检讨了几次后就不再检讨了。

8月31日，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这以后，宪法问题不讨论了，计划问题也不讨论了，大家都转到学习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毛主席讲了话，讲话着重强调了对干部进行路线教育、学习马列、团结等问题。周总理和康生也讲了话。周总理是部署批陈整风的工作，康生是从理论上分析“天才”论等问题。中央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从周恩来和康生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当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时,九届二中全会会场上的严峻气氛

123

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9月，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我被通知同纪登奎、陈先瑞、吴忠到丰台车站去，等候毛主席与我们谈话。

我们到丰台时，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到达。毛主席在火车上与我们谈了话，汪东兴也参加了。整个谈话内容，总的意思基本上是《我的一点意见》上的内容。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点：一点是说共产党要搞唯物论，不能搞唯心论；另一点是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

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

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毛主席的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我记得谈话结束时，陈先瑞还高喊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毛主席继续坐火车回北京。我们是坐汽车回来的。

从庐山回来后不久，周总理把我找去，把我写给他的信和那份批评聂元梓的简报交给我，要我把它们处理掉。我一回来就把这两个材料处理掉了。这时，我更意识到了这里边的问题，周总理想得周到。

1970年12月，召开了华北会议。召开华北会议，表明问题越趋严重了。华北会议好像是由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主持的。会前，周总理找我们几个人谈话。他先谈了毛主席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然后要我、李雪峰、解学恭、郑维山检讨，揭批陈伯达。

我们几个人在会议上检讨了，华北组在庐山时有两个问题：一个是6号简报，一个是跟着陈伯达起哄。吴忠等人也在华北会议上检讨了在庐山上的错误表态等问题。

华北会议开得好紧张！江青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字，还说他把河北省会由保定搬到石家庄是个阴谋。

李雪峰调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时，陈伯达与他一起去了河北。陈伯达在唐山发表了诬陷中共冀东党组织的讲话，使很多人受到迫害，一些人死亡，制造了一起大冤案。

陈伯达问题株连到李雪峰、郑维山。李雪峰紧张极了，派他的秘书回石家庄去烧有关的文件、档案。李雪峰派秘书回去的情况，不知怎么被人知道了，他的秘书还没把文件、档案销毁，就被紧跟而来的人将这些材料全部没收并把李雪峰的家也抄了。事情更闹大了。

周总理让我们去帮助李雪峰，我到京西宾馆去看他，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后一次见李雪峰。

华北会议上说李雪峰与陈伯达有关系。根据当时情况，我认为李雪峰与陈伯达没有特殊关系，他在北京市工作不到 70 天，他的思想状态我知道一些，他与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有些问题上有对立情绪。

李雪峰后来被撤销了职务，关到安徽的农场去了，以后又被开除了党籍，整得很惨。郑维山也被免职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在一个招待所见过李雪峰。后来，他的党籍也恢复了，先任政协委员，后又到中央顾问委员会任委员。

在华北会议前期，我主要是检讨了被陈伯达的讲话所迷惑和在 6 号简报上签字等问题。因为我没有参加 8

月 24 日的小组会，也没有在 8 月 25 日的小组会上表态，所以也检讨不到更多的问题。后来，从抄李雪峰家的材料中发现了李雪峰写的一本庐山会议日志，上面记述了 8 月 25 日他与我在河北的几位同志发言一事上有不同意见。

纪登奎告诉我发现李雪峰的日志后，中央认为我和陈伯达、李雪峰这些人没有关系，也没有参加 8 月 24 日的小组会。这样，周总理找我谈话了，批评我没有参加会议为什么要在简报上签字，他要我在大会上做一个发言，揭批陈伯达，要我不必再作检讨。

我对周总理说我不很清楚陈伯达的问题，只能根据中共中央准备发出的《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批判陈伯达，然后也还检讨一下我的错误。

再谈一下“九一三”事件前后的情况。

毛主席在每年的国庆节前出巡各地然后回北京是有规律的。1971 年这一次南巡是经津浦路回来的，在途中到达济南时通知李德生、纪登奎、我和吴忠到丰台谈话。

1971 年 9 月 12 日下午，我们在丰台上毛主席的专列。毛主席与我们谈话时，汪东兴也参加了。谈话开始，李德生向毛主席汇报了他去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李德生汇报时，我们就看出毛主席显得很不耐烦。毛主席说霍查“他是左派，我是右派”。这样，李德生不再汇

报了。

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很多，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讲了去年庐山会议的问题，还讲了庐山会议后的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措施，以及华北会议问题。

毛主席讲过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后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过十次，张国焘搞分裂后，党内多次有人搞分裂，但都未能把党分裂了。毛主席说：路线决定一切。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毛主席说：庐山会议是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出简报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庐山会议显然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他们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称天才”。毛主席说：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了头嘛！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毛主席还说：庐山会议的事情还未完结，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毛主席还问我们说，这第十次是不是路线的问题。

毛主席说他在陈伯达搞的论天才的材料上加批语，在济南军区、三十八军的报告和其他文件上加批语是甩石头；从中央和各大军区调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掺沙子；

派李德生、纪登奎到北京军区是挖墙脚。

毛主席批评了把自己的老婆安排为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做法，虽然没有点名，但完全可以听出是指向林彪的。

毛主席还点名批评了黄永胜。

在谈话中，毛主席说庐山会议的6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

我一听毛主席这样说，就赶紧检讨。我说：主席，我还在6号简报印发前签了名字。6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犯了政治错误。

毛主席挥着手说：没你的事，吴德有德。

毛主席随后的谈话好像是说“这是个反革命集团”或“是个反革命的行动”这样一类的话，因为紧张，没有听得准。这时，吴忠说：主席，可能有坏人吧？

毛主席说：你讲得对，吴忠有忠。

毛主席还询问了北京市批陈整风的情况，我们简要地汇报了一下。

毛主席反复地说：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是坐火车回北京的。我们坐汽车回北京，下车时，纪登奎禁不住跟我说：这个问题大了！我们都感到很紧张。

从丰台回来后，我到吴忠家谈了很长时间。我和吴忠交换了意见。我们讨论了对毛主席提出的第十次路线斗争应该怎样认识等问题，还考虑是否把毛主席说的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传达一下。我提出，虽然毛主席没有点林彪的名字，但提陈伯达后边是谁已经很明白了，这样，是不是需要将毛主席的谈话先给市委常委或者市委书记们吹吹风，以免将来问题出来了，大家没有思想准备。但是，怎么传达呢？毛主席终究没有点林彪的名字啊！

我们俩人商量到后半夜1点多钟，也没有考虑好怎么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我说：今天恐怕议不出来妥善办法了，明天再说吧。

回到家，我就吃了安眠药休息了。

可躺下不久，3点多钟，电话突然响起来，是周总理通知我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我迷迷糊糊地穿上衣服就去了。

我到大会堂时，可能是政治局会议刚散，我看见黄永胜等人都急匆匆上车走了。我碰见了纪登奎，就问他总理找我有什么事，纪登奎用手遥指着东大厅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说：你去找总理吧。

我进到周总理的房间，看见他正在用保密电话给各大军区打电话。周总理示意我坐下来，我看周总理很紧张，听见他对电话中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周总理要求各大军区紧急备战。当时，有的大军区的负责人听不明白是谁飞到蒙古去了，还在电话中提问，周总理着急地说：你们还不懂吗？

我听到周总理这样说，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周总理打完电话后告诉我：林彪外逃了。曾经对山海关机场作了一个决定，没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共同签署的命令，飞机不准起飞。但林彪还是在山海关机场坐三叉戟飞机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飞去了。雷达跟踪飞机进入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二百多公里处，飞机不见了。

我说：哎呀，怎么不把它打下来？

周总理说：不能打，打下来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周总理对我说：北京军区要紧急备战。另外，还有一架直升机从沙河机场起飞了，这架飞机是周宇驰等人乘坐的，方向也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准备迫降它。你们要把北京市郊区各县民兵紧急动员起来，监视飞机的降落点。周总理还说：让卫戍区派部队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防止再有飞机外逃。

我向周总理提出，战备问题，只跟我一个人谈不行，是否让北京军区和卫戍区的负责人来一起谈。

周总理同意了。由总理办公室的人立即打电话通知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来开会。

在陈先瑞、吴忠还没来的当儿，周总理给我讲了一些情况。林彪逃走的迹象及山海关机场有一架三叉戟飞机是林豆豆向驻北戴河 8341 部队报告的，林豆豆和她的爱人在一起。驻北戴河部队立即将此情况报告北京，周总理让吴法宪给山海关机场打过电话，通知飞机调回。吴法宪打完电话后对周总理说飞机出了故障，暂时飞不回来。

陈先瑞、吴忠到人民大会堂后，周总理又讲了发生事件的情况，并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首都立即处于紧急战备状态，指定吴德、吴忠负责执行，对林彪外逃事件要严格保密。

我和吴忠商量后向周总理提出，卫戍区的杨俊生政委应该同我们一起参加工作。周总理询问了杨俊生的情况，我们说杨是可靠的、可以信任的同志，他参加工作便于执行任务。周总理表示同意，指示北京紧急战备工作由吴德、吴忠、杨俊生三个人负责，除此之外，现不允许向任何人透露林彪外逃的消息。

随后，周总理布置了几项应急措施：

一、要监视和搜索外逃被迫降的直升机，要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也就是直接报告毛主席、周总理。

二、派卫戍区部队封闭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没有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也不允许任何飞机降落。在没有接到允许飞机起飞的命令或通知时，发现有飞机起飞，要将其击落。

三、卫戍区要加强对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等警卫目标的警卫工作，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附近地区也要增派部队，加强警卫。

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并部署北京地区防空降的作战任务。

我和吴忠回到卫戍区时，天已经快亮了。我们把杨俊生找来，一起布置了任务。首先布置动员民兵监视天空，卫戍区准备好了一部分摩托部队，随时可以出发行动到飞机降落的地点。之后，我们派出卫戍区的部队封闭了北京的西郊机场、南苑机场、沙河机场、良乡机场、东郊机场共五个机场。首先，我们命令部队进驻机场后，全都真枪实弹，对没有周总理的命令，强行起飞的飞机立即开枪、开高射炮；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阻止飞机起飞；第三，要将所有飞机上的油料全部



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乘坐外逃的直升机，被迫降在北京怀柔县。右下角为林彪死党李伟信

抽掉，同时加派部队看好油库。进入机场的部队在机场空军的配合下，完满地完成了任务，后来在向周总理汇报时，周总理很满意。

133

13日，直升机被迫降在怀柔县沙峪，当地民兵马上报告了县武装部，县武装部长报告了驻在那里的警卫三师，三师立即派部队包围了这个地区，对沙峪周围进行了严密戒严。上午10点，北京卫戍区办公室接到了警卫三师从怀柔渤海所打来的电话，报告说三师的七团和当地的民兵已经在怀柔沙峪找到了迫降的直升机，并将飞机包围了。

飞机在降落前，民兵们看到直升机在天上摇晃。后来知道，那是陈修文驾驶飞机在天空中兜圈子。陈修文与周宇驰进行了搏斗，他在抢周宇驰的手枪时，周宇驰

开了枪，陈修文牺牲了。以后李伟信供称，陈修文、陈士印和周宇驰坐在前边，于新野、李伟信坐在后边。于新野在后边听到枪声，就慌里慌张向前边打了一枪，这一枪打到周宇驰的手腕上了。

陈士印把飞机降落下来后在直升机中躺下装死，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飞快跑下来。周宇驰一边走一边撕林彪的政变手令、林给黄永胜的信和安排黄、吴、李、邱去广州的飞机号码、人员表。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跑了一阵，意识到跑不了，就商量自杀。周宇驰说我把你们两个人打死，然后我再自杀。于新野、李伟信说还是自己死吧。他们就在玉米地中，一人站在一垄上，各自开了枪。周宇驰、于新野倒下了，李伟信的枪是向天空放的，没有自杀。

卫戍区部队保护好现场，进行了仔细搜索。

当时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9月13日当天，空军来了一支武装的小部队到现场，可能是空军的警卫部队，他们找到卫戍区的人，提出要把人、直升机和直升机上的一切物品都交给他们带回空军，这个部队说他们是奉了命令来的。

林彪叛逃后，中央派李德生处理空军问题，坐镇空军司令部。但我们未接到这个命令，这次来的又是武装部队，卫戍区要不要按他们提出的要求执行，吴忠与我

进行了商量。当时，我们不了解武装部队的人是些什么人，我说：空军出的事情，这些东西再交给空军处理，很显然是不妥当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得到周总理的指示，人和东西我们不能交。我还说：要告诉卫戍区戒严的部队，没有周总理的指示，无论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允许进入戒严区，更不允许取走任何物品。

后来，吴忠让人好好招待这个部队，但把这个武装部队的枪都收缴了。他们回去时把枪还给了他们，他们是在卫戍区的武装监视下离开的。这个情况及处置的办法，吴忠后来都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同意。

当天，把飞机上的物品和李伟信、陈士印都送到卫戍区了。地上被撕碎的纸片当天能找到的也都送来了。

我们看了拉来的物品，有一些中央文件，其中一部分是国防科委关于导弹、原子弹方面的机密文件；有一些信件，包括有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写的信；有一个录音带；还有三万美元。

飞机上还有一些材料，我们都看不懂，这些材料写了一些类似“B—52”、“眼镜蛇”那样的暗语。

当天晚上，吴忠审问了李伟信。李伟信交待说他们有一个《“571 工程”纪要》。吴忠听不懂，他当时只是想审清楚李伟信为什么要叛逃的问题，根本想不到他们还有个滔天大阴谋。吴忠拍着桌子骂李伟信说：你他妈

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

我们那时都在卫戍区，吴忠审完李伟信后对我说：这小子他妈的不老实。

9月13日，我们一天都没有睡觉。我、吴忠、杨俊生连夜听了录音、拼对已撕碎了的信。录音机放出来的声音都是吱吱哇哇的，怎么听也听不出个名堂来。我和杨俊生对信，对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有个用红铅笔写的“林彪”两字的纸片，然后又对出来个“永胜”，这个“胜”字的“月”字边是第二天才从现场找回来的。周宇驰共撕碎了三张信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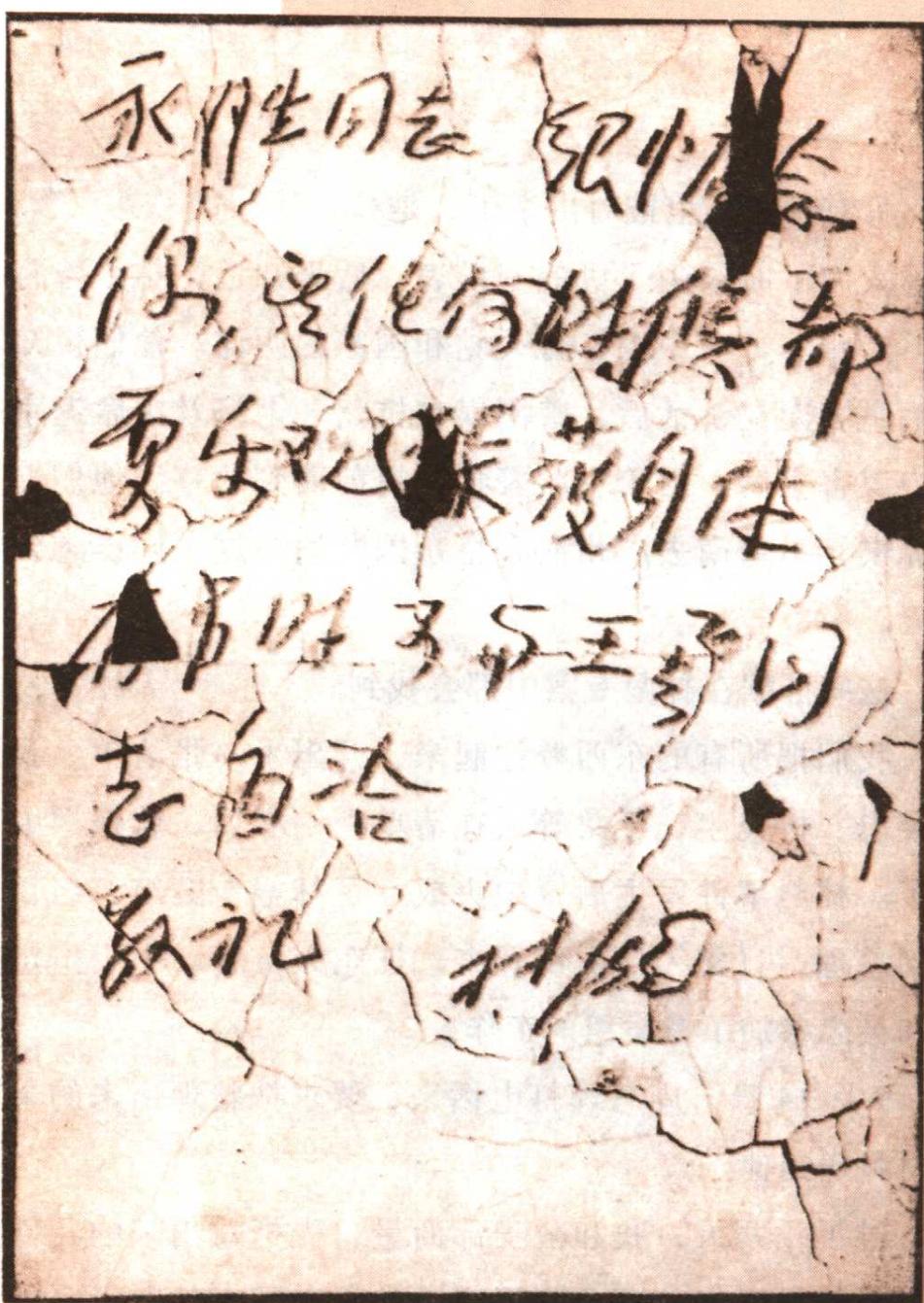
晚上，周总理打来电话询问收缴了些什么东西。

我报告周总理说：录音，我们听不懂；信，我们也没有对出来。我向周总理提出，我们不懂这方面的技术，工作很慢。

周总理指示：你告诉公安部，由他们派人解决。

公安部李震、于桑来了，经过公安部的技术处理，我们再听录音就很清楚了，信也经技术处理后很快就对出来了。李伟信交代：这个录音，是叶群与黄永胜通话时林立果偷录的。公安部的同志后来告诉我，林立果在录音时，对录音的速度进行了变换，是分别用几种速度录的。

信拼对出来了，一件是林彪的那个政变手令；一件



137

费尽周折拼对出的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

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要他有事和王飞接洽。林彪的这个手令和给黄永胜的信在周宇驰的手里。周宇驰是否见过黄永胜？黄永胜的态度是怎么样的？黄永胜后来矢口否认他知道这件事，拒不坦白。

另有一张纸也被对出来了，是林、叶、黄、吴、李、邱等人南下时乘坐飞机的安排表。后来知道，林彪曾有南下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党和国家的阴谋。他们得知了毛主席南巡讲话后，曾阴谋在杭州、上海及主席返京途中谋害主席，由于主席警觉，提前回到北京。他们惶恐惊惧，不敢南去广州而仓皇叛国北逃，这一阴谋遂告破灭。

这些证据在林彪专案中都会找到。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登记起来，开出了一张清单。我和吴忠、杨俊生、于桑等人在清单上签字后，就报送中央了。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成立了林彪专案组，组长是周总理，日常工作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中央指定我和吴忠参加了专案组的工作。

9月14日，周总理打电话来，要求把整理出来的主要材料送给他。

过了一两天，我和公安部商量，先把对出来的几件重要材料报送周总理。我记得一共报送了五件：第一件是林彪的手令；第二件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第三件是“小舰队”的名单；第四件是南下飞机的号码、人员安排表；第五件是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写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刘兴元传达毛主席南巡时和他们的谈话，顾同舟还在信上表忠心，说他在继续观察情况。后来知

道，这封信是顾同舟派他的老婆送给林立果的。

《“571 工程”纪要》是在以后的几天才发现的，它不在直升机上。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捡起来的。林彪叛逃后，李德生动员空军学院人员揭发情况，这个公务员就把写有《“571 工程”纪要》的本子上交了。

《“571 工程”纪要》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我都看了。纪登奎认为《纪要》的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后来是毛主席指示印发政治局的。毛主席看了《纪要》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我们把五件材料报送周总理后，政治局开了一次会议，黄永胜、吴法宪等人都参加了，也通知我列席了。我去时，就看见周总理拿着几份东西在看。然后，周总理拿出林彪给黄永胜的那封信让黄永胜看，黄永胜看完后很紧张，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没有说他是否看见过这封信。

周总理又拿出一个名单给吴法宪看。这时，吴法宪也紧张了，手直哆嗦，他看完后说这些人都是空军的。这张信纸的下角上写了一个“江”字，吴法宪说这个名单的字迹是江腾蛟写的，他认识。周总理拿着名单很仔细地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问，问他们的职务、家庭住址

等情况。当时，我想总理为什么要给他们看这些材料呢，我担心这样会出问题。事实上，周总理走着很稳妥的步骤和做着很及时的调查，把重要情况都立即掌握起来，他们逃不出周总理的掌心。

以后，这些“小舰队”的人都被抓起来了。大概有一个人没抓，他是人民日报社鲁瑛的弟弟，叫鲁珉。林立果他们商量让他驾驶飞机去炸桥，然后轰炸毛主席的专列，鲁珉接到“小舰队”的命令后，让他当医生的老婆用盐水把他的眼睛擦红肿了，进了医院，以此来应付林立果等人。

这些人被逮捕后，我们把他们的口供与李伟信的口供进行了对证，这样，才知道有一个“小舰队”，《“571工程”纪要》就是他们搞的，才看懂了这个《纪要》。“571”就是“武装起义”的谐音，“571工程”也就是要搞反革命武装暴乱、计划谋害毛主席的行动方案。

林立果他们在京有五个据点：西苑机场有两个，空军学院有一个，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有一个，沙河机场有一个。我去查看过西苑机场、空军学院和东交民巷的据点，吴忠把全部据点都查看了。林立果这些人政治上反动，生活上也十分糜烂。据点是“小舰队”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场所，也是他们吃喝玩乐的地方。据点里有一些从日本进口的录音、录像器材，当时，我们都没见过

这样先进的器材。还有很多录音带、录像带、唱片等东西，录像带里有一些是为林立果选“妃子”时一些被选上的人在小据点里的录像。还有一箱子被选“妃子”的照片。

13日，根据中央的指示，为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北京军区命令三十八军的三个机械化师、坦克一师、坦克六师和炮兵六师共六个师，归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这样，卫戍区的兵力，原有的四个师加上新配的六个师，就有十个师了。我们感觉到责任很重，也很紧张，不知道要出什么事。经过研究，确定了重点防御区域，北至南口，东到首都机场一带，南达保定以北。在13日或14日，部队就进到了预定位置。15日，在卫戍区召开了作战会议，我和吴忠、杨俊生都到场，各个师的负责人全参加。当时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全力对付内外勾结的阴谋颠覆社会主义祖国的敌人。

14日或15日，我们还给卫戍区开过一次会。“九一三”事件后，因为卫戍区要执行一些任务，当时强调保密，下边又不知道情况，执行任务时，遇到一些问题，也老有人问，很不好办。报经周总理同意，我们开了卫戍区的师以上的干部会议，我讲了一下林彪叛逃的情况和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参加会议的人听到林彪叛逃了，都大吃一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林彪是副统帅啊！

我还要说明一个问题，“九一三”事件中，周总理的指示和卫戍区执行的一系列应急措施，我们认为实际上是内防政变、外防侵略，对外就是对着苏联的。像这样的重大部署，按常规必须向中央军委、各总部请示报告的。但是那时已不能按常规来办事了。我和吴忠做了分析，认为黄、吴、李、邱都是军委、总部的负责人，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他们跟林彪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伙的。我们认为，对黄、吴、李、邱等人，中央虽然没有采取措施，但不等于他们就没有问题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很特殊，我们商量后决定，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必须确保卫戍区的部队置于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指挥下。我们指示卫戍区的机关、部队对来自军委、总部的电讯只收听，不汇报，就是只接收来的电话、电报，但不汇报卫戍区根据中央布置的应变措施的情况。当时，卫戍区的副政委邹平光极尽职守，昼夜在作战室值班，保证了这一指示的落实。

9月16日，周总理告诉我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向我们提出了抗议，抗议我们的武装飞机进入他们的国境。这架飞机已在蒙古境内坠毁。

周总理指示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向蒙古方面道歉，说明是中国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境内的，要求把死亡人员的尸体运回来。蒙古方面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人坐



折戟沉沙的林彪外逃座机残骸

143

的飞机坠毁了，由于我们已经道歉了，也没有再多为难我们，但不同意把尸体运回中国，提议就地安葬。周总理考虑，苏联当时还不知道林彪叛逃的情况，怕因运回尸体问题同蒙古发生争执会提醒苏联，就同意了蒙方的建议。尸体埋葬前，中国大使馆派人到现场察看和进行了拍照，尸体都烧焦了，认不出面目了。照片很快被送回国。周总理还让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去看过，叶群还能看得出来，她有长头发，林立果在腰上插着两支手枪也能看出来。

后来知道，林彪出逃时非常狼狈，连为林立果选好的对象张宁都没带上，林彪的侍卫长不跟林彪跑，从车

里跳出来了，好像他还挨了一枪。林彪到飞机场后，把驾驶员潘景寅（空军某师副政委）等人叫上，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上了飞机。林彪慌慌张张，来不及从扶梯上飞机，而直接从到飞机驾驶舱的小爬梯强登。林彪的帽子都丢在地上了，叶群还喊：快、快、快。飞机起飞时翅膀还碰了一下加油车，飞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起飞的。最大的问题是飞机上的联络员没带上，没有联络员，通讯联络不上，飞机到了温都尔汗找不到乌兰巴托了，可能油也不够了，温都尔汗是一个草原，飞机就迫降了。

使馆的同志回来后说，飞机的翅膀在飞机降落时折断了一个，以后飞机冲出了一千多米，机身因此破裂、着火。人可能是被猛烈的冲击甩出来的。草地上一片狼藉。

开始，苏联没有发觉。后来，听说苏联怀疑有问题，就把死尸挖出来锯下头骨弄回苏联。林彪曾在苏联治过病，苏联留有他的病例档案，从死者口腔的牙齿可以判明他的身份。当时，好像还甩出来一个空军什么人的证件。这样，苏联鉴定出死者就是林彪，传说勃列日涅夫连说：可惜呀，可惜！

有人怀疑飞机是被打下来的，不是。我们没有打，蒙古方面也没有打。

周总理说：如果林彪不摔下来，可能要到苏联发表

广播讲话。

林彪叛逃后，空气很紧张，还要保密。那时，街上贴有如“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大标语，我们提出清除一下，都不让动。

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等待黄永胜等人悔过自新，向党作出认真交待，但黄永胜他们什么都不坦白。他们住在西山，烧毁文件、搞串联、统一谈问题的口径。

9月23日的晚上，周总理通知让我到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厅我记不住了。我进去时，看见汪东兴、杨德中在那里。汪东兴和杨德中都说：黄、吴、李、邱这些人是军权在握，再不动他们很危险，这个事应该处理。我们正说着，周总理来了，汪东兴向周总理讲了要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意见。杨德中说：黄永胜在烧材料。周总理说，你们先等一等，说完他就同汪东兴一块出去了。

过了不长时间，半个多小时的光景，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告诉我们，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把黄、吴、李、邱逮捕起来。

我们研究了逮捕黄永胜这些人的办法。周总理对我说，明天早上李先念同志要去越南访问，他自己去送，邱会作也去送，让我也去，从机场回来时，对邱会作说有毛主席的指示要传达，这样就可以先抓邱会作。

周总理说：另外再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来

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是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黄永胜等人来后，先跟他们谈话，然后再逮捕。

周总理让我回去同吴忠商量，由卫戍区落实逮捕、押送、关押地点等问题。

我们对卫戍区是这样布置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来后，周总理和叶帅、纪登奎先与他们谈话，然后把他们带走。黄、吴、李分别由卫戍区的司令员、副司令员、副政委陪同，关押地点安排在卫戍区的第三师。

布置好卫戍区的准备工作后，我到人民大会堂汇报，周总理、叶剑英、纪登奎在场。我记得是在东大厅的小房子里边，我们四个人坐在一张方桌旁。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飞机场送先念同志时，周总理镇定自然，谈笑风生。我是很紧张的，心里老觉得绷着。邱会作从机场回来后，周总理、叶帅和纪登奎跟他先谈话，然后有人把他带走了。

通知黄永胜等人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后，他们过了半小时都没来，周总理、叶剑英、纪登奎和我坐在那里焦急地等。叶帅问卫戍区有没有部队在黄永胜等人住地附近。

我打电话问了吴忠，然后向叶帅报告说，有一个团在附近。

叶帅说：如果他们不来，或者抵抗，就用硬办法把

他们逮捕。

又过一段时间，黄永胜等人来了。周总理、叶帅、纪登奎到福建厅去与他们谈话、宣布决定，周总理让我和吴忠等候在东大厅，招呼卫戍区的人。

周总理与他们的谈话谈了很久，我听到黄永胜在嚷嚷，说他们冤枉等等。

我们又等了很久，怕出意外，我让吴忠到会场上看一看情况，吴忠进去后又等了一段时间，他们才出来。黄永胜是第一个出来的，吴法宪好像是第二个，他们依次被带走了。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被带走后，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了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会议，会议由周总理、叶剑英主持。

周总理让我参加这个会议，我对周总理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秘书、警卫、司机怎么处理。当时，把这些人的枪、公文包都缴了，他们坐的汽车也都搜查了。

周总理说：卫戍区找一个地方，农场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把他们弄到那里去办学习班，让他们学习、揭发，不要让他们太紧张了，黄、吴、李、邱有问题，并不等于他们有问题。

我对周总理说：这个问题过去没考虑到，现在需要



林彪和他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右二）、吴法宪（左二）、李作鹏（左一）、邱会作（右一）在一起

布置一下，我得去卫戍区一趟。

吴忠等卫戍区的负责人陪着黄永胜等人走了，卫戍区只留下邹副政委在，我向他作了布置。黄永胜等人的秘书、警卫、司机被拉到团河附近的一个农场去了，邹副政委亲自到农场去安排的，这个农场有一个连的部队。

这个问题解决后，时间已经很晚了。周总理通知让我回人民大会堂。我回到人民大会堂后，周总理交代让我守在电话机旁，了解黄永胜等人是否已被押送到关押地点、到达后怎样安置等情况。当时，卫戍区从师里、团里专门调了一些干部去看管他们。

不久，这些人顺利到达关押地点的情况先后报告上来，我都立即报告了周总理，让他放下心。

这时我已有两天一夜没有睡觉了，眼睛熬得通红，脑子都发木了。

应该再补充一个情况，说明完全是林彪自绝于毛主席、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1971年10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要到中国访问。之前，周总理要求组织20万群众，从机场一直到天安门、国宾馆，进行夹道欢迎。我们发愁了，怕“小舰队”还有一些什么人漏网，进行破坏活动。我担心在当时的形势下夹道欢迎会不安全，就提出只在飞机场欢迎的建议。周总理说：不行，还是要组织夹道欢迎。我意识到周总理的这一布置，是表示中国政局是稳定的。

我们就布置了，有组织地安排了人员，在主要的地点都安排了公安局、卫戍区的人员。

10月6日，外宾到北京时我们都到机场去接了，没有出现问题。塞拉西皇帝来后，周总理对我说：毛主席接见时，除我以外，肖劲光和你一起陪同参加接见。

10月8日，毛主席接见塞拉西皇帝。我和肖劲光同志提前到达接见地点等候。外宾来访之前，我们进去见毛主席，发现他老人家满脸倦容。毛主席缓慢地说：治病救人嘛，有病也不让治。他说原来准备在三中全会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安排林彪的工作的。毛主席还说：高岗不自杀，也准备安排他的工作。显然，关于林彪的事情，他到这时还没有撇下，甚至还困扰着他。

毛主席与我们正谈着，周总理陪着外宾来了。塞拉

西皇帝很健谈，他讲一阵，毛主席只答复他两三句。谈了很久，周总理看毛主席太疲乏了，就对外宾说两国之间的问题，我们具体再谈。这样，皇帝才告辞。

毛主席与我和肖劲光同志的谈话，再一次反映了毛主席对林彪“治病救人”的思想态度。

毛主席曾经认为“文化大革命”会在两三年内得以结束。“九大”召开后，他对党和政府的重建问题予以重视，并作了一系列指示。整党建党活动中，虽然整个建党的方针不能说是正确的，但重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稳定了经济、政治、社会的局势。1970年3月，毛主席又提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建议，想要解决政府重建的问题，但他又多次明确说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

“九大”时，林彪被确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同时，林彪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这个集团，这时已经把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看成是他们篡党篡国阴谋活动的重要时机，他们妄图利用这一时机，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企图，以便在更多的领域内夺取权力。表面上看，是林彪一反一贯紧跟毛主席的做法，建议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但实际上，叶群才说出了他

们的真实意图。叶群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文化大革命”中还有更为复杂的一面。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形成了另一个集团——江青集团（以后的“四人帮”）。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均由野心家组成，他们分别图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因为在打倒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某些领导干部时有着共同的利益，曾经结成过短暂的联盟。互相勾结，相互利用，以排除异己，企图乘机夺权。但庐山会议前，林彪意识到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又使得他们之间爆发了尖锐的冲突。在庐山会议上，林彪、陈伯达及林彪集团的其他成员就是企图借打击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阴谋篡党篡国。

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阴谋失败后，一再拒绝毛主席对他们的教育、批评和挽救，反而决心铤而走险，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准备工作，1971年3月，《“571工程”纪要》制订完成，准备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主席。林彪反革命集团由此走上了历史上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所走过的自取灭亡的道路。

林彪的野心在庐山会议上暴露以后，毛主席立即采取了措施，在庐山上就宣布对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

达进行审查。1970年9月毛主席从庐山回来时与我们的谈话，虽然没有点林彪的名字，但已经是在教育我们对庐山的矛盾要进行更深的思考。从这以后，毛主席领导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由庐山会议暴露出来的问题。1970年10月，毛主席分别在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上批示，严厉批评了吴、叶及军委办事组林彪集团的成员。11月，中央成立了组织宣传组，组员中没有林彪集团的成员；同月，中央发出高级干部要学习马列著作的通知，提出“高级干部只有读一些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12月，毛主席在中共三十八军委员会《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批示，要求北京军区开会讨论解决“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使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的太上皇”的问题；同月，毛主席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四个伟大”是形式主义，讨嫌。1971年1月，毛主席指示改组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这就是毛主席在南巡谈话中所说的“挖墙脚”。2月，毛主席严厉批评军委办事组召开的军委座谈会“根本不批陈”。4月，毛主席指示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由黄永胜、吴法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这就是毛

主席在南巡谈话中所说的“掺沙子”。同月，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总理在总结讲话中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希望他们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一系列重要指示、措施的贯彻执行，一方面意在提高广大高级干部识别问题的能力，教育、批评和挽救林彪集团的成员改正错误；另一方面也从实际出发，削弱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势力。

林彪事件后，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在庐山会议后的一系列讲话、批示，受教育最深的就是毛主席在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这一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始终相信我们的人民、始终相信我们的党、始终相信我们的军队。毛主席多次指挥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他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毛主席说：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陈独

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我们这个党 50 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分裂了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贊成分裂。毛主席曾满怀信心地说：“我觉得我们的军队很有希望。”他说：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不摘苹果，这样的部队有希望；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毛主席多次说：我就不相信黄永胜能调动军队造反，你调动军队搞坏事，听你的？

1972 年 7 月，毛主席在会见法国外长舒曼时自信地说：我们开了那个庐山会议，1970 年 8 月 23 号一天，24 号一天，25 号半天。第三天下午，我就说不行了，不能干了，下了一滴酒精。一滴酒精下去，细菌就不活动了。

毛主席就是这样，在他老人家的一生中，对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缺点、错误、困难，始终予以高度重视，并相信我们的党只要依靠群众就会有力量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有能力领导我们的国家继续前进的。

毛主席他老人家之所以能够识破、战胜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林彪反革命集团，我想除了他老人家领导党、军队在几十年浴血奋战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的斗争经验之

外，还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保存着，我们的党、军队、国务院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民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党和军队，他所创建、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亿万人民，始终把毛主席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

关于在批判
“经验主义”等问题上
同“四人帮”的斗争

八

Guanyu Zai Pipan

“Jingyanzhuyi” Deng Wenti Shang
Tong “Sirenbang” De Douzheng

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

批林批孔座谈会



我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有个认识的过程，特别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以后，对他们的认识逐步提高，对他们的活动有所警惕。“批林批孔”实际搞成批“周公”，即批周总理。政治局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方针、步骤都没有讨论过。事后证明，毛主席对他们的具体活动也不完全清楚。

1974年1月24日，江青等人背着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召开在京部队干部大会，搞突然袭击，指责周总理。第二天，周总理被迫主持召开了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四人帮”私下商量后要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作报告，报告的内容除“四人帮”外事先政治局都不知道。“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三箭齐发，这样大的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这是违

背党的组织原则的。当时，江青还提出要下发经他们整理的讲话录音。毛主席知道后，认为三箭齐发是错误的，制止了。毛主席并在叶剑英同志给他的一封信上写了如下批语：“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并批评他们“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这个时候，中央的政治生活被“四人帮”糟蹋得不像样子，我对“四人帮”的活动、言论更加警惕了。北京市对“四人帮”布置的事，能应付的就应付，能顶住的就顶住，凡是没有中央正式通知的，都把住关。

“批林批孔”夹着批“走后门”，在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之前，北京市没有传达。在“四人帮”大批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和江青宣传小靳庄经验时，我布置市委宣传部、北京日报社不要批“唯生产力论”，不宣传小靳庄经验。江青去棉纺厂参观，提出要给每个女工做一套所谓的“国服”。陪同江青参观的北京市委书记丁国钰回来后向我汇报了这件事。我说：那怎么行，谁来拿这个钱？这件事顶住不办。江青要做“国服”的事，先念同志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批评了江青。毛主席说：做“国服”，让她拿钱。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全面整顿后，我传达了小平同志关于几个方面整顿的讲话，召开了整党座谈

会，搞了整党的试点工作。我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提出的对《创业》的十条意见。我传达了毛主席评论《水浒》的谈话，没有传达姚文元写给毛主席的信。

1975年4月，江青在邓小平同志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批“经验主义”。她气势汹汹地说：当前的大敌是“经验主义”，政治局应该讨论，而且要交锋。邓小平同志胸有成竹，沉稳地坐在那里，没有理睬，会议讨论了别的问题。江青很气恼。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前，江青就到处送所谓上海机床厂反对“经验主义”的十条经验等材料。张春桥在全军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大批大反“经验主义”。姚文元发表文章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一时间，批判“经验主义”的舆论甚嚣尘上。

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批“经验主义”的问题被邓小平同志搁置后，他们采取了一个新的办法，在新华社报道计划中来提出批判“经验主义”的任务。姚文元将这个计划报送毛主席审批，企图蒙混毛主席能对报道计划作出圈阅。如果毛主席圈阅了，中央政治局就要讨论执行，这样他们就可以另搞一套。批所谓的“经验主义”，矛头完全是指向周总理和邓小平以及一些老干部的。

他们的罪恶计划落空了，毛主席没有圈阅同意，而且还批评了。“四人帮”把石头砸到了自己脚上。

4月27日晚上，政治局开会，邓小平同志主持，新华社朱穆之同志列席会议。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是什么，通知开会，我就去了。会议开始后，姚文元说毛主席有个批示，他念了毛主席在新华社的报道计划上的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当时批判“经验主义”的舆论已经造得很大，火已经被“四人帮”点得很旺了，没有尚方宝剑，不足以扭转它。所以，在政治局会上，除“四人帮”之外，大家的意见都是要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这样才能刹住批“经验主义”的歪风。

“四人帮”当然不甘心，张春桥气急败坏地首先起来反对。他说，毛主席的批示在其他文件上顺便提一下就可以了。他想尽量削弱毛主席这个批示的影响，以维持他们的局面，稳住他们的阵脚。双方僵持了。

张春桥的企图是徒劳的。他们也许意想不到，有毛主席的批示，我们也就好说话了，增加了胆气。我发言了，批评了他们。在发言中我说：毛主席的批示应该下发，否则，批“经验主义”的那股风在北京就刹不住。我还说：这样大的问题，不经过政治局讨论，也不请示

主席，以个人名义到处送材料、发信，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主席可以这样做，其他政治局成员未经政治局讨论不可以这样做。现在老干部刚出来参加“三结合”，刚刚稳定和安顿下来，你们又搞起什么批判“经验主义”。所谓批判“经验主义”是反对老干部的，你们几个人背着政治局这样搞是宗派主义！

我发言时，江青一直瞪着我，姚文元也发呆似的看着我。

叶剑英同志接着说：主席讲你们是“四人帮”，要你们停止活动，你们是停止活动了，还是照样活动？问话非常有力，也鼓励了以下的发言。

其他同志发言，都要求把毛主席的批示发下去。

但“四人帮”一言不发。会议开得很僵，不欢而散。

散会后，邓小平同志对我说：你今天鼓了很大的勇气吧？我说：是啊。

4月28日，周总理找我去谈话。当时周总理住在三〇五医院。

周总理说：你们在会上吵起来啦？

我说：只是声音大了一些。

周总理说：你还能吵起来？和为贵嘛！团结要紧。

我说：我看不惯了，就说了几句话。

周总理说：要注意方式，多个别交谈，别影响团结。



1954年，吴德与毛泽东在一届人大会议上。二排右一为周恩来

周总理与我谈了个把小时，主要是讲要团结，要注意方式。

我走时，周总理送我，我看他心情很沉重。快出走廊时，我说：总理，您回去吧。

周总理问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

周总理当时语重心长。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我对周总理说：我懂了，我有精神准备。

5月3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处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始前，毛主席与大家握手，并在与我握手时说：“吴德有德。”毛主席说这个话，有两次。一次是1971年的9月12日，毛主席在丰台说过。这次是第二次。5月3日这天毛主席的讲话，集中批评了

“四人帮”。

根据我存的记录，大意这样：

“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同志给我，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经验主义，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反走后门……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大学，她们劳动了几年，我也是走后门呀，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

“不要看低教条主义，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了，历来对经验主义没办法，我是没办法，（只能）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可能好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我说的是（要）安定团结，（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四人帮’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二百多中央委员，为什么不和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

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这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再重复一遍，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其他事情你们去议。依我看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治病救人，这次不处分任何人。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多……”

164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都没有参加，（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的历次斗争），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了。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

“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遵守纪律，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先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以个人的名义。比如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同志谈过一次。王洪文同志要见我，江青同志打电话又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

会开完后，王洪文过来同毛主席握手，并说要按主席指示办。毛主席作手势，要他不要翻过来覆过去，摇摆不定。

看得出毛主席对“四人帮”的作为很不高兴。但我对毛主席说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的话，摸不着头脑。

5月3日的政治局会上，毛主席决定，以后要开会批评“四人帮”。邓小平同志主持了批评“四人帮”的会，二十多天中陆续开了一些会，“四人帮”在会上什么都不说，也不检讨。

在一次会上，纪登奎和我还有几个同志问王洪文说：你们几个人商量，你背着周总理、政治局其他同志飞长沙见毛主席，你谈了什么？任我们怎么问，王洪文也不吭声。

后来，邓小平同志、李先念同志找我们几个人说：现在工作繁重，这个批评会先停一下，问题可先挂起来，以后什么时候想批就批。

这个暂告一段落的意见经小平同志请示，毛主席同意了。

以后，政治局曾传阅过江青写的一个很不像样子的检讨。周总理在江青的检讨书上写了一大段的批语。毛主席也圈阅了这个检讨。

5月3日政治局开会后的一天，张玉凤找我，说要我介绍到友谊商店买东西，实际上是毛主席派她了解政治局会议召开情况的。张玉凤在闲谈中问谁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比较好。我也问张玉凤，如何理解毛主席在政治局会上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的话，我说我不懂这个意思。张玉凤说：4月27日政治局会后，江青打电话告状，要她转告主席说，4月27日的会议上，叶（剑英）、吴（德）等跳出来围攻他们，连倪志福也跳出来了，这是庐山会议的再现。张玉凤说：毛主席不同意江青这样说，所以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我才恍然大悟。

5月3日后，毛主席就不愿意见“四人帮”了，“四人帮”的嚣张气焰也稍有下降。

“四人帮”见不到毛主席了，他们就又想办法接近毛主席。1975年9月30日，毛远新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上旬回到北京，借口要向毛主席汇报辽宁的工作而未返回辽宁。毛远新在向毛主席汇报时，乘机向毛主席耳边吹风，说辽宁的干部和群众反映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还反映了一些邓小平同志的言论。

毛主席听了，对毛远新说，这些意见（指毛远新反映的邓小平同志当时的言论），顺着不好。毛主席要毛远新当面与邓小平同志谈，并且让李先念、陈锡联、纪登

奎、华国锋、汪东兴参加。

后来，汪东兴、纪登奎告诉我，这个会上谈得很僵。邓小平同志说：你这些意见不就是说我犯了路线错误？毛远新说：提意见嘛，要杀头吗？以后小平同志收回这个话。

在毛远新与邓小平同志谈话的第二天，邓小平同志把我找去，谈了十一条意见，主要是将他与毛远新谈话的情况告诉我。

这次谈话后，政治局的同志见不到毛主席了，邓小平同志见不到毛主席了，王海容、唐闻生也见不到毛主席了。

毛主席当时身患重病，身体不好，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他又不愿见“四人帮”，结果就指定了毛远新做他的联络员，并在政治局宣布了这件事。

邓小平同志当时已经很困难了。

1975年，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毛主席写信，揭发迟群、谢静宜的问题。迟群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任副书记。刘冰等人写的信，分别送给了邓小平同志和我，内容是一样的。送给邓小平同志的信，邓小平同志转送毛主席了。给我的那一封信，我压住了。因为清华大学党组织关系在北京市委，我就找迟群和谢静宜谈话。

我对迟群、谢静宜说：刘冰同志对你们有意见，你们几个书记先谈谈，人家有意见嘛，谈不拢再开个常委会，看一看能否统一起来。我还说：人都是有错误的，要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批评不对的要解释清楚，批评正确的要接受。要搞好团结。

迟群表态说：回去后就征求刘冰的意见，不会有大问题。

我与迟群、谢静宜谈话后的一天，在国务院遇见了纪登奎同志。他说刘冰同志提出要找他谈一谈，问我刘

1975年，吴德与纪登奎在北海公园



冰要谈什么问题。

我说刘冰对迟群、谢静宜有些意见，写了一封信。纪登奎同志提出可否看一看刘冰的信，信正好放在我皮包里，就给他看了。

纪登奎同志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她回家说迟群与谢静宜在1974年“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央的8号文件不同，哪个对？

纪登奎同志说迟群、谢静宜的讲话是错误的。他告诉女儿，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毛主席批评了。当时政治局开会要求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但江青、张春桥提出为了保护青年干部，文件不要下发，可以在别的文件中点一下这个事情。8号文件就是这个文件。

纪登奎同志的女儿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刘冰同志。刘冰对迟群、谢静宜的意见就更大了，在迟群、谢静宜与他谈话时，双方谈崩了。

不久，李先念同志陪同外宾去见毛主席，外宾走后，毛主席留李先念、汪东兴同志谈话。毛主席说：刘冰的信矛头是对着我的（指赶工宣队、军宣队）。我就在北京，写信为什么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他。

毛主席还指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迟群、谢静宜六个人开会，由李先念和汪东兴同志传达他的意见，要这六个人提出如何解决的方案，在清华大学由小

会到大会辩论刘冰的信。

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同志叫我起草一个方案。我提出的方案是，由参加六人会议的迟群主持召开清华大学的会议，让迟群传达，先开小会辩论，视情况发展再召开扩大会议。

这个方案送李先念同志看后，他提出至少要搞两至三个方案，以便主席选择。他说清华大学党组织的关系在市委，要有一个由市委主持传达的方案。

我在原来提出的方案基础上吸收了李先念同志的意见，加上了由我代表市委传达的方案。邓小平同志看过我上报的两个方案后，也同意我去传达，他找先念、东兴和我在国务院的小会议室开了一个会。邓小平同志对方案稍加修改，加上了把这些情况向政治局汇报，先把方案报送毛主席。这个方案由我们四人签名，报送给毛主席。很快批回来，毛主席在由我去传达的方案处画了三个圈，表示同意这个方案。

这些情况向政治局汇报后，我就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进行了传达。

当时，毛主席的指示的第一句话是批评江青的，说她没有自知之明。我在传达时没有传达这句话，毛主席批评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也没有传达。我只说刘冰同志对迟群、谢静宜同志有些意见，写了封信给毛主席，毛主

席收到刘冰的信后，指示要开会辩论。

“四人帮”这回可抓住我了，张春桥质问我为什么不传达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那句话，我说是辩论会嘛，如果先讲了毛主席说这封信的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谁还敢讲话？

后来，清华大学开全校大会，我说迟群讲话就可以了，但“四人帮”逼着我去清华大学全校大会上传达。他们说，毛主席让你参加六个人的会议，清华又是北京市委管的，你应该到大会上去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还要传达毛主席说信的矛头是对着主席的这句话，要大家讨论好、辩论好。

无奈，我只好去清华，但我只讲了五六句话，借口有事要先走，就交由迟群主持会议。

这个事情后来被“四人帮”、毛远新插手，闹大了，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进而转向邓小平同志。毛远新曾对倪志福同志说，刘冰敢于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因为背后有人支持。支持刘冰的有两条线：一条线是邓小平、周荣鑫、胡乔木、李昌、胡耀邦，一条线是纪登奎、吴德。

后来，“四人帮”策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清华党委要向政治局汇报，周荣鑫、胡乔木、李昌、胡耀邦参加。邓小平同志事先向这些同志打了招呼，让他们准



1975年,清华大学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中的大字报

172

备在会上作检讨。在政治局会议开始前，我在大会堂东大厅遇到邓小平同志，他对我说：也有你的什么事？

会议开始后，先是刘冰同志起来“揭发”我们。他说他的一封信是经胡乔木、周荣鑫等同志送邓小平后转送毛主席的，另一封信是送给吴德，吴德又交给纪登奎的。胡乔木、周荣鑫、李昌、胡耀邦承认信是经过他们转送的，并且做了检讨。我们“这条线”的纪登奎也检查了几句，我没有吭声。这次会议的后一段是迟群、谢静宜及清华大学的什么人站出来发言，揭发邓小平同志，语言比较恶毒，围攻了一两个小时。

这些活动是“四人帮”、毛远新策划、布置好了的，目的就是反对邓小平同志，打击老同志。

粉碎“四人帮”后，有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

是“四人帮”的人，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我在清华点的火。小平同志出来说：这件事我知道，他不是“四人帮”的人。李先念同志也作证，表示整个事情的过程他都知道。

“文化大革命”后期 在解放干部问题上的 一场斗争

九

“Wenhuadageming” Houqi
Zai Jiefang Ganbu Wentishang De
Yichang Douzheng



1974年年底，毛主席在长沙，周总理去见过毛主席。周总理回来向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先解决外部矛盾；同时，也要准备很快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问题。毛主席还说，不要原来管专案的人员参与这件事，要过去未管过的人去办。专案工作曾经由三个办公室管理，“一办”由汪东兴负责，“二办”由黄永胜、吴法宪负责，“三办”由公安部谢富治负责。“九一三”事件后，“二办”撤销，其所管的专案分别划给了一、三办。周总理提议、政治局决定由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负责办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成立专案小组，汪东兴任组长。

周总理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搞专案的人，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好像就没有成绩”，华、纪、吴这三位同志

没有与一、二、三办沾边，超脱一点，由汪东兴牵头，因汪东兴在毛主席身边，有事请示方便。

周总理还说：毛主席已经批了 29 件解放干部的材料，我们应抓紧解决，不能每件都等毛主席批。

在此之前，我从未接触过专案工作。“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北京市工作，既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不是中央碰头会的成员。当时，专案的情况不许过问，甚至逮捕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市公安局局长李钊等人，我都不知道。那时受机关群众监管，刘仁被分配打扫厕所，忽然有一天不见了，我打电话问谢富治知道不知道刘仁的下落，谢富治说：你不要问了！

李钊也是这样。李钊是在原局长邢相生被关押后由公安部派来的新局长。有一天，我找公安局长，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又打电话给谢富治，问知道不知道李钊的去向，谢富治还是说：你不要问了！

还有范瑾，也是这样。忽然不见了，我怕出事，又问了谢富治，答复还是一样：你不要问了！

以后我的确不再问了。其实我也不是要问他们的案子，只是人不见了总要问一问吧。

这一次接受参加清理一、三办的任务，我的确是不曾沾过边的，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虽然是超脱的，可难就难在对这些案件的情况都不了解。毛主席几次催

同工作进展。周总理抓得也紧，要求在三个月内办好。社会舆论当然也跟了上来，多少人正盼着这一天，要求尽快释放被关押的老干部。我们感到要在三个月内解决完这件事很困难。当时，我们一方面抓紧听取一、三办人员的汇报，了解情况，看他们写的简要材料；另一方面要翻阅大量档案。这些档案材料很多，一摞又一摞，堆积如山，有的档案材料，光一个人的，要看完它就要一个星期。

而最困难的问题是“四人帮”的干扰。他们都是始作俑者，今天打倒这个人，明天打倒那个人，阴暗的报复心理和邪恶的野心驱使他们要打倒一切，整倒一切，要被打倒和整倒的人永不翻身。

这已是有前例的。1974年下半年，周总理曾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一批要解放的老干部名单，政治局开会不下十次，都因“四人帮”的干扰、阻挠而没有结果。“四人帮”借口这个问题不清楚，那个问题不清楚，提出需要再查。政治局会议有时讨论一整夜，争执不下。后来，叶剑英比喻行军牵骡子过桥，提出先易后难的办法，也没有行得通。在一次会上，叶剑英很生气，提前退席了，留下打油诗《过桥》一首。叶剑英把这首诗给纪登奎还有李先念看过，他们又给我看了。这首打油诗写道：“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

这时解放出来的老干部，都是毛主席批示解放的。所以叶剑英说“多谢牵骡人”。在“四人帮”的阻挠和干扰下，没有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也解放不成。

再举一个例子。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六十一个叛徒”的案件需要重新审查。1936年，我是地下党的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了解当时的情况，因此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了一下。当时的抗日统一战线形势很好，抗日战争需要大批干部。同时，日本侵略者已剑拔弩张，铁蹄霍霍，即将占领华北，我党被关在北平监狱的干部有被杀害的危险。这样，就由北方局提出并经中央批准，允许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这些干部履行反动派要求的一定手续出狱（包括在报上发表反共声明）。当时是北方局的柯庆施与我们接头的，地点就在我家。柯庆施到后，向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和我传达了经中央批准的北方局的决定，柯庆施要北平市委想办法找人打通狱内的关系。当时在监狱中的同志已经建立了党组织，负责人可能是薄一波同志。北平市委找到邢西平（即徐冰同志，当时任中国大学教授，地下党员），要他想办法。经他在上层活动，找到保外就医的孔祥桢同志（建国后曾任轻工部副部长）与狱中联系，传达党中央的决定。狱中的同志开始不相信，认为这是敌人的阴谋，坚决不



1974年，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在一起

179

出狱，多次做工作后，才一批一批地出狱，由北方局分配了工作。我当时曾接过殷鉴（后牺牲）、鲁奔（后牺牲）、刘慎之等出狱同志的关系。“文化大革命”初期，吉林造反派揪斗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发现他是在1936年履行反共手续出狱的，给他扣上了“叛徒”的帽子揪斗。当时，我刚调到北京，知道这些情况后，曾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些同志出狱的经过，周总理说他知道当时的情况。同时，我还向周总理反映了我在长春的家被抄，其中有我参加历次中央会议的记录本被抄去的情况。周总理批评我不把记录本带到北京，太疏忽。我记得周总理批发了两个电报：一个是发给吉林省委，要他

们设法追回我被抄去的记录本；另一个是发给西北局和吉林省委的，大意是说明刘澜涛、赵林的出狱问题是经组织批准的，中央知道，如无别的问题，他们不是叛徒。其实，周总理代表中共中央批发的电报没有起作用。那时已经搅成一锅粥了，康生、江青等人为了打倒刘少奇，蓄意制造了这起大冤案。

我把当年我所经历的情况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了以后，江青变脸了，大声说：你们要给叛徒翻案啊！

江青这么一闹，邓小平没法谈下去了，我也不能说了。

180

因此，在这次清理专案工作中，我们想到“四人帮”肯定又会多方阻挠和干扰的。我们不能完全依靠原来的专案组，自己又不了解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三个月内就弄清情况，作出结论、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弄不好会把整个解放被关押干部的问题耽搁和拖延下来。

如何是好？华国锋、纪登奎和我都很着急。我们将情况汇报给周总理，请示办法。周总理经过思索，与我们商量，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就是除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林聿时、周景方等十几个人暂时不放外（王光美案另议），其他的人都先放出来，结论由中央组织部和本人单位以后再作。

这个处理原则经周总理报告毛主席同意了。

定下原则以后，处理有些具体问题还有难度。例如有中央文件决定的、毛主席批示的案件、人员，我们不好处理。我们又向周总理请示。周总理又同我们一起定了两条：

一、毛主席批的、中央作有决定的，特别是由中共中央向全党正式发了文件的，办理时要慎重，暂不复查，但先把人放出来，然后再审议。

二、凡是只有口供而无证据的，相信本人交代和申诉的意见，不必再纠缠。

这样就可以解决一大批干部的问题。

关于马明方同志的所谓在新疆叛变一案，公安部的于桑同志找到了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审问马明方等同志的原始记录，从这个敌伪档案中可以看出，马明方等同志在敌人审问中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是很有气节的。他不是叛徒而是很好的同志。“文化大革命”中有些所谓的证明材料，不足为凭。我们将马明方同志的情况上报周总理后，周总理指示应马上平反。可惜马明方同志被平反时已经在监狱中逝世了。

还有北京市体委的所谓无线电案，也被平反了。

在这中间，“四人帮”出来刁难，最会出鬼点子的张春桥振振有词地提出要我们搞出一个明确政策界限的文件。我们斟酌来斟酌去，好不容易把文件写好，在政治

局讨论时，仍因“四人帮”的百般挑剔而未获通过。

我们只得又找重病在身的周总理请示如何办。周总理说：以毛主席批的29个案例为根据，把毛主席批示解放干部的内容归纳列成条文，作为政策界限文件送政治局讨论，这样，别人（指“四人帮”）就不好说什么了。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写出《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和有关特赦的文件并附有这两个文件涉及的人员名单，先送了周总理审阅。

1975年3月5日，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打电话传达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说：告纪、华、吴，对特赦文件、专案文件已审查同意。已告王洪文，把这两个并附名单的文件提到政治局讨论。

政治局开会时，“四人帮”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仍有挑剔之意。我们理直气壮地说明：这是归纳了毛主席批示的各种案例后写出来的。他们这才噎住，不吭气了，没有公开反对。这个文件经政治局通过后，报毛主席审批。

文件送出，我们即将情况向汪东兴通报，提出这个名单我们批不了，要请毛主席批。

汪东兴向毛主席反映说：解放这批干部，纪、华、吴几位政治局同志批准不行。毛主席对汪东兴说：那你批吧！汪东兴说他批也不行，谁批都不行，只有毛主席

能批。

毛主席考虑汪东兴的意见后，指示汪东兴打电话给纪登奎、华国锋和我，说毛主席看了报告，还要看各案的全部名单，要求我们很快地把所有人员的名单送去。

我们好高兴，立即要一、三办搞出各专案人员的名单。名单搞好后，周总理要我们先送一份给毛主席，然后再送政治局同志。周总理说：这是毛主席急要的，毛主席没有批示之前，政治局不好讨论，政治局要等毛主席的批示。

周总理的这个办法，绕过了“四人帮”。毛主席听读了所有名单和我们的意见后，于3月8日批示同意，批件退回中央办理。这次共放出干部350多人，加上牵连专案的干部获得解放的有六七百人之多。

毛主席批示后，周总理又指示我们：人放出后，不要都堆在北京，有病的要好好治病，一般人可暂分到全国各地。周总理还要求我们写个报告，开个会，请各省来人交接，分到各省的同志以后再分别回京。周总理告诉我们，他已打电话给王洪文，由王洪文出面召集这个会，我们几个人参加。

当时我的思想还有些不通，认为这些同志的家都在北京，刚放出来又马上分到外地去，有点说不过去。然而这只不过是常人之见，还是周总理考虑得深，这个办

法避免了这些刚放出来的同志再遭“四人帮”的迫害，完全是出于保护的目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总理提出的这些与“四人帮”斗争的办法是颇费苦心的。有了这些办法，才能绕过“四人帮”的梗阻，得到毛主席的很快批准。如果不是先放人后审议，而是先审查后结论、再放人，必然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四人帮”必定会借种种问题发难，从而推迟放人的时间。周总理这样处理是非常恰当的，也是同“四人帮”的一场智斗。

放人后，传来毛主席的指示，说可解散各专案办公室。汪东兴回到北京后，说还要留一些熟悉材料的人。不过我理解，毛主席关于解散专案办公室的指示，包括我们四个人的小组也要解散，这以后我就不再看材料了。只是汪东兴有时有批阅的文件和材料送来，我也在文件上划过圈。这些划圈的文件，如有错误的，事先虽未经我审查，我也应负责。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平反冤假错案是很正确的。这是我们想到而未能办到的大快人心的事。

当时的“五一”和“十一”，报纸上都要刊登一个参加游园和国宴等活动的人员名单，这是周总理向社会传递一些老干部被解放消息的重要渠道。

比如周扬，我们原来也是想让他在国庆节露面的。

周扬原来是被卫戍区监护的。江青是文化系统专案组的组长，文化界的一些人，如周扬、夏衍、阳翰笙等同志的逮捕报告、监护报告，都是江青批的，还有上海、天津的一些人也是江青批准关押的。现在我们要解放这些人，触着了江青的痛处，她就多次问我周扬有没有问题。

我根据看过的材料告诉她，周扬没有什么问题，关于参加“左联”领导的事，在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扬等同志那样做，没有什么不对，而且是只有在具有坚定的信念下才可以做得到。还有周扬没有被捕过。

江青坚持说周扬的社会关系复杂。

我说在白区工作，没有各种社会关系的掩护，不可能工作得好，夏衍的情况也是这样。

江青认为周扬是文艺黑线的主要人物，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调查，并提出监狱空了把周扬由监护改送监狱。因此，我们专写了一个报告，要求释放周扬，提出没有调查清楚的问题可以继续调查，周扬放出来后发给生活费。

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到“继续调查”的地方批示：“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报告上写有“发给生活费”处批示：“工资照发。”

1975年国庆前夕，我们告诉吴庆彤说，在邀请出席国宴的国务院人员名单上，应列上周扬。

这个名单送到政治局讨论，吴庆彤汇报了周扬的情况。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同志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我们这些人是没有意见的，主要是要看“四人帮”通过不通过。

“四人帮”谁都不说话，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

吴庆彤甚至说：这只是多添一双筷子的问题。

这时，“四人帮”还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邓小平最后收场说：周扬这次不参加，我去向毛主席汇报。

后来，邓小平告诉我们说，毛主席批评了，应该让周扬出席国宴。

1975年10月1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吴德、徐向前、聂荣臻、陈云、周建人、许德珩、余秋里、沈雁冰在中山公园与群众共度国庆



不管怎么样，周总理为解放干部费尽了心思，坚决完成了主席的指示。

(按：当年本篇文稿整理出来后，吴德同志曾表示要“写一点教训”。其后，吴老身患重病以致不治，“写一点教训”的愿望就只能成为本文的遗憾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 纪事

“Fanji Youqingfan’ anfeng”

Jishi

十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不得人心的。

“文化大革命”很多年中，走了极端，在江青等人的一路砍杀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都没有了。八个样板戏一花独秀、独领风骚，戏台上、电影剧场里、大街上的广播器中，翻来覆去都是八个样板戏的声响。这样的局面当然不能维持下去。到 1975 年，毛主席曾经比较多地对之作出纠正，对电影《创业》、《海霞》都有过重要批示。

早在 1975 年 2 月间，江青调看《创业》后，心血来潮地对它横加指责，说“《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江青这么说，文化部的于会泳等人就不会相反说，他们跟得非常快，使起打棍子手段，给《创业》罗织了十大罪状，压得拍制这部电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都抬不起头来。

7月初，毛主席在同小平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道：“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不久，毛主席又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信息传出，鼓舞了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受压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张天民同志向毛主席和邓小平分别写了信，反映江青和文化部对《创业》的批判是没有道理的，希望能够重新



上映。结果毛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都是发生在7月里的事。

毛主席讲话了，江青该听了吧，她根本不听。她对张天民敢于写信告她的状，恨之入骨，总在瞅着机会要算账。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召开。本没有江青的事，江青却也去了，听说还带了她心爱的马。她在大寨直接打电话发号施令，把吉林省的省委书记王淮湘召到了大寨，要他施压力让长春电影制片厂《创业》的编剧张天民写检讨，给毛主席重新写信，承认《创业》是有错误的。江青破口大骂张天民是“谎报”。

王淮湘回吉林时，在北京住了几天。

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三座门开会，会议是叶帅主持的，内容我现在忘记了。我只记得陈锡联不满意地说：王淮湘没有经过中央的同意，就到大寨去了。

会议散后，陈锡联约我和纪登奎去找王淮湘谈一次话。陈锡联担任过沈阳军区的司令员，王淮湘是十六军的。

我们把王淮湘从京西宾馆接来，问他是谁让他去的大寨？为什么不经过中央办公厅？在大寨都谈了一些什么话？

王淮湘拿出笔记本，向我们讲了江青与他的谈话。

他讲完后，陈锡联说这些问题都没有经过中央，毛主席刚批示过《创业》，传达江青让张天民检讨的话不合适，违背毛主席的指示。陈锡联不让王淮湘传达江青的讲话。

我和纪登奎是跟陈锡联的观点、态度相同的，都批评王淮湘不经中央批准就擅自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并说江青的讲话不对。

王淮湘把我们的话当作耳旁风，回去后照样传达了江青的谈话，在《创业》的头上再次刮起冷风。

在电影《海霞》上，江青他们也搞了一出。1975年6月，于会泳等人秉承江青意志，以生杀之权派人查封了《海霞》的全部底片和样片，掀起了对该片的大批判，说它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帽子戴得很大。《海霞》影片原在这年春节就经周总理审看过，后来朱德、李先念等都调看过，他们都是肯定的，并认为可以用来招待外宾。江青等人之所以那样搞，矛头看来也是对着周总理等的，你说好，我就说坏，对着干。《海霞》的编导者谢铁骊、钱江忍受不住，先后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申诉。毛主席很快回应，也是7月间的事，批示将信印发政治局同志。

毛主席批示后第三天，小平同志立即调来这个片子审看，把原来拍摄的和经过修改的两个片子都调来了。



电影《海霞》剧照

修改的片子，改了很多镜头，重拍了很多。修改后的一些镜头，比原来拍摄的是好一些。江青后来说邓小平调片子看，一再催索，快把于会泳的家都抄了。

193

小平同志通知政治局的同志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看《海霞》。我记得张春桥参加了，好像先念同志、陈锡联同志也参加了，文化部的于会泳、谢铁骊也去了。两个片子放了两三个小时，演完后，小平同志在休息室里主持了对影片的讨论。先念、陈锡联和我去了，张春桥也在，其他的同志我记不清了。

小平同志说：大家看后有什么意见？

很长时间冷场，没有人发言。

考虑好后，我发言了。我说：这个片子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至于艺术上还需要一些加工。现在，已经重

拍了一些镜头，是不是把原来拍摄的和后来加工重拍的一些镜头连接起来制作，然后对外放映。

小平同志问张春桥有什么意见，张春桥说没有意见。

小平同志对张春桥说：你管文化部，由你通知文化部，就这样演出吧。

张春桥没有表示反对。

这次政治局的讨论会，王洪文、江青、姚文元都没有参加，纪登奎好像也没有参加。文化部的于会泳、谢铁骊也没有参加。

《海霞》问题被邓小平解决后，江青很不满，大发了脾气，她那时被称为文艺界的旗手，没有人敢讲话，但小平同志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硬顶了江青。

风云多变，1976年，“四人帮”就把这件事作为文化部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典型事件，大追风源。

毛远新直接插手清华、北大“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我去过两次，后来就不去了。

毛主席指示毛远新与邓小平谈话后，开始由政治局部分同志参加，以后是政治局全体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要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谢静宜、毛远新参加了，迟群参加没有，我记不清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远新传达了毛主席的很多指示，是经毛远新

整理的从1975年10月到1976年1月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历次谈话。毛主席说邓小平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了。这句话是最厉害的。

这以后的一天，小平、先念和我到飞机场去送人，小平同志在客人走后，与先念和我谈了一次话。

小平同志说：看来毛主席的决心已经下了，我要退下来了。我要写信给毛主席把职务辞去。

先念同志说：不能写信给毛主席，你一写信就会被别人当把柄抓，说你不愿意为党工作了。

小平同志考虑了先念同志的意见后又说：首先要把最敏感的军队的职务辞掉。

当时，我对小平同志说：是否可以找毛主席直接谈一谈情况，如果形势再乱下去，首都的工作首当其冲。

先念同志也说，他要给毛主席写信，提出身体有病，请求休假。

我们三个人谈了一个多小时。

那时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小平同志在奉命主持召开的第一次打招呼会议上，迫于压力，自己讲他犯了路线错误，请大家批评。小平同志为别人着想，还向纪登奎、李先念、华国锋等人打了招呼，让他们批判他，说，否则他们也站不住脚。接着中央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为难了，很难办了。

这时，北大、清华的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毛远新、迟群他们搞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100 问》等东西。

2月下旬，华国锋主持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各地负责人还去清华看了大字报。华国锋在会上作了一篇讲话，要求转好弯子，这样形成了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北京市委在当时处境非常困难。

在这里就有必要谈一下谢静宜的情况。大概在 1973 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谢静宜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前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向她提出的一些意见，她还是听的。她那时甚至还能把这样一些话传达给我，说毛主席说：江青是一个大女流氓，有野心。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我们的分歧就大了，谢静宜基本倒向“四人帮”，跟着毛远新跑。她负责管团委工作，在团系统点名批邓。我批评了她，说中央没有决定点名批邓，我们市里不能点名，邓小平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嘛。谢静宜根本不听我的，继续在团的会上

点名批判邓小平同志。

这以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对华国锋说：谢静宜他们要点名批邓，在中央没有表态之前，允许不允许这样做？华国锋是慎重的。

北京市委是直到中央批准可以点名批邓后才点名的。

召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时，马天水揭发邓小平同志在上海与他谈过话。会上还批了周荣鑫。“四人帮”是想让迟群代替周荣鑫的。周荣鑫后来还是被他们整死了。

在华国锋主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会议期间，倪志福去看上海参加会议的马天水、王秀珍等人。倪志福去时，毛远新也在，毛远新当着倪志福的面说：我们上海、辽宁批邓敢于无法无天，北京市胆小如鼠。

这期间，谢静宜还找刘传新、徐运北、丁国钰谈话，提出要揭开北京市委的盖子，说市委右得不得了。谢静宜说：“丁国钰，你也要检讨。”丁国钰同志被迫写了一个检讨。谢静宜提出丁国钰要检讨，想在丁国钰检讨后，就提出要我检讨的问题，顺藤摸瓜嘛。他们当时是准备闹一闹的。

那一年，姚文元的爱人金英调到北京，通过中央组织部要安排在北京市委组织部。我与她谈话时，先对她

表示了欢迎，同时提出市委组织部的人已经很多，可否安排她去市委研究室工作？我说：在研究室工作可以到处跑一跑，看一看北京市的情况。

金英跑了一段时间之后，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她说上海是新干部提拔得很多，北京市老干部很多。我说情况不一样，北京市原来的老干部就多。

谢静宜为此提出要一份市委的部、局、委、办的老干部名单，她要这个名单的目的是要批我们是右倾复辟。这个主意是“四人帮”出的。

丁国钰要组织部开了一份名单，送给我时间怎么办？我说：就说送给我了，她要时让她找我要。我把这个名单压下了。我找谢静宜谈了一次话。谈话中间我提出我们对江青的那点认识是听她传达毛主席说“江青是一个大女流氓”后才产生的，毛主席的这个谈话，我要向政治局报告，说明是谢静宜告诉我的。

我与谢静宜这次谈话后，不知是谈话起了作用呢，还是有别的原因，谢静宜有了退缩，不硬逼了。

针对谢静宜提出的要在市委常委会上揭开盖子的言行，我决定每次开常委会都要扩大，每次扩大到一二百人参加，迫使她不敢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发难。

我还让丁国钰把写好的检讨送给我，我对他说：我还没有检讨嘛。

谢静宜看着这个办法不行了。她在一次打电话中对我说，市委要检讨。早些时候，毛主席一再讲要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毛远新就提出了辽宁学习理论的具体做法，叫什么我记不住了。当时，中央正在推广这个经验。所以，我对谢静宜说：现在的主要工作是要抓好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的学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时你也在场呀！谢静宜考虑了一阵子，只好说那就搞个学习班吧。

学习班是由市委宣传部负责，宣传部的副部长徐骏主持的。北大、清华都派人参加了。在学习班上，二七车辆厂的同志不同意北大写作组的观点，双方发生了意见分歧。

先用开常委扩大会的办法，然后又采用举办学习班的活动，阻止了谢静宜搞乱市委的企图。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之后，大事接二连三地发生，谢静宜就忙不过来了。

1976年天安门 事件的经过

1976Nian Tian'anmen
Shijian De Jingguo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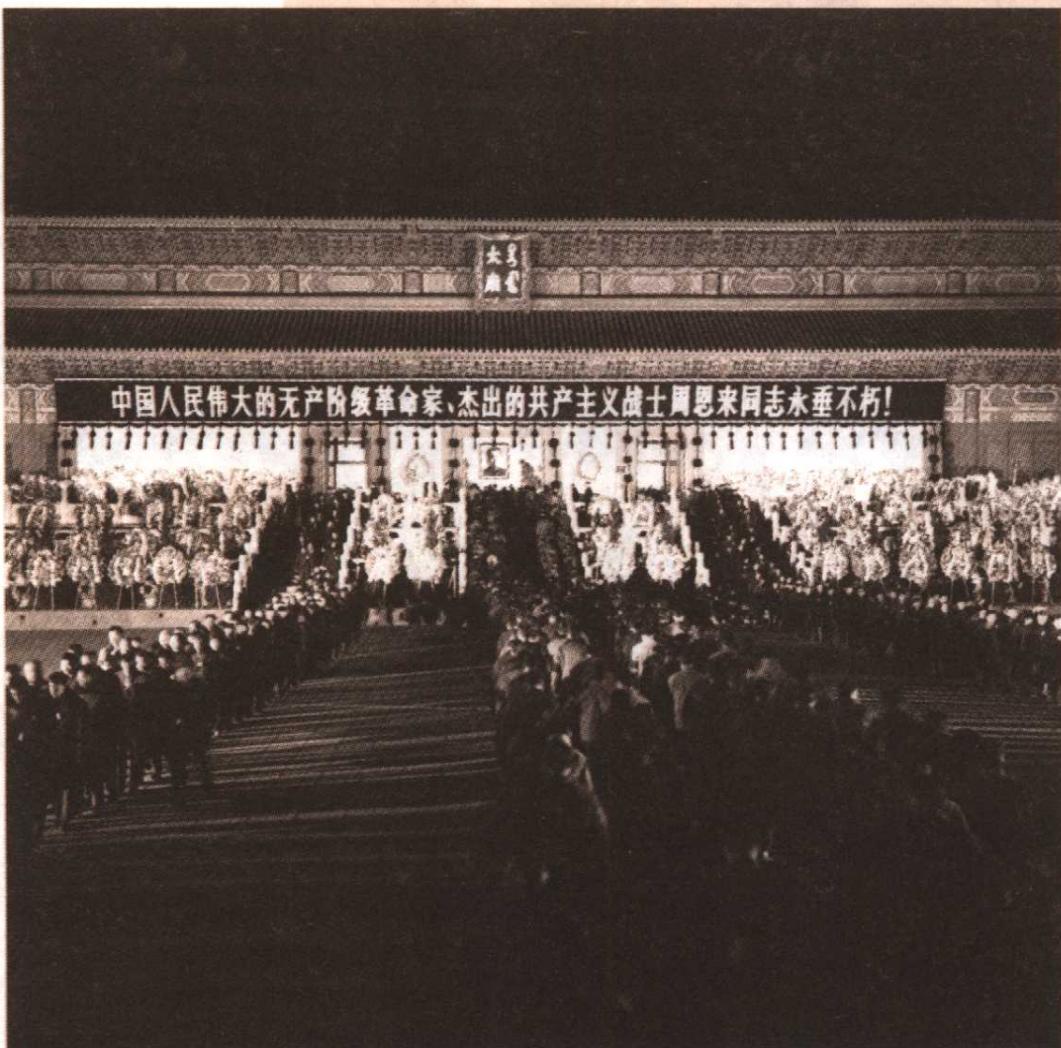
1976年是很紧张的一年，大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波澜迭起。

1月，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同时，“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① 4月，是载入史册的天安门事件爆发。7月，是德高望重的朱老总逝世。在这个月里又发生了伤亡数十万人的唐山大地震。没多久，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在9月里溘然长逝。神州大地承受着空前的震动。

我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这些剧烈的事变面前简直透不过气来。

1981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202

各界群众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悼念周总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确指出：“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

一切职务。”历史无情地把我卷入了天安门事件之中，注定地犯了错误。

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有一个积累、演进的过程。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①这是我深深感觉到的。周总理的巨大人格力量凝聚着党心民心，也使敌对者惊惧和怀恨。总理的逝世，对社会的震动很大。当时，很多国家的政党、政府提出派人到中国来参加治丧活动，政治局曾为此开讨论过，决定婉言谢绝。“四人帮”出于对周总理的极大忌恨，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我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就看见过姚文元训朱穆之，说讣告、唁电登得太多了。后来，报纸上对各国的唁电只作了摘登。更有甚者，“四人帮”凭着他们当时掌握的权力，无视人民群众的意志，玩忽人民群众的感情，要治丧委员会发出一个通知，要求不准设灵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这几个异乎寻常的不准，竭力缩小悼念周总理的规模，贬低周总理的功绩，自然要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干部终于认清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愈是不准，愈是要突破它。正义的力量敢于蔑视“四人帮”的淫威，同“四人帮”的势力较上了劲。

对于治丧委员会所发的那个通知，北京市没有传达。当时，北京市的黑布、白纸都卖光了。

1月11日，周总理的遗体火化时，北京医院至八宝山沿途，一二百万人肃立严寒的街头，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哀思。多少人含着悲愤的眼泪，多少人痛哭失声。

从3月底开始，北京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各界群众，不顾“四人帮”的阻挠，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以敬献花圈、朗读诗词、发表演说等形式，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

北京市委为了不激化矛盾，曾向基层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在本单位举行悼念活动。但基层组织没有照办，依然纷纷去天安门广场。当时的洪流只能宣泄不可阻挡。市委没有再作任何禁止和反对，而是要求各级干部、卫戍区指战员、公安人员和民兵，维护好天安门广场的秩序，引导群众安置好花圈，加强巡逻，防止现场失火。



“灵车队，万众心相随……”百万群众肃立寒街，送别总理

从3月30日算起至4月3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当时，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活动，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同志与群众心心相印。为了全面掌握情况，除白天以外，我还派人在晚上去广场多加观察。为了防止被“四人帮”抓住把柄整人，激化矛盾，我们要求覆盖或悄悄揭下那些言辞激烈、矛头明显有所向的诗词和标语等。从揭下来的悼词、诗词、标语和传单中，我看到大量是反对“四人帮”的，个别也有指向毛主席的，也有少数表示拥护邓小平同志的。对于这些情况，在4月4日清明节前，市委没有出过一份简报，也没有向上汇报过。

说实在的，我们与群众的感情是相通的，毫无对立情绪。广场和灰观礼台上的花圈摆满后，市委立即指示

开放红观礼台，让群众上去摆放花圈。那几天，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群众少时数万，多时十几万人。市委组织了五千名民兵、三千名公安人员着便衣以民兵身份到广场做了大量的保卫、劝说工作。

“四人帮”在周总理生前曾疯狂地攻击周总理，现在看到群众如此深情地悼念周总理，他们极为恼火，派了很多记者在天安门广场活动，搜集情况。

4月3日，北京市委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座谈，征求对花圈的处理意见。到会的群众代表要求将花圈摆放到6日，这期间由他们出面做工作，花圈由群众自己取回（当时周总理的遗像很少，群众要求取回花圈中的周总理遗像），群众不取走的花圈，可以移送八宝山。我当时认为情况是复杂的，天安门广场上虽有反对“四人帮”的诗词、标语，但更多的群众言论、活动是悼念周总理的；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乘机活动，但不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北京市可以先做群众工作，花圈可以放到清明节以后再取走。

4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

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这个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

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华国锋同志讲话以后，我汇报了情况。我说：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 2073 个，共有 1400 多个单位。还有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4月3日到广场的人数大约是 20 万，507 个单位送花圈 800 多个；4月4日到广场的有 8 万人，420 个单位送了 450 个花圈。看热闹的人很多，也还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花圈最大的直径有 6 米，悼词内容有写缅怀先烈的，也有写怀念周总理的。去广场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市是广播器材厂、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我错误地说，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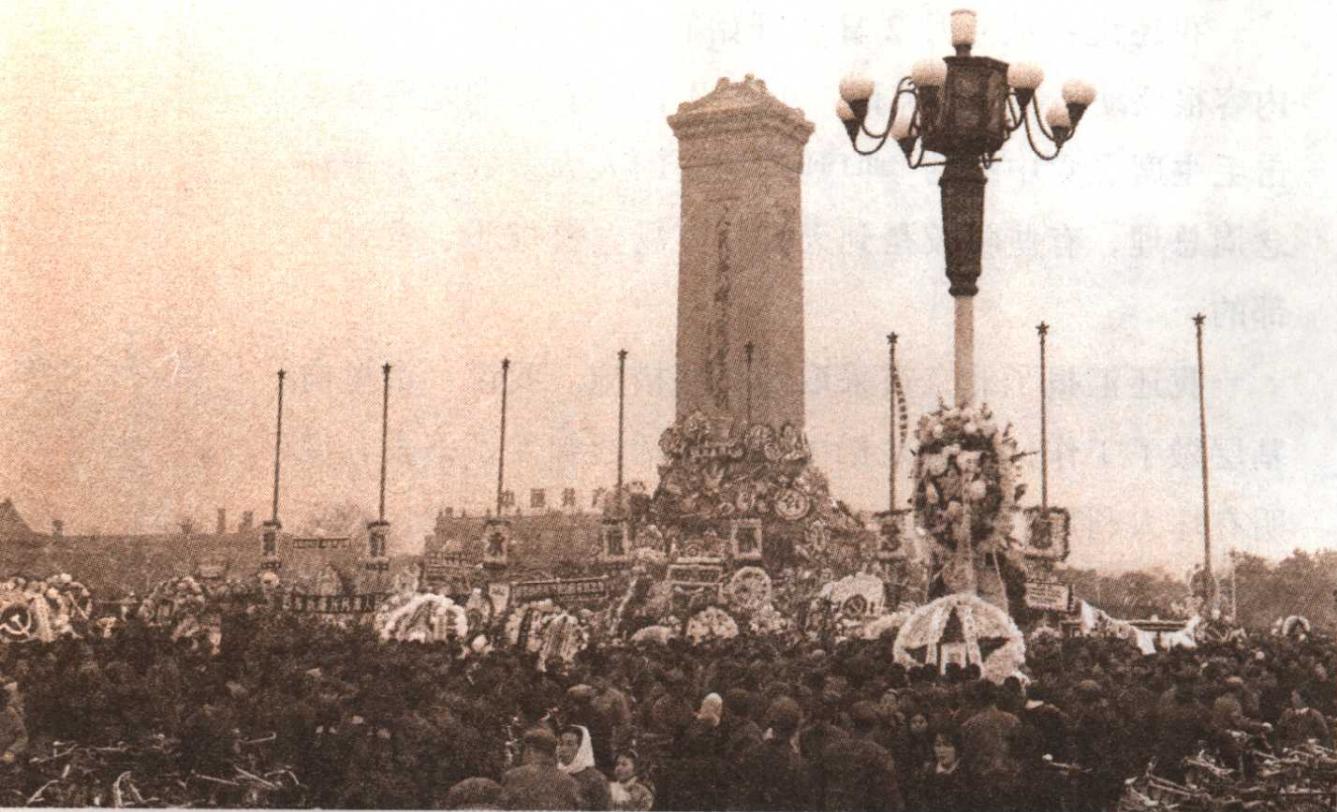
我还说：从 4 月 2 日就开始有恶毒的煽动、讲演，内容很反动。诗词、悼词、小字报中，有 48 起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但到广场去的人大多数是出于怀念周总理，有些学校是到天安门广场宣誓批邓、教育干部的。

我还汇报了北京市采取的一些措施。我说：市里向基层做了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发了下去，说明有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通知发下去以后，很多人说不去上阶级敌人的当了，知道所谓总理遗言是敌人制造的谣言，很多

单位把花圈拆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央的通知的。市公安局也采取了几个措施：一个是现场取证、拍照；另一个是看准了是反动的人，派人盯住，待其离开人群后再抓，拘留了十个人。

发言中，我还讲了一些错话，我说这些活动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

会上，我将前一天在市委召开的各界群众座谈会上群众提出的意见作为市委的建议向政治局提出，要求争取两三天时间做群众工作。



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也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他们只是说有反革命分子在活动，他们同意市委的建议，“四人帮”也同意这个建议。

但是，会议还没有散，杀出一个程咬金来。《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了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

江青看了这个条子后，暴跳如雷，用手指着我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

我说：我在这里开会，怎么会知道。

江青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是右倾。

江青指着我严厉地说：你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

我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说思想上没有重视，有些麻痹。然后，我就出去打电话给吴忠，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吴忠在电话中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我问这个人在哪里演讲，吴忠说就在纪念碑前，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待群众散开后能抓人时再抓。

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

不久，吴忠打来电话说那个演讲的人已经抓起来了。

这个问题解决后，会议继续进行发言，我仍坚持要求给予时间做群众工作的建议。



210

天安门广场上，一位青年人在高声演讲

这时，江青大发雷霆了。她借机发难说：吴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讲坛吗？

江青随后举起手，看着手表说：现在已经过了 12 点了，现在已是 4 月 5 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我推托说：按天安门广场花圈的数量，需要调二百辆大卡车，现在工人下班了，我们找不到足够的运输工具。

江青蛮横地说：我不管，你们想办法。

实际上，运输工具我们是可以解决的，我真正担心的

是不向群众打招呼，不向群众做工作，就把花圈立即移走，会激怒群众，要出乱子的。

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

会议沉默了一段时间。

华国锋也许没有理解我们的苦心，或者他作为会议的主持人想要打破当时的僵持局面，他被迫对我说：“老吴，你考虑考虑，动员力量，今天晚上解决了吧！”

华国锋是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他这样表态，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又没有异议，我不好再顶了，顶不住了，只好照办。当时确实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由北京市委动员干部、群众出面做工作，避免冲突；另一种选择就是激化矛盾，尖锐对立。如果华国锋支持我的意见，我们用几天时间做好群众工作，然后再撤走花圈，可能就不会酿成“天安门事件”了。当然，历史无法假设，要发生的还是会发生的。

散会后，纪登奎提醒我，说把花圈拿走以后，要注意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4月5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

早上，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一看，花圈已经荡然无存。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群众越聚越多，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

怒的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了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我当时要求立即调救火车前往灭火，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边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危险。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小平同志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政治局的会议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四人帮”有目的让邓小平同志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大家目睹了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四人帮”对他们酿成的局面自以为得计，我看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根本没有去理睬张春桥，也没有与其他同志交谈。嚣张一时的张春桥恐怕万想不到，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是他自己。

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我记得毛主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

我说：北京的民兵没有上海训练得好。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

王洪文问：能调多少？

当时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

我说：广场上这么多人，调两三万民兵进去解决不

了问题，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

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江青用手指着我说：你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

这样，就有了张春桥、江青分别提出的两种发表广播讲话的意见。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等同志后来也同意让我出面发表广播讲话。这样就定下来了。

根据政治局的意见，我写成了《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讲话稿避免了提悼念周总理的内容，当时我想把周总理牵连进去不应该。这个讲话稿当时就让华国锋看了，他同意后，其他政治局同志也看过同意了。这个广播讲话稿，与4月8日见报的文字稿有所不同。4月8日见报的广播讲话是这样的：“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

不要上当。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4月5日晚的广播，没有点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只是用了当时通行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等提法，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在当时还是知道的。4月7日政治局会议根据毛主席提议，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在4月8日发表我的讲话稿时，加点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

4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我的广播讲话稿，并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晚8时出动民兵。

为了执行政治局出动民兵的决定，我提出要做些准备，就提前退会了。

我和倪志福同志离开会场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吴忠当时还兼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他听了我们的传达后说：天安门广场上群众那么多，民兵去一定会出问题，可能会发生流血事

件，将来谁负这个责任？

我说：政治局已决定晚8点出动民兵，怎么办？

我们三个人都很怕发生流血事件，吴忠更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他说：绝对不能8点出动，只有等群众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动民兵清场，否则肯定会出问题。

我们三个人当时商定：我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

晚上8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找我，多次催问我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

我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

这时，政治局找我，继而又找吴忠，要求汇报情况。迫不得已，我们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第一，工人刚刚下班，都是从家里找出来的，集合迟了。第二，事先未通知交通警（东西长安街规定不许通过大卡车），民兵沿途受到阻拦，影响了集合时间。第三，先到的都是商业系统的民兵，女民兵多，她们执行这种任务有困难。其实，这些“理由”都是为了找借口、拖时间而编出来的。当时，民兵早已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好了。

他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很不满意，说怎么搞的。

晚上 10 点半，华、陈又打电话催问，陈锡联更为关心，他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首都的安全问题最为重要。我打电话问吴忠民兵可否出动了，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以此惊动群众快走，并再次广播我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

晚 11 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肯离开的只有二百多人了，可以出动清场了。”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步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释放。

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4月6日，天安门广场就戒严起来了。

4月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拿着毛主席写的条子给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毛远新解

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

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说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的话。

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建议，是毛主席不把权力交给“四人帮”的重要措施。那时，上海已经贴出大字标语“拥护张春桥同志当总理”，毛主席批评了这个问题，让上海赶快把这个标语拿掉。

4月7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员，毛远新先是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朱老总、叶帅、李先念、苏振华不必参加会议了；但其间毛远新出去了一趟，回来后又通知除苏振华外，其他人都到会。苏振华前几次的会议都参加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出席7日的政治局会议。于是，政治局会议一直等到朱德、叶剑英、李先念同志都到达后才开始。

对于毛主席的两项提议，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谁都不说话。政治局当即拟定了文字稿。我还记得朱总司令戴上老花镜拿起文字稿看了一遍，心情很沉重，一言

未发。

政治局通过决议后，由毛远新拿去请毛主席批示。很快，毛远新就回来了，说毛主席已经批准。

“四人帮”为了大造舆论，召开了奖励大会，接见了一些人员，在宣传报道上喧嚣一时。“四人帮”还让市委、市公安局分别总结经验写报告，企图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当时，我们认为这样的“经验”不好总结，但又不能硬顶，只好送了一个应付差事的报告。这个报告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认为向全国下发北京市委的报告“此计不妥”，毛主席还在报请下发的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反动诗文原件选印》的报告上批示：“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

虽然群众当时很难被说服，但毛主席还健在，他老人家的威信还很高，市委在机关、厂矿、学校又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北京市的社会秩序、状况才稍有平息。但这样的形势，表明党和人民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必将恶有恶报，只是时辰未到。

正像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人民终于胜利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对在天安门事件中所犯的镇压群众的错误作了多次检讨。我还检查说：“我在天安门

广场事件的广播讲话中，诬蔑了邓小平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无法不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尽管如此，错误总归是错误，只要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参考和认识，是可以做到心悦诚服的。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说在天安门事件中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等等。当时，吴忠曾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结果，吴忠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多同志的不满，这些同志说：血都流成河了，怎么能说没有死人呢！有的同志说当时把天安门广场的血迹都冲洗干净了，把打出来的人脑浆都冲洗掉了；更有同志说他的口袋里就装着有关的材料，可以说明当时的严重情况；还有同志说死的人都是外地人等等。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得很认真、很仔细，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一共进行了三次调查，第一次的调查报告我看见了，后边的两次报告我没有看到，但我问过，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

吴忠同志在“天安门事件”中还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他想把损失尽可能地减小。当时，“四人帮”也很害怕，江青指着我、陈锡联、纪登奎说：北京军区、北京市委还保证不保证我们的安全了？我们三个人当时都不吭声。

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很容易出大的问题，造成流血事件。没有死人，这是不幸中的最大的幸事。

198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一书，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记载，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我要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对党负责任地简要说明两点。

第一，1976年4月4日和4月5日，中央政治局分别开了两次会议，讨论处理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问题。4日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收花圈，5日会议主要讨论的是动用民兵和决定让我发表录音讲话。《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将这两次会议记述为4日一次会议了。这一天之差就含糊了许多重大问题。

第二，《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所载，4日的政治局会议只有华国锋同志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各讲了几句话，其余的都是我在发言，成为会议的主角。好像“四人帮”没有发言，其他的同志也没有发言。这样表述的根据可能就是来自毛远新给毛主席的报告，但毛远新当毛主席的联络员后，向毛主席汇报的内容，从来不经政治局讨论。“四人帮”在会上说了很多话，他们攻击这些活动的总后台是邓小平，甚至造谣当时已经身不由己的邓小平还到过天安门广场等等。我没有同意“四人帮”的议论，我说没有发现邓小平同志到过天安门广

场。江青一伙还在会上讲了很多恶毒诬蔑群众和邓小平同志的话，他们竭力主张镇压群众，“四人帮”的气焰当时非常嚣张。

关于粉碎
“四人帮”的斗争

十二

Guanyu Fensui

“Sirenbang” De Douzheng



关于粉碎“四人帮”，我讲一下我所知道、所参加的一些活动的情况。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之后，周总理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毛主席重用的江青、张春桥等人，气焰更为嚣张。

223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在这次党代会上，我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由于毛主席的赞同，党内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如朱德、董必武、刘伯承等同志在这次党代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当选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诬陷、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同时，党的十大也使

江青集团的很多骨干分子当选为中央委员，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且使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毛主席对政治局的同志，尤其是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我记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江青集团的政治地位虽然由于十大的召开得到了巩固，但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也逐渐暴露了，并且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警觉。

毛主席发现、批评并提出解决江青宗派集团的问题，有过多次指示。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1974年7月17日，毛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毛主席说他要到外地去休息，向政治局请假。之后，毛主席批评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主席接着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毛主席指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一次，毛主席在中央政

治局内点明了江青等人的宗派问题。

第二次是1974年10月，是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的毛主席对他的指示，毛主席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那时，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1月12日，江青给毛主席写信，提议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任副总理，迟群任教育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毛主席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江青不听劝诫，又托王海容、唐闻生去长沙转达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她提出：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王海容、唐闻生向毛主席报告了江青的意见以后，毛主席一下戳穿，尖锐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主席提出朱德任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任副委员长，周恩来继续任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张春桥安排在邓小平之后。毛主席对王海容、唐闻生的这个谈话，经毛主席批准在政治局传达了。以后我们知道，王洪文去长沙是经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策划的，他是背着中央政治局的。王洪文向毛主席诬告，说：



1975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

“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儿的人有小平、剑英、先念”，“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像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一样搞篡权活动。王洪文谈后，毛主席当场严厉地批评了他。毛主席对江青的意见和再次批评，点出了江青有野心，制止了江青集团夺取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是全国人民和全党克服林彪事件影响以及努力克服其他各种困难的结果，是毛主席稳定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措施的结果。

第三次是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并且说明他们是“四人帮”。毛主席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

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主席还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一次，毛主席虽然说问题不大，但却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指示，即不论时间多久，也要解决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央政治局在 5 月 3 日以后，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的政治局同志点名批评了“四人帮”。

是毛主席首先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他对“四人帮”的批评和削权，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76 年 1 月，周总理逝世。“四人帮”以为邓小平同志遭批判了，总理或代总理的职务非张春桥莫属了。上海为了制造舆论，已经贴出了大标语，要求张春桥当总理。毛主席知道后，一方面批评上海，要求覆盖大标语；另一方面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于 1976 年 2 月 3 日发出了中共中央 1 号文件 [1976]。

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北京、

天津。地震后，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的抗震指挥部办公。华国锋经常去。陈锡联、纪登奎和我，还有军委、国务院、国家地震局的一些同志集体办公，负责处理当时发生的一些问题。

8月26日，即毛主席逝世前的十几天，毛主席的病情危重，江青却到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活动，自称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住在地震棚的群众。迟群要求新华社、《北京日报》派记者采访并发表消息。《北京日报》记者写出的报道报送姚文元后，姚文元即要求北京市委批发《北京日报》发表。《北京日报》排出大样送给我审批，报道是发排在头版头条的位置，通栏的标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我认为不经中央批准，由《北京日报》发表这样的消息，是违反组织原则的。我当即请示华国锋同志，并向他提出了我的意见。我还提出如果不发表这一消息，要有个理由答复姚文元。

华国锋想了一下说：先扣在你那里，如果有人问，你就说送给我了。

这篇报道没有发表。

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

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记得我们都在毛主席住的房子的走廊里看心电图监示器，一直看到监示器上的图形没有任何变化、任何跳动为止。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9月9日凌晨，毛主席逝世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贡献，正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

9月9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在毛主席住所（中南海游泳池处）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



230

毛泽东追悼大会会场

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华国锋没有理会江青的无理要求。江青闹得太厉害，会议没法讨论问题了。后来，与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这样，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当时还要处理一个问题，即是否保留和如何保留毛主席的遗体问题。“四人帮”这时躲开了，他们不参与这个事情，他们要看到毛主席遗体保存出现了问题，才会出来横加指责。当时，如果不保留毛主席的遗体，“四人帮”就会将它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如果要保留，但留下来后遗体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那就更

会是一条罪状。汪东兴当时已经找了刘湘屏，组织专家研究保护遗体的措施，还派人了解了越南保护胡志明遗体的情况。保护遗体的技术要求很高，十分不易。后来，政治局还是决定要竭尽全力保留毛主席的遗体。

毛主席逝世以后，江青每天都到毛主席的住地，同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纠缠，要张玉凤将毛主席保存的文件、档案交给她。在她的多次纠缠下，有两件毛主席的谈话记录被她拿走了。汪东兴同志知道后，要回了被江青拿走的谈话记录稿，顶住了江青的胡缠。

当时，华国锋同志与我们谈起过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江青的目的是在控制毛主席的档案，以便从中寻找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加以篡改，继续陷害军队和地方的一些负责干部，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

我记不清了，可能是9月21日，决定将毛主席的文件、档案封存。江青对此极为不满，面对面地或在电话中长时间地同华国锋同志大吵大闹。

从1975年下半年开始，毛主席病重，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由毛远新以“联络员”的身份列席政治局会议，将会议情况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逝世后，“联络员”的任务没有了。毛远新给华国锋同志写信，提出要回辽宁自己工作的岗位。华国锋接到信后，征求了江青的意见，江青当时没有反对。

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通报了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事，“四人帮”一致反对。张春桥首先提出毛远新应留在中央，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做准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都支持张春桥的意见。江青还提了一条理由，说毛主席的文件、书信，别人整理不了，处理毛主席家里的事情也离不开毛远新。江青还是想要控制毛主席的文件和档案。华国锋同志说：毛远新同志还是回辽宁，将来中央开会，如果需要他参加工作，到时还可以再来。

除“四人帮”外，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一致赞成华国锋的意见。我们觉得“四人帮”显然是有阴谋的。

会上，江青纠缠不休，说什么把毛远新留下来是属于毛主席家里的事情。对毛远新的去留问题，江青与华国锋不断争论。江青甚至说，她要与华国锋同志谈些“家务事”，别人不愿意听的可以不听。那时，我们不愿意听她的无理纠缠，感到极度厌烦，就陆续离开了，记得汪东兴留下了。

江青一直扯，扯她的所谓“家务事”，马拉松的会开到第二天早晨5点。华国锋捺着性子，只是耐心地听。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江青说讲完了。华国锋立刻宣布说：“散会！毛远新还是要回辽宁。”江青的无理纠缠失效。

9月10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同志，

指示中办的秘书米士奇，以中办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的、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和请示，要直接找米士奇。

9月11日和12日两天，米士奇分别给一些省、市打了电话，北京市没有接到这个电话通知。

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后，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怀疑有问题。张平化立即打电话将此事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向一些省、市查询后，得知都接到了同样的电话。这就表明“四人帮”已在采取措施，架空、控制华国锋同志，企图直接指挥全国各地，进而夺取中央最高权力。

“四人帮”被篡党夺权野心所驱使，又有计划、有预谋地编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利用被他们控制的宣传机构，将其写入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广为宣传，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和其他反对他们的同志。

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在向毛主席汇报各省、市工作情况时，曾直接向毛主席提出他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不能胜任代总理

的工作。当时，毛主席写给他三张字条，一是“你办事，我放心”；二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三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曾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三点指示，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包括“四人帮”都看到了毛主席的手迹。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并将篡改后的指示称之为“临终嘱咐”，其意在否定华国锋的继承者地位，标明他们才是毛主席临终时指定的接班人，他们才是忠于毛主席的继承者。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不点名地称华国锋是修正主义的头子，更表明了“四人帮”已决意将华国锋等人打倒，是他们开

234

准备“登基”的“四人帮”



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行动的信号。

被“四人帮”控制的北大、清华都有活动，姚文元、迟群等人还动员很多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当时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大喜事等。

我们感到了紧张的气氛。华国锋同志的处境很困难，工作不下去了。种种迹象使他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那时，李先念在家里养病。先念一个时期以来心脏有些不好，不能多走动，到大会堂开会时，心脏就跳得不正常。在小平同志已经被批评，但还在主持工作时，先念向小平同志请过假，提出到外地休息、养病，医生也写了一个报告，小平同志报告了毛主席，主席同意了，但还未走。后来，毛主席逝世前后，华国锋同志曾对先念说过，现在的情况和问题很复杂，“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希望先念同志不要离开北京。

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

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从这里看出，华国锋与李先念谈话之前，叶帅可能与华国锋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

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

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过，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华国锋告诉我，叶剑英同志为了商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曾两次到他的家里。

毛主席逝世以后，在治丧期间，我记得大约是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

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当时，华国锋对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我想华国锋同志当时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9月26日或27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华国锋说：现在看来，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这场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就会断送我们党领导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我也察觉到“四人帮”近来的一些活动不正常，表示支持华国锋同志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吴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

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我说：当然知道。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是少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是多数。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各地接来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了多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遭到失败，被打成反党集团。

随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的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我们还分析了全国的形势，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里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毛主席逝世不久，江青又是毛主席的夫人，要考虑到他们利用散布“毛主席尸骨未寒”来造舆论，但是也要认清“四人帮”的活动在加剧，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动作。我和李先念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

解决“四人帮”的提议。

我们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和李先念都对我说过，通过这次商量后，华国锋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

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庆活动。由于毛主席刚逝世等原因，政治局决定：不举行游行、联欢等庆祝活动，只是召集一些工农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开会；政治局的同志可分头到工厂、农村去看望工人、农民。这次的政治局会议开得时间不长。

9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会议由我主持，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显得很紧张。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等进来时脸都拉得很长，其他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包括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是这样。会议先由工农兵代表发言，他们主要是讲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工农兵代表发言后，我说请中央领导同志发言。这时，其他的人还没有讲话，华国锋就急着站起来发言，并且讲得很短。我意识到华国锋这样做是要快点结束会议。华国锋一讲完，我就起来宣布散会，避免在这样的会议上发生什么问题。从当时会场上的形势看，“四人帮”是准备了要发言的。

现在有人传说会议的警卫工作有特殊安排。没有，



1976年9月30日，首都各界国庆座谈会在天安门城楼举行

会场的警卫工作方面没有表现出特殊情况。

会议散后，我们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看过电影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又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李先念同志积极参加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期工作，但对“四人帮”何时采取行动，他是不知道的。他当时非常关心，曾多次打电话给华国锋，询问有关问题。

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汪东兴同志也是出了大力的。

有一件事情可以讲一讲。1975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从那以后，毛主席就很少见江青了。为了摸毛主席的情况，江青就不惜屈尊拉拢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给张玉凤送礼，把张玉凤请到钓鱼台吃饭。席间，动不动就对人兴师问罪的江青，竟忘乎所以地议论起政治局的同志，她对张玉凤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也是个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

张玉凤回来就把江青的这些话向汪东兴汇报了，她请示是否将江青的谈话上报毛主席。汪东兴说这个事情不要汇报，有关中央负责同志的情况，不要听江青乱讲。

对于这件事，汪东兴曾经向我谈过，提醒我注意。为此我相信，汪东兴也是反对“四人帮”的。

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并个别谈话后组织起来的，大概有五十多个人，组成了几个行动小组，一个组负责抓一个人。

据我所知，纪登奎不了解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

有人说，抓“四人帮”是叶剑英给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直接下达的命令。这是没有的。我是卫戍区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

10月2日，华国锋到我的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我进一步商议。华国锋要我深思：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应采取什么对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

华国锋当时还问我：“四人帮”在北京市有什么爪牙。我说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华

国锋同意。

华国锋问：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

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同志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

10月3日，江青要去二七车辆厂与工人开座谈会，我陪着去了。在座谈会上，她没完没了地乱说了一通，又拉着工人一块合影，还怪我经常看手表。江青讽刺我说：你是京兆尹，大忙人啊！

江青开完座谈会后，假惺惺地提出要到工人家里吃顿饭。我只好临时安排食堂把饭做好后，端到职工家里让她吃。

从二七机车车辆厂回来后，我就到华国锋那里作了汇报。

3日或4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

华国锋问我如果这个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来，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

我对华国锋说：有无把握，我得问一问北京卫戍区。

华国锋问：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

我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批邓”是不满的，对“四人帮”很反感。我是卫戍区的政委，了解吴忠的思想情况，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我相信吴忠是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的。

我向华国锋请示，如果吴忠不知道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有些工作不好开展。当时有的警卫工作是交叉进行的，如果双方不知道情况，可能会发生误会。华国锋考虑后同意了我的建议。

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

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

吴忠告诉我，在坦克六师旁边，北京卫戍区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况，可以起作用。

吴忠还告诉我说，苏振华曾约他到怀柔水库打招呼，吴忠是解放战争时期杨勇、苏振华纵队的旅长。苏振华说，不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同志就工作不下去了。但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苏振华没有谈。

最后，吴忠提出，对部队的调动、使用，有严格规定，哪怕是动用一个连，过去都要经军委报毛主席批准。所以动用部队，向上请示的问题需要解决。

与吴忠谈话后，我立即将情况向华国锋作了汇报。

华国锋说：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单位要由卫戍区控制起来。他说卫戍区的部队要交由我负责，让我去找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解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的问题。华国锋说，陈锡联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在一起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也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我马上就找到陈锡联。当时陈锡联家修房子，他搬在老匈牙利大使馆的房子住。

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在与杨成武谈事情。杨成武走后，我向他说明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陈锡联说情况他已知道。陈锡联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我的住处具体商量。

我踏进家门，见吴忠已在我家中等候。我与吴忠在1971年执行中央的指示，共同处理过“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我们根据1971年稳定首都的经验，商量了具体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紧外松的戒严工作。叶剑英当时担心的事情，一件是前面说的坦克六师的问题（后

来实际表明，这个师毫无问题），另一件是要防备学生、造反派从清华、北大等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为此，我们在清华、北大附近都部署了相当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冲，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堵回去。10月6日的那天晚上，北京实际上实行了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监视，防止外地的部队进北京。

我把与陈锡联、吴忠商谈的情况和部署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又亲自与吴忠谈过一次话。

我们一方面紧张地加紧准备工作，另一方面还要稳住“四人帮”，华国锋的意见是在准备工作未做好之前毫不惊动他们，以免打草惊蛇。

可能是10月4日，华国锋又找我去到他的住处。正谈着，汪东兴打电话来说，江青提出要到石家庄去，指定专列的车头要用二七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车头，还要请二七厂的一些工人陪同她去。汪东兴请示华国锋是否同意她去。

华国锋拿着电话，既问又答地同我说：江青去石家庄要干什么？她可能是试探，还是稳住她，同意她去。

我点点头，同意华国锋的意见。我也认为江青是在试探华国锋，看华国锋是否同意她乘坐专列到外地去。

华国锋当即答复汪东兴说：允许她去，关于调车头及找工人陪同的问题由吴德去安排。

安排江青去石家庄的事情，我交给了曾任二七车辆厂的党委书记、后任市委秘书长的周家鼎去办。周家鼎做过贺龙和周总理的秘书，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周总理已上床休息而把江青送给总理的一个文件压了一下，就被不可一世的江青说成“靠不住”。周总理当时为了保护周家鼎，将他下放到二七车辆厂任党委书记。这情况是我从汪东兴那里知道的。我后来提出要调周家鼎到市委任秘书长，周总理开始不同意，后来还是同意了。周家鼎向我汇报了江青到石家庄的情况。其实专列没有到石家庄，开到保定的一个道岔上就停了下来。江青下火车扭扭摆摆采了一些野花，呆了一段时间就上车了，在车上又和陪同的工人、干部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就回北京了。江青没有找当地的造反派或三十八军进行活动。看来这次江青外出活动，正如我们所料，完全是个试探。

10月3日、4日，我与华国锋及时交换各种意见，我们把所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考虑了一遍。华国锋要求一定要保持首都的稳定。

在这段时间中，我与吴忠也保持了密切联系，就像按住了人的脉搏，随时掌握着北京市的一切变化情况。

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地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

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等问题。大概在下午的 5 点多钟，我回家了。我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我们听了汪东兴汇报的具体行动方案，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行动的措施。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

后来汪东兴告诉我，我们俩当时正好前后脚，我的汽车出华国锋家，他的汽车进华国锋家，是他建议华国锋再请我回来共同商量的。

我们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具体做法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为名，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会，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指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后，由华国锋宣布他们的罪状，随即由汪东兴组织的人分别对其实施隔离。汪东兴派张耀祠到江青住处宣布政治局对她隔离审查的决定。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和北京卫戍区吴忠同志负责解决。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华国锋要

求我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

我认为，汪东兴同志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不在李先念同志之下。他组织了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的五十多个人，这些同志作了贡献。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叶剑英还接见过这些同志，照了相，吃了饭。

10月6日，我与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市委书记兼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9点钟的时候，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第一个到怀仁堂的是王洪文，第二个是张春桥，均已被隔离起来。江青是由张耀祠带人去解决的。汪东兴在电话中说，只有姚文元现在还没有来，请即令卫戍区派人去抓。

姚文元不住在钓鱼台，他的住地是由卫戍区负责警卫的。接到汪东兴的电话时，我当即要吴忠亲自去解决。

吴忠带着人到姚文元住地时，看到姚文元正坐车出来，车往中南海方向行驶。吴忠没有惊动姚文元，相机随着姚文元的车子到了中南海。姚文元进入怀仁堂后，也被实施隔离。

“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

1976年10月24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天安门城楼参加首都百万军民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



敏还是过了一段时间才找到的。

卫戍区在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后来负责中央宣传口的副手邱巍高就是卫戍区的副司令员，卫戍区的参谋长也被调出来协助中央工作了。

10月6日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同志事先以不同方式将解决“四人帮”问题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打了招呼，会议很快进入议程，选举新的党中央主席，讨论中央第16号文件。

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

一、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二、通过第16号文件[1976]，文件内容是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通报党中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和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的决定。

在讨论16号文件时，好像是纪登奎同志说，毛主席曾讲过对“文化大革命”作三七开的评价，文件是否应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就涉及到了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全国的形势尚未稳定，就立刻涉及到毛主席的问题，单从战术上讲也是不策略的。所以，叶剑英同志说：这个文件不可能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他

做了个手势，竖起大拇指，说毛主席还是这个。

叶剑英在以后数次的政治局会议上都讲要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旗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

我认为，在粉碎“四人帮”时的历史条件下，叶帅坚持这样的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稳定全国的形势。

这次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一些比较重要和急迫的问题，比如中央要求北京市委一定要控制和稳定首都局势，北京不能乱，出事由吴德负责任。

会议结束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住在了玉泉山。

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复杂。一些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牢固控制的单位和长期经营的地区都出现了对抗中央的苗头，一些追随“四人帮”的坏人就公开攻击党中央领导的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右派政变”、“军事政变”。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叛乱的迹象。为此，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开政治局会议，政治局的同志与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分别谈话，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及时了解各地的动态，交换问题处理的意见。

鉴于上海是“四人帮”帮派势力较大的地方，又有叛乱迹象，中央政治局先找了江苏、浙江和南京部队负责同志到北京谈话，要求他们注意上海情况。中央政治

局随后才通知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来北京谈话。中央与马天水谈话时，马天水坚持其顽固立场，陷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中不能自拔，表示反对隔离“四人帮”，他说隔离审查是错误的。这次谈话以后，马天水竟通知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说，“四人帮”出事了。徐景贤、王秀珍开始策划上海武装叛乱。后来，中央干脆通知让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来一起谈“四人帮”的问题。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他们不敢以卵击石，被迫取消了叛乱行动。

这以后，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为了进一步控制上海局势，解决上海问题，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上

首都人民载歌载舞庆祝粉碎“四人帮”



海分别担任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当时考虑苏振华是海军政委，可以指挥东海舰队；倪志福是上海人，劳动模范，在上海有一定的影响；彭冲是江苏省委书记，江苏邻近上海。苏、倪两位把上海局势稳住后，就由彭冲主持工作了。

由于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帮”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得当，“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也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群众在得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之后，采取了各种形式来庆祝。中央怕发生意外，曾要求有组织地游行。

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的庆祝大会，指定



吴德在首都百万军民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上讲话

由我讲话。我提出，这是首次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会，由我讲话不合适。但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时，叶剑英还是要让我讲，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讲话稿是政治局集体讨论定稿的。我记得在讲话中说了“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这样的话。

接着，又提出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程主要是：一、调换外交部长。二、通过毛主席生前批准的邓颖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人事安排。三、作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汇报。当时，我是人大常委会常务副委员长，叶帅指定我作粉碎“四人帮”的汇报。按照中央政治局的一系列文件、精神起草好了汇报稿，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时，我提出了“批邓”是否还要提的问题。华国锋说：“16号文件刚刚发表，这个报告口径以与16号文件一致为好。”大家同意他的意见，政治局通过了我的汇报稿。

1976年11月向人大常委汇报时，我讲了“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现在把‘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除掉了，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也一定能够做得更好”的话，为此胡耀邦同志后来批评说，第一个提“凡是”的是吴德。

当时，我考虑是毛主席首先宣布王、张、江、姚等人是“四人帮”的，又是毛主席指示“要注意江青他们有篡党夺权的野心”的，我认为汇报应该强调粉碎“四

人帮”的行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做的，以此为根据才能更好地稳定全国的局势。因此，汇报中历数了“四人帮”的罪行之后，我讲了“一个凡是”的意思。我在思想上没有要阻止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念头，也没有意识到这样讲话会引出问题。

关于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我记得常委们议论过。10月份，华国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至于常委们是怎样为此事进行工作的，我就不清楚了。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具体的时间记不准确了，在李先念的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还有我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同志，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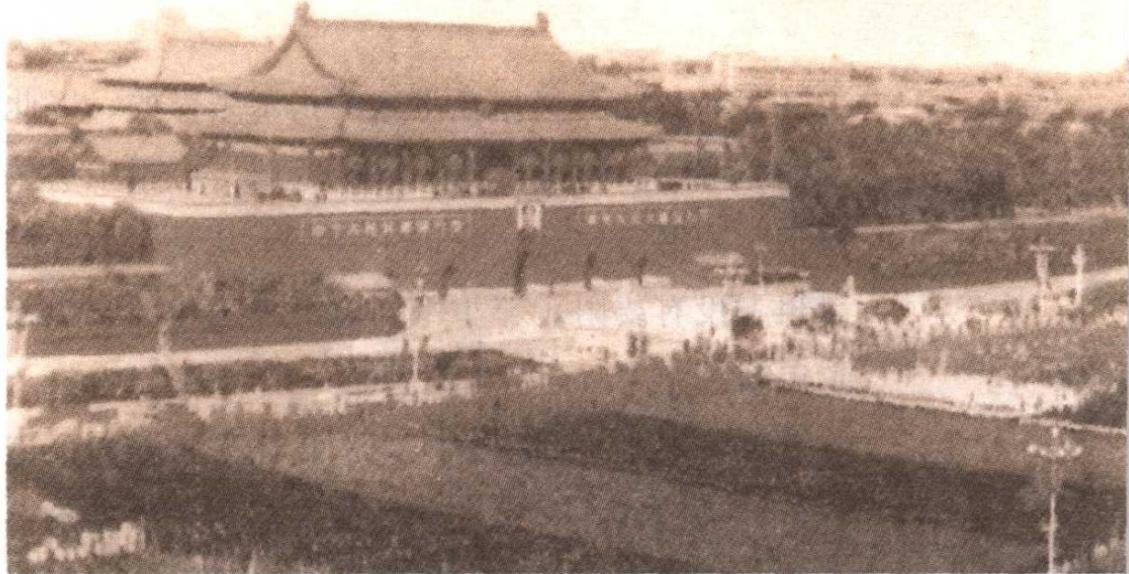
邓小平见到我们非常高兴， he对我们说：“很好啊！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指粉碎“四人帮”事），干净利索！”

李先念讲：“我们还要请你出来工作呢！”

邓小平同志风趣地说：“出来干什么？”

李先念说：“起码官复原职。”

当时，邓小平同志住在王洪文在西山住过的房子里，他还兴致勃勃地请我们去看了为王洪文修的电影厅，邓小平同志说：看，这就是电影厅。



1976年10月24日，首都百万军民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

256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较长时间里，中央领导同志在玉泉山集体办公，大概陆陆续续地开了半年的会。我和倪志福同志住在朱德同志住过的3号楼，开会是在7号楼。

粉碎“四人帮”后，犹如在党的肌体上切除了一个大毒瘤，健康因素增强，形势大大发展，情况更有所变化。今天有这样一个兴旺的局面，我应当为此高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意义，它指出：“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

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认为这是公正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 北京市的经济建设

十三

“Wenhuadageming” Qijian
Beijingshi De Jingji Jianshe



“文化大革命”搞得那么乱，但是不能没饭吃。在那种混乱状态下，工厂的干部和广大工人还是好的，千方百计想办法，不让生产停顿。北京的市场很紧张，副食、鸡蛋、煤都紧张，全要靠外地支持。出现的问题怎么办？这就提出了新的问题。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却提出“不能拿生产压革命”。林彪也在召集国务院的部长在京西宾馆开会时强调说：“文化大革命”是最伟大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必然要席卷全国。意思是冲击生产无所谓。在这个会上，搞了《工业十条》还是《生产十条》，说不行。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又搞了一个《十条》。就是这个时间前后提出的“不能拿生产压革命”。

后来又在批极左思潮、抓“五一六”的过程中，中央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

席的思想，但是仍然很难贯彻。你抓生产时，他们就说你是搞唯生产力论。他们反复干扰。后来，直到主席提出“把经济搞上去”，他们仍然不死心，瞧着机会就整做事的人。

整个的过程，就是这样的斗争，一边是“抓革命，促生产”，一边提“不要以生产压革命”；今天是“把经济搞上去”，明天又批“唯生产力论”。

反派性后，市革委会是团结的，没有派性了，市里才能稳定。消除派性，是当时很大的一项工作。因为上边没有了派性，下边的各区县也就逐渐消除了派性。这以后遇到大的事件，市里是比较稳定的，原因在这里。

市里经过两次改组，调了一批人，成立了北京市的计委、经委。调了一机部的副部长杨寿山同志，商业部的副部长王磊同志，还有哪个部的陈尔冬同志，还调了若干全国劳动模范，如李昌安、李瑞环等同志，又加上部队的同志，还有原来市委的王宪、李耀民等同志。王磊是商业部的副部长，先念同志说王磊一方面放在市里保护，另一方面让他利用熟悉商业、同各省的关系，想办法保证北京市的市场供应问题。以后又调了叶林来。

王宪、李耀民搞农业，杨寿山等人搞工业，王磊管财贸。这些人没有什么派性，而且在造反派眼中，他们的问题也不大。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一般对运动

比较超脱一点。最后形成了由老市委回来的王淳、韩伯平、赵鹏飞、李瑞环、杜春永等同志，加上中央各部委调来的同志，部队“支左”比较超脱的同志，所组成的新的领导。

这些同志很艰苦、很努力，在那种条件下，抓生产很不容易。

生产是在这种斗争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同志千方



1975年，外国朋友参观东方红炼油厂

百计、艰难困苦，在当时的条件下，抓得比较好。其他各省的生产、基建项目差不多都停了，北京稍微稳定下来后就抓生产，我们抓了一把。工业上搞了首钢的第四高炉、轧钢厂、纤维厂；由石油部支持，搞了东方红炼油厂，有人造橡胶、塑料厂等五个厂，三十万吨乙烯等项目。当时，北京的工厂配合搞导弹的部件生产，是杨寿山同志抓的，据说部件的质量都是比较合格的。

商业、财贸，王磊也抓了。

集中抓了农业，抓修水库、灌溉，如平谷的海子水库、门头沟斋堂水库等，还有打井，平整土地，改造大兴的沙漠田，种树。王宪、王磊、李耀民这些同志经常住在农村，当时虽然搞“文化大革命”，农民除了“早请示、晚汇报”外，他们还要种地、吃饭。

解放时，王宪是通县的专员，通县地区划归北京市后，他就在市委搞农业。后来，万里出来了，负责市政建设。

当时，这些同志抓生产，他们也挨了一些批判，他们也没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也没有借着“文化大革命”整别人。从其他单位调来的同志，他们在原部委都是挨整的。

由于没有放松生产，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工业方面除了1967年和1968年这两年是下降的外，其他各年大致都呈上升趋势。农业方

面除 1969 年的产值有所下降，但产量并不比 1967 年低，总的看也都呈上升趋势。因为农业上主要是天时影响，所以像 1972 年的大旱中其产量和产值都比 1971 年的下降。我们可以从下列数字得出比较：

工业总产值：

| | |
|--------|---------------------------|
| 1966 年 | 71.5 亿元 |
| 1967 年 | 64 亿元 |
| 1968 年 | 68 亿元 |
| 1969 年 | 97 亿元 |
| 1970 年 | 129 亿元 |
| 1971 年 | 157 亿元 (以上按 1957 年不变价格计算) |
| 1971 年 | 110 亿元 (以下按 1970 年不变价格计算) |
| 1972 年 | 116 亿元 |
| 1973 年 | 125 亿元 |
| 1974 年 | 136.7 亿元 |
| 1975 年 | 148.7 亿元 |
| 1976 年 | 156.4 亿元 |

农业总产值：

| | | |
|--------|--------|-------------|
| 1966 年 | 4.9 亿元 | 119 万吨 (产量) |
| 1967 年 | 5 亿元 | 113.4 万吨 |
| 1968 年 | 4.9 亿元 | 127.3 万吨 |
| 1969 年 | 4.5 亿元 | 115.9 万吨 |

吴德口述

十年风雨纪重医——记吴德大夫的医德医风



北京前三门一条街

| | | |
|--------|----------------------------------|----------|
| 1970 年 | 5.3 亿元 (以上按 1957 年价格 140.8 万吨计算) | |
| 1971 年 | 7.5 亿元 (以下按 1970 年不变价格 142 万吨计算) | |
| 1972 年 | 7.2 亿元 | 117 万吨 |
| 1973 年 | 8 亿元 | 153 万吨 |
| 1974 年 | 8.7 亿元 | 170 万吨 |
| 1975 年 | 9.2 亿元 | 183.8 万吨 |
| 1976 年 | 9 亿元 | 170.3 万吨 |

重点产品产量：

| | 钢 | 原油加工 | 原煤 |
|--------|----------|----------|----------|
| 1966 年 | 63.5 万吨 | 0 | 534.3 万吨 |
| 1967 年 | 44 万吨 | 0 | 428.4 万吨 |
| 1968 年 | 32.8 万吨 | 0 | 471.8 万吨 |
| 1969 年 | 72.5 万吨 | 28.5 万吨 | 532.1 万吨 |
| 1970 年 | 110 万吨 | 254.4 万吨 | 624.9 万吨 |
| 1971 年 | 134.3 万吨 | 344.1 万吨 | 680.1 万吨 |
| 1972 年 | 148.9 万吨 | 373.5 万吨 | 691.8 万吨 |
| 1973 年 | 161 万吨 | 372.8 万吨 | 706.3 万吨 |
| 1974 年 | 167.8 万吨 | 424.3 万吨 | 736.9 万吨 |
| 1975 年 | 165.8 万吨 | 443.3 万吨 | 749 万吨 |
| 1976 年 | 163 万吨 | 512.1 万吨 | 747 万吨 |

1976年地震，工业、农业都受到影响，大概震裂了一百多万平方米。

我是1978年离开北京市的。我走前，鸡蛋要从外地运来，损耗太大，就想办法建了一个种鸡厂，进口了一个罗马尼亚的养鸡厂，建立了两三个养鸡厂。还进口了一个养猪厂。我走时，鲜蛋从外地调进来的数量已经减少了。

那时，蔬菜是18万亩。现在大概亩数减少了，但产量提高了。

那时，耕地是六百多万亩。现在基本建设这么多，耕地会减少的。

那时候北京市的生产，要发展没有钱。国家也是这样。当时，物价便宜，副食补贴一两亿元就是个大数目啊。

修前三门的一条街，是李瑞环负责的。现在来看，设计得不太好，但那时是急需要房子住。

当时，周总理可抓得很紧，造价很低，楼堂馆所不许建，外交部想建部办公楼，造价较高，周总理就不让建。

那时是实行勤俭建国，提倡一个钱当两个钱用。那时候，谁敢大吃大喝？连周总理都是很艰苦的，我们一块吃饭，很简单。周总理，真是一辈子都这样，身上戴

的像章是“为人民服务”，用的笔是中国制造的，真正以身作则。

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相信，北京市的经济建设会发展更快、更好。“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建设的破坏不可低估，1967年、1968年的情况最明显。

后记

1992年夏，我陪父亲吴德在北戴河休养，与李强同志比邻而居。那段日子，我常常看到父亲在廊子里的竹椅上与李强同志之子李延明聊天，一老一小谈得很投入。有时我也听上几句，是父亲回顾“文化大革命”历史中的一些情况。由于平时听得多了，也就不甚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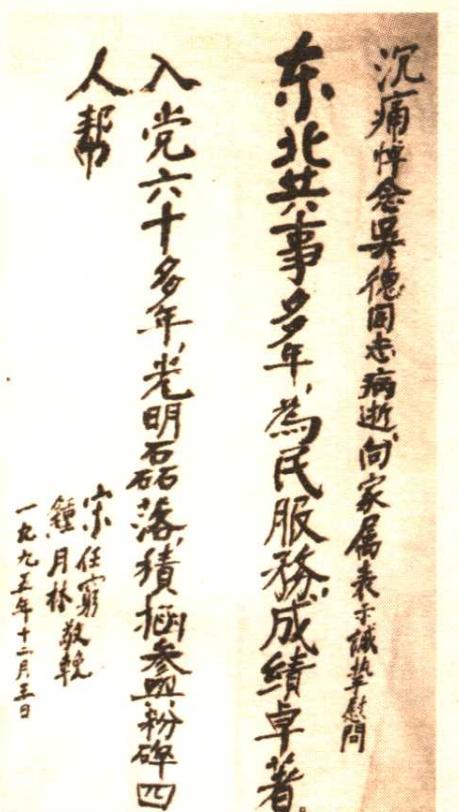
过了一段时间，听父亲说李延明把他们在北戴河的谈话内容告诉了邓力群同志，引起力群同志关注。当时，力群同志在指导当代中国研究所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他和时任当代所所长的李力安同志委派该所朱元石、刘志男同志来采访，把父亲讲的记录整理成文。开始时间是1993年夏季，地点仍在北戴河。后来，文章的修订工作移到北京我们的家里。父亲说：“朱元石、刘志男二同志整理得很好，帮助查找了相关的背景资料，核对了每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先后次序。”“人老了，时间长了，记忆难免有误，多亏了他们辛勤而细致的工作。”

这些回忆文章共 15 篇，父亲生前每篇都看过、改过，有些文章还找过了解当时情况的相关同志核实。文章基本上反映了父亲从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整整十年的主要经历。

我非常感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领导同志和《当代中

国史研究》编辑部的有关同志，当父亲在世时，就在《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刊登了这 15 篇文章中的一篇：《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父亲去世五年后，又陆续发表了另外三篇：《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从国务院文化组到四届人大》、《“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解放干部问题上的一场斗争》。现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又将父亲的 13 篇回忆文章结集出版，更是令我不胜感激之至。

书中所述事情已过去二三十年，父亲去世也九个年



头了。他所经历的事实，已经真真切切地成为历史。把经历过的历史原原本本地讲清楚，这是他为党所做的最后一件事。

毛主席曾说过：“吴德有德，吴德是老实人。”我想，这本书就是一个有德之人所说的老实话吧。

吴铁梅

2003年12月26日

社院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EyNDU1OTFf5ZC05b635Y+j6L+w5Y2B5bm06aOO6Zuo57qq5LqL4oCU4oCU5oiR5Zyo5YyX5Lqs5bel5L2c55qE5LiA  
5Lqb57uP5Y6GLnppcA==",  
    "filename_decoded": "11245591_\u5434\u5fb7\u53e3\u8ff0\u5341\u5e74\u98ce\u96e8\u7ea\u4e8b\u2014\u2014\u6211\u5728\u53  
17\u4eac\u5de5\u4f5c\u7684\u4e00\u4e9b\u7ecf\u5386.zip",  
    "filesize": 32083583,  
    "md5": "3f61fd66f0f3f2f666532fd853bac18b",  
    "header_md5": "883c95852767e6c7ebd4653dc4d95252",  
    "sha1": "b2aa31f8f2d5962caad77fcaa1eda25d43bddd",  
    "sha256": "462588f9b95259406646493928008cf7dbbabbbde45089e95cc3615d7f781d0d",  
    "crc32": 434616061,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34115839,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270,  
    "pdg_main_pages_max": 270,  
    "total_pages": 289,  
    "total_pixels": 1209791372,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